

余英时

金 庸

袁伟时

江 平

张 灏

金耀基

陈方正

刘笑敢

梁其姿

孙康宜

张信刚

郑培凯

李
怀
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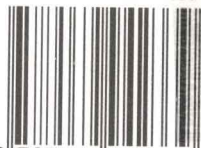
访问时代

十二位知识人的
思想世界

访问时代

余英时：“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事情。”**金庸**：“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袁伟时**：“没有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不了解人类文明的进程，不可能建设现代社会。”**江平**：“解决我们当前房价的居高不下，最主要的应该是治本。当然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地的价格。”**张灏**：“假如大学生就算知识分子的话，那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一些忙着职业、忙着生活的人，没有理想，没有社会责任感。”**金耀基**：“当然中国自从有了大学之后，转折点太多了，政治上干预也太多，没有发挥到真正大学的作用。”**陈方正**：“事实上，在西方几乎所有专门学问都会有通俗作品来为大众作解说，在中国这方面还是比较落后。”**刘笑敢**：“无止境地追求量化指标是一种病毒。”**梁其姿**：“我希望展现出来的是异于英雄式人物的小人物，写出他们的主体性、主动性、在历史里曾扮演的重要角色，这需要很多努力。”**孙康宜**：“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把有些传统文学史的偏见改正过来。”**张信刚**：“学术造假是天下第一宗罪。”**郑培凯**：“我发现在人文学术研究领域里头，有一些学者完全没有人文的关怀，对于世界也没兴趣，这就很严重了。”

ISBN 978-7-5399-4233-9



9 787539 942339 >

定价：32.00元

李
怀
宇

访问时代

十二位知识人的
思想世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访问时代 / 李怀宇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399-4233-9

I. ①访… II. ①李… III. ①名人—访问记—世界—
现代 IV. ①K8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8957 号

书 名	访问时代
著 者	李怀宇
责 任 编 辑	王一冰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4233-9
定 价	3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我出道之时，满怀理想，相信正义，读前辈著作而心动，便义不容辞地访问知识人，一心为历史留下初稿。一晃多年，跋过山，涉过水，遭遇小风波，目睹怪现象，渐渐懂得世事的复杂与人心的变幻，不禁对这个时代充满困惑。

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时代已然巨变。物质生活与科技产品何其丰富，民主和科学依然任重道远。我拜访的许多前辈，一生都在历史漩涡中击浪扬帆，而理想的彼岸若隐若现于烟雨之间。先人一点一滴的恩泽，汇入时空之海。而今忙碌的时代，海边还有多少拾贝的闲人？

我常感人生的荒谬，仿佛在访问知识人时才能找到超凡入圣的幻觉。现实生活里，琐碎、平庸、无奈似乎命中注定，只好从思想世界里寻找从容、淡定、超脱。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在精神层面，我相信古今中外有相通之心。庄子的《逍遥游》与苏东坡的《赤壁赋》，莎士比亚的妙语与托尔斯泰的深思，依然穿越时空，扣动心弦。

访问生涯对我而言，是问道解惑的赏心乐事。受访者各有成就，问答所及历史、新闻、小说、法律、民主、科学、哲学、艺术等，话题或有交叉，思想时有碰撞。虽然无法涵盖整个时代的思想世界，但是其间饱含着对人间的深切关怀，至少可以擦去我心中的一些问号。

我读过许多访问记，琢磨过口述历史，在思想与技巧上老老实实

地下过苦功。然而，访问工作越久，我发现自己提问的技巧越少，渐渐从一个“访问者”变成一个“聆听者”。甚至在整理成稿时，我会将自己的话一删再删，只起到一点起承转合之功，希望让读者更直接地听到受访者的心声。照我的经验，专业的提问固然重要，真诚地聆听也能引出谈兴。当然，彼此激荡出思想的火花，更是可遇不可求的。请恕我无思想家和演讲家的天分，只会认真地记录下受访者的话，尽聆听者和记录者的本分。

长久而言，我对历史充满乐观主义，但短期来看，我对现世常抱悲悯情怀。现世当中，往往是名与利威风凛凛，伪君子与真小人得意洋洋。而放诸历史长河，不朽速朽，喜剧悲剧，自有公道。如今身处浮世，反思乱世，向往盛世，但见时代的问题层出不穷，且泡两杯清茶，在闲谈中会心一笑。

目 录

余英时：恢复人的尊严	1
金庸：写小说是玩玩	21
袁伟时：启蒙是这个时代的命题	49
江平：我的中国梦就是法治天下	87
张灏：只有法制才能控制权力怪兽	103
金耀基：大学是知识创建基地	115
陈方正：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散步	133
刘笑敢：从庄子研究到文明反思	169
梁其姿：历史研究要关注弱势人群	187
孙康宜：重写中国文学史	199
张信刚：文化素质是各种学科的灵魂 ...	217
郑培凯：艺术拓展人类的心灵想象	233

余英时：恢复人的尊严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 年生于天津。1950 年至 1955 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 年至 1961 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著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等。

读书时代的一个秋夜，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闲逛，无意间走进了石景宜赠书室，在僻静的书架上找到一套从1966年到1996年的《明报月刊》。从此每日无事我便来翻这本杂志，无人争阅，我尽可悠然从创刊号一本本翻起，往往忘了时光的流逝。当时我正醉心于金庸的小说，偶然读到由金庸创办的《明报月刊》，竟如读武侠小说一样废寝忘食。对我而言，这套杂志是人生中的“文林秘笈”。

在《明报月刊》的作者中，余英时先生的文章，尤其使我心折。余先生在《涵养新知，商量旧学》一文中说：“我以为今日若想在文化方面有些贡献，有两个方面不能不注意：一是介绍和吸收西方的新东西，一是整理和融汇中国的旧东西，朱熹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大概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纲领。”我觉得他做学问便是如此。阅读印象里，《明报月刊》中《红楼梦》、陈寅恪之热，皆由余英时的思想火花碰撞而起，而从1966年起国史上的关键问题，常有余英时独到的见解。从此我格外留意余英时的著作，见一本买一本，如今细数书架上的藏书，余英时作品有四十余本，为我藏书中作者之首。

2005年夏天，我发愿在华人世界访问文化前辈，一入迷便乐此不疲。起因也许是早年的阅读经验，每读到心仪的前辈文章，不禁心向往之，而从事采访工作，常常能如愿以偿聆听真人教益。有时感觉就像和时间在赛跑，当望见前辈渐行渐远的背影，更使我自觉义不容辞。我无意中发现，无论是香港还是内

地的老先生，在闲谈中提到海外学人，余英时是中心人物。年岁越长，我对时代的关怀越深，对人生的困惑越多，所闻所思的问题，往往在余英时的著作中找到启发。于是，我到美国普林斯顿访问余英时先生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余英时先生家在美国普林斯顿郊外树林里一幢独立的房子，屋前有一个小鱼池，屋后有一片小竹林，格局与一般美国家庭不同。屋中大书房上挂郑板桥的书法“小书斋”。2007年，我在“小书斋”与余英时先生畅谈了五天三夜。别后，在电话里，我漫无边际地问道，余先生如春风般解惑。

余英时先生2006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享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后，余英时先生隐居“小书斋”中安静地著书立说，笔端深含中国情怀，思想影响华文世界。余先生曾用这种情况来形容历史人物康德和胡适：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中有人向康德立异，也有人和他同调，但决没有人能够完全不理睬他的学说。今天，学术界也将这种评价用于余英时。

在余英时的历史世界里，总是以“人”为本。在他看来，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从2002年起，他极力避免一般常用的“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尽量恢复“人”的尊严。

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李怀宇：现在的“国学热”似乎温度越烧越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余英时：我觉得没有真正的“国学热”可言。真正的学是不能热的。学是要冷冷清清长期做，如果要带一个“热”，就可以不考虑了。我看“国学热”本身跟国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

空了，要找东西代替：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很好的，我们不用向国外求什么，老祖宗的东西已经用不完了，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想法，才会搞出“国学热”来。

李怀宇：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所以必须倡导“国学”，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余英时：我想“人心不古，物欲横流”的说法，每个时代都能听见。不是现代才听见，古代就有了，汉代可以这样说，唐代可以这样说，明代可以这样说，现在还是这样说，什么才是把人心复古呢？从前提倡经学的人，就以为经学可以解决一切，中国人念经学念了几千年，去翻翻清朝《四库全书》提要，经学有多少书在那个地方？每一代都有发展，还不是继续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我想每个时代之间都有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万灵药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症，只能对症下药，要看是什么病。

李怀宇：在现代学术史上，“国学”一说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背景？

余英时：“国学”基本是日本的名词，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了，就是要恢复日本的国粹。先是对抗中国的汉学，后来又对抗西方的东西。这个“国学”后来就传到中国来了。当初经过许多演变，有叫“国粹”，也是日本传来的。后来中国有《国粹学报》之类，章太炎提出，这些东西有所夸大了，改用“国故”，他有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胡适他们提出“整理国故”，整理跟中国有关的历史种种。这样就变成中性的名词。

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名词。我的老师钱穆先生写过《国学概论》,他说“国学”这个名词恐怕也不是能持久的。我认为把“国学”变成某一种神圣美妙的意义,让它发生精神向导作用,恐怕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和考古学家李济之先生反对用“汉学”这个名词一样,不想把中国考古变成“汉学”的一支。

李怀宇:在学术研究上,通与专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余英时:在学术上,通与专是看个人的。有人愿意是专家,他不想通,对通没有那种意识。有人故意学通,那种是很虚的通,许多抽象的废话,听起来很冠冕堂皇,尤其是现在用西方各种理论的名词,人家也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我想真正求通是在专中求通,通中求专,两者分不开,没有具体研究,通什么呢?一到具体研究就进入专的领域。这专不是就事论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右有关的都联系起来,那就是专中有通,通中有专,不能空谈专与通。

李怀宇: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国学大师”,动不动就是“通才”?

余英时: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也是精神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一个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钱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李怀宇：那些顶尖聪明的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当大师？

余英时：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情。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聪明，中国人讲，这个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骂人的话，是赞美的话。西方经典《赞愚》中就说，越是愚钝的人越有智慧，愚钝的人不是言词辩诘，但是对人生有某些很深的体验。太聪明的人越是糟糕，聪明等于是一个工具，就像科技一样，用在好处也行，用在制造杀人武器也可以。这就是古人讲“术不可不慎”，做哪一行职业也要谨慎，如果做一个职业是杀人的，制造军火的，就希望世界越打仗越好，越打仗军火卖的价钱就越高。这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你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学者大师之类。

面对死亡而视为平常

李怀宇：一些在文化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到了晚年为什么会产生“不朽的焦虑”？

余英时：儒家讲死亡，就是面对它而视为平常，这是真的儒家精神。胡适到英国去见剑桥的大主教，就说：对死根本就不怕，死了就死了，没死以前就做我该做的事。这就是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活一天，我要尽一天责任。责任有很多，对子女有责任，对太太有责任，对父母有责任，对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有责任，能尽多少算多少，不能人人都靠你。尽我最大的努力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专业是研究历史，就是希望把我的历史研究好，不是曲解历史，不是为了某一种

利益而搞一个学说,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写一本人人都买的书。做历史研究也罢,做哲学研究也罢,得到某种程度的真理,把已经有的真理向前推进一步,那我的责任尽了。至于人家的评价怎么样,对你是不是欣赏,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认,这都不重要,这样你就心安理得了。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么样,这是心理上最难克服的问题。

人到老的时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记住孔子的一句话:“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年轻的时候是好勇斗狠,要跟人家拼打斗争,老年就越怕自己失去这个世界,越来越抓紧“得”。这个“得”不光是财,主要是名誉,人家承认不承认,受不受人家注意,怕寂寞。这就是黄宗羲早年讲的一句话:“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只要你不耐寂寞,什么事都会干。老年人就怕这个世界把他丢掉了,他没有地方可去了,没有东西可以抓得住了,所以一抓住一个东西,就占有,无所谓节不节了。越到老年越可怕,年轻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死亡,到了中年以后,死亡的威胁就存在了。

“不朽的焦虑”起源很早,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子产,不信灵魂不朽,认为魂、魄最后都会散失,这便引出《左传》上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以身作则,大家敬重你,觉得你是一个楷模,可以拿你做标准。立功是对社会有贡献,自然不朽,人家永远会记得你。立言是你说的话或者是知识上求真理,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能够创造出很新的想法,对一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那也可以不朽。这就是所谓三不朽,中国人把死寄托在这三不朽上。原来这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这样,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如果不想花那么大的功夫,又想不朽,有

什么办法呢？就做坏事。这就是东晋的桓温说的名言：虽然不能流芳百世，我也可以遗臭万年。遗臭万年也是不死，所以，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

李怀宇：为什么你现在把“知识分子”一词都改用“知识人”？

余英时：“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因为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我记得可能是看了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家陈原谈“分子”的文章。“知识分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了，所以我就不想再用“知识分子”。我给日本学界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识人。原来我也用知识分子，那就是随俗，因为语言应该随俗，但是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外国人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识人。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我要恢复人的尊严，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说读书人一样。第一次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讲这个问题，是2002年正式提出来的。以后我就尽可能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原来我们用习惯了的，语言本来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什么必要创新，可是我觉得“分子”这个含义现在太坏了。从前“知识分子”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我是受陈原的影响，日本人也用知识人，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李怀宇: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时:中国对人权是一样尊重的,到王莽时代有诏令,不能买卖人作奴隶,这比西方还进步,西方整个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视奴隶为当然。人都有权益,人都有尊严,这在中国早就有了。中国的观念跟西方的价值可以结合起来的。从前中国还有士大夫阶层来控制,政权也是开放的,开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举,要做官必须先考试,这个考试是比较公平的。从汉武帝开始,中央设有太学,地方上也推举人才再送上去。这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很好的事情,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时候一个是武士阶级,一个是有钱的商人可以有特权,然后是世袭的贵族。这些在中国很早就消灭掉了,世袭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就不可以实行了。唯一世袭的就是皇帝,这个没有人碰它。中国的政权很早便开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识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但这一开放并没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人便自觉地努力,想作进一步的开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这一思路在现代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潮流汇合了起来。

李怀宇: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就感激涕零,

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就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我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我想变成某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变成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为什么要做他呢？就算有一个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个人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没有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我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有跟我的环境有关系。如果从小没有八九年在乡下，我对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便不可能有亲切的认识，但我没有机会上现代小学、中学，便注定不能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了。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负。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钱，就能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别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美国的大学是民间引导政府

李怀宇：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讲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三个学校的关系特别有趣，像是祖父、儿子、孙子的关系：耶鲁是一群对哈佛不满意的学生建的，普林斯顿是一群对耶鲁不满意的学生建的，所以这三个学校有非常友好的关系，但是又有竞争的关系。你在这三所大学都任教过，这些第一流大学中有什么值得中国学术界关注与借鉴的经验？

余英时：美国各大学很难说哪一个是第一。美国常常有调查，最要紧的是看综合的力量，没有一个大学每一个系都是第一流的，就看第一流的系比较多，大概就是在前几名的，所谓常春藤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十几个，这些学校基本上水准都差不了太多的，要看你的兴趣是哪一行，刚好哪一个教授是你喜欢的。教授的著作出版一定要在很高水准的地方，不是随便出版，而且每一本出版的书，都要经过专家审核，不通过就不会出版的，不管你有多大名气，都不相干的。这种制度化是非常稳定的，大学出版社尤其是守得很严，这样才能使研究传统不断。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历史，每一行都有自己的学会。学报上的文章要靠同行互相监督，所以不可能有抄书的情况发生，一出现就身败名裂。

美国大学无论是公立的、私立的，都完全没有政治力量干扰。包括州立大学，由州控制预算，但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进行迫害，或者削

减经费，如果州的领导人是民主党，而教授都倾向于共和党，就想削减经费，这是做不到的。在美国大学要进行迫害是不可能的，因为实行长期聘任制度，如果做五年助理教授，自己够水准，质与量都达到要求，就可能升成副教授，一般在美国已经有长期聘约了。拿到长期聘约以后，当然还要努力，升到教授，要出版多少书，发表多少文章，学报的文章更重要，比书还要重要。写教科书，如美国通史之类，是升不了级的，因为在知识上没有原创性的贡献，只是综合一下，作为一个教科书。教科书在版税上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在学术上，对升级一点用都没有。不会因为你的教科书，学术地位就提高，这就是写通史或哲学概论不会在现在的学术圈子里占什么位置。这也应该让中国的学术界、知识界认识。

李怀宇：金耀基先生一直研究现代化与大学，认为欧洲成为欧洲世纪，美国成为美国世纪，都跟大学有很大的关系。

余英时：欧洲大学开始是宗教机构，所以神学很重要，最早大学都跟宗教有关系，长期聘任制度就是要保障教授不受宗教迫害，不受政治迫害。这个保障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更加强了，不是削弱了。如果没有这个保障，学术独立就很难了。而且出版书籍，国家没有一个出版检查制度，谁也没有资格检查，这是最重要的。没有一个机构说你思想不正确，就不能出版。

美国大学的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根本就分不开。美国就是靠教育，教育是最重要的进步资本，不是靠钱。钱是怎么运用到文化水准的提高，学术研究的进步，以及人文，还一时看不出来，最容易看的是科技。科技要是没有金钱，不可能发展。要花不知道多少钱，才

能够有一个新的发明。这个东西如果还考虑思想上正确不正确,那就完了。美国的进步,领先于其他的国家,就靠这一点。从前是英国领先,第二是德国,德国的研究院后来被美国搬过来了。哈佛大学最初只是大学教育,没有研究院,后来才按照德国的研究院发展高等研究。美国的国力是跟它的教育成正比的。现在无论从哪一方面,英国都是跟着美国走了。美国的教育经费非常多,英国的经费常常被政府掐得很紧。美国是除了政府以外,还有许多私人基金会有钱,甚至许多英国的研究院都要到美国来申请基金。

李怀宇:民间的力量对美国大学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推动?

余英时:大学当然是靠民间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大于政府的力量,才是健康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是头重脚轻,政治力量占第一位,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至少从现在看来,不是政治为主,而是以经济为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教会提供组织的能力,最早的私立大学都跟教会有关。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要“藏富于民”,就会出现私立大学。美国私立大学主要靠校友慷慨捐助,这是它的经济基础。十七八世纪,中国商人阶级兴起以后,许多书院都是靠商业的钱。美国的大学是民间引导政府。政府是一个组织,组织是把民间想完成的事情尽量完成,这样在选举的时候民众才会投你的票。不是倒过来要靠领导的,在美国开任何一个学术会议,不会有什么领导人来先讲话。没有人去找校长来训话的,大家会觉得很可笑,校长对这个东西不懂,讲什么话呢?

“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

李怀宇：就历史研究而言，为什么写通史在西方没有受到特别重视？

余英时：在今天西方，写通史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根本是教科书。一般专家不大愿意写教科书，这是服务性质，不可能研究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专家，要了解其他专家的意见。一般写通史几年后，就要修改了，知识进步了，又要重新来过，写得再好，没有超过十年二十年的。总而言之，通史不是大事情，得不到太大的重视。写通史的动机大概有两个：第一，写得好的话，市场大，可以拿到很高的版税，就发大财了，还可以设立基金会。第二，能综合一切历史知识写出一部大多数人接受的长篇叙事，这也是一种创造，给人一种满足。但一般而言，写通史不算原创性的贡献。

李怀宇：可是在中国，为什么许多历史学家把写通史作为梦寐以求的事？

余英时：中国很多史学家都梦想写通史，那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关系，通史在中国文化上的意义不同，我们理想的通史是司马迁式的，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不得了的大综合。或者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但《通鉴》已不算“通”，只能从三家分晋开始；还必须有七八个专家给他专门做研究，他自己写成最后稿本，现

在还保存一本司马光通鉴稿,看看别的专家的东西,他来改写贯通。但他的问题不像现在的通史,是给皇帝看的:怎么治,怎么乱,治乱的原因在哪里。有很清楚的目标,从历史上得一些统治的教训,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是一个镜子。我们现在是给谁写呢?写通史就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从文化观点,有的从平民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平民怎么想的,可是平民根本没有资料,农民每天耕田,晚上回家吃饭,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资料呢?他的感想不可能写出来,有人代他写出来也不能作为代表。今天写通史的情况不一样了。现在通史是教科书,“成一家之言”就不是通了,只是一个人的看法。写通史希望销路好,就不能成一家之言,是集众家之言,所以观念变了。在这种情形下,写通史要靠综合能力和叙事本领,与司马迁和司马光完全不同了。

李怀宇:不过一般人总希望买一本最好的通史,这样就可以方便地了解历史。

余英时:我完全同情这一看法,但不容易实现。希望只读一本通史便知道一切,是不现实的。只能期待多出现一些通史,可以比较,但这必须以完全的学术自由为前提,写通史一有顾忌,便写不下去了。

李怀宇:钱穆先生在抗战时写《国史大纲》有什么原因?

余英时: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有作用,有选择点。第一,那是抗战时期,要建立中华民族的信心,要讲中国的许多好处。第二,他认为五四批判中国是过头的。第三,1930年代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后,大

学要求中国通史是必修课。但是大家觉得没有一个人能教全部，所以第一年北京大学教通史是在北平找各个专家，像钱穆先生讲春秋战国秦汉、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隋唐。钱先生讲，这个通史，各自为政，是不通的通史，通史就要一个人通下去，他就一个人通下来。钱先生在北大教书最出名的就是中国通史，他是用一个人的观点大叙事。由于他的观点广阔，选材重要而全面，最后写出一部最好的通史。钱先生告诉我，范文澜在延安时期写的中国通史好多是运用《国史大纲》的材料，不过另外作解释就是，因为范文澜与钱先生从前认识的，他是黄季刚的学生。这可见钱先生在取材上大有长处。《国史大纲》至少做到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地步，但此书采用纲目体，言简意赅，不容易读，教的人必须有很高的史学修养才能胜任。

李怀宇：吕思勉先生写的中国通史又有什么特点？

余英时：吕思勉的通史很实在。第一，大段大段地引原文；第二，每一时代的政治叙事和制度变动分配得很平衡。吕思勉最早写的是《白话本国史》，那是很畅销的，第一次用白话来讲通史，但是也引起问题，就是提出岳飞并不是民族英雄，是个军阀，因为他自己在军阀时代，他看到岳飞那么蛮横，认为就是当时的军阀，那就引起大家痛骂。后来他写了其他的中国通史。作为一个特殊的史学家，他是很重要的，没有第二人做这样的工作，写这么多的专史，所以有人称他是通贯的专史学家。

李怀宇：在西方，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在学术上如何评价？

余英时：汤恩比的《历史研究》现在差不多没有人看了，在中国是另外一回事。汤恩比本人是一个很好的史学家。他把一生最多的精力放在《历史研究》上。我看了几乎所有专家对汤恩比的评论，每个专家都把他骂得一塌糊涂：这里错，那里错。专家指出错漏，某些大的东西不能成立，基础都被毁掉了，通史是建立在一些基础上，打开一看，基础不对。怎么办呢？汤恩比的《历史研究》作为一个尝试是了不起的，因为他的专长在希腊罗马史的范围之内，其他的像东南亚、美洲、墨西哥，他都要碰，那都是临时研究的，看看别人有些东西可以用。那就是很薄弱的基础，跟原来他自己的专长也不能比了。所以这个大屋建起来很堂皇，让外人看，都看不出哪一个房子好，哪一个房子坏，可是真正专家一看就穿了。汤恩比的《历史研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十大本，一个是节本。我认为看看节本就足够了，节本在大致上就有了。不过《历史研究》属于历史哲学一类，倒比较和中国原有的“通史”观念相近，而不是教科书。

李怀宇：为什么陈寅恪先生一生没有写过通史？

余英时：陈寅恪想写通史只有一个根据，就是他的表弟俞大维所了解在德国时期的陈寅恪。当时他收集很多刚刚出来的剑桥欧洲史，想写一本中国通史。我认为陈寅恪中年以后也没有这个想法了，只有早期俞大维的记载认为他想写通史。别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大家觉得他既然知识这么渊博，应该写一部通史，比别人写得好。但这是理论，以陈寅恪的文笔、写法，写得兴起，对细节一点不肯放手，那种写法不是写通史的笔调，通史的笔调是执简驭繁，是有一套功夫的。真要写通史，要在文章上下功夫。从前崔述写《考信录》，花三年

的时间学韩愈的文章，然后才能写，写通史也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李怀宇：有学者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余英时不写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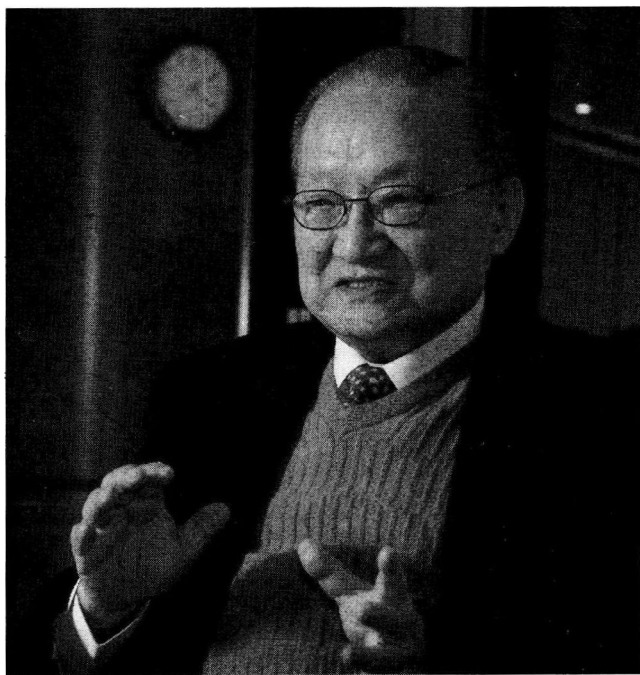
余英时：通史很重要，我也不是完全没有过写通史的冲动。但是我自己觉得花几年时间写通史，还不如在某一个特别的领域用几年真正深入地研究，可以产生新的知识，不仅是综合已有的知识。通史必须尽量求全面，许多专门领域，自己不甚了了，也得涉及。这也是我不敢下笔的一个原因。一再考虑，我还是觉得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专题研究上，贡献较实在。只要所选专题很重要，即可由专中透出通贯的见解。譬如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写成《朱熹的历史世界》，我自觉打通了宋代政治与思想之间不少隔阂，也有助于“通”。这是以“专”济“通”。

我决不是不重视写通史。我是学历史的，基本上讲的就是“通古今之变”的问题。古今怎么变化，那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在古今之变中，就有具体的如何“通”的问题。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说明，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传统的观念预设着一种全能的超越观点，好像上帝一样，可以看到全史的整体，所以在“通古今之变”上面还要加上“究天人之际”。史学家是人，人一定在地上某一个时空交叉点上，就会受我的时空交叉点的经验所限制，不可能看到想象中是上帝的眼光。哪一个史学家不是在时空交叉点上活着呢？离开时间和空间，能够存在吗？

李怀宇：你的唐代研究进行得怎么样了？

余英时：我现在看唐代相关的书，看完以后再看看要不要写什么东西。因为春秋战国、汉、魏晋、宋、明、清、现代各种时代我写过专书或论文，我还没有写过唐代，我要把唐代补起来，这样就联起来。我想看看唐代的诗人和禅宗，这是两个精神界的领袖。中国唐代最高的不是理学家，也不是经学家，而是禅宗和尚，创造了宗教。另外就是在唐代引人注意的诗人，因为诗人是领导一代精神的。我也注重中国的精神史，希望用我个人的观点把中国精神史贯通起来。不是说人人要接受我的看法，而是我自己要求一个贯通性。也不能说中西贯通，只能说我个人贯通。我自己需要有一个通盘的了解，为我自己。这是个人来讲，不然的话，就夸大了。

金庸：写小说是玩玩



(摄影：林津鹭)

金庸：本名查良鏞，浙江海宁人，1924 年生。曾任报社记者、编译、编辑，电影公司编剧、导演等。1959 年在香港创办明报机构，出版报纸、杂志及书籍，1993 年退休。先后撰写武侠小说十五部，影响深远。

香港明河社的门口挂着金庸先生手书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先生的办公室是一个宽敞的书房，落地窗外，维多利亚港的无敌海景尽收眼底。访谈的休息时段，我忍不住随处看看书架上的藏书，其中一面书架是各种版本的金庸作品集，华文世界的繁简体版外，还有多种译文。

金庸先生乡音未改，闲谈中多次提起家乡：“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是我的表姐，当年我到杭州听她唱歌。”2008年，浙江大学请金庸任人文学院名誉院长，海宁则办了一个金庸书院。第二次访谈时，金庸先生随手从衣袋中取出一张浙江同乡会的邀请函让我看。现在常常一起吃饭的朋友是有同乡之缘的倪匡和陶杰。

我提起围棋，金庸先生谈兴甚浓。“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他颇为欣赏，“以前我兴趣最好的时候，请陈祖德、罗建文两位先生到家里来住。”而他与余英时先生的交往，多与围棋有关。他笑眯眯地说：“余先生喜欢下围棋，他棋艺比我好一点。余先生的岳父陈雪屏围棋下得很好，好像你要娶我女儿，先下一盘棋看看。”我听了这种“小说家言”，不禁笑道：“我听余先生讲，他和余太太陈淑平谈恋爱的时候，还不认识陈雪屏先生，是等到结婚七年后在1971年才正式见到陈雪屏先生。”事后，我专门为此事问

过余英时先生，余先生听了哈哈大笑。

金庸先生提起老朋友黄永玉、黄苗子、郁风的旧事，感慨郁风过世了。对书画，他时有出人意表的品评，偶尔在家也提笔挥毫，又提起启功先生：“启功来香港见我，我写几个字请启功先生教教我，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绝不可以临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风格，一学碑帖，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了。不学碑，不学帖，你的字将来有希望。’我说：‘启功先生，你这句话是鼓励我。’他说：‘不是鼓励，你的字是有自己的风格。任何碑帖不可碰。’我说：‘我碑帖没有学，但书法极糟。’”

金庸先生好奇心极重，不时主动问起我访问过的学者近况。余英时、金耀基的师承与学生的趣事，金庸先生听得兴味盎然。我提起余英时先生的学生陆扬和金庸先生的老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相熟，两人见面时曾细说金庸在剑桥大学研究唐史之事。又提起余英时先生现在戒烟，金庸先生说：“抽烟抽惯的人，要戒很难。邓小平当年见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年纪大了，人家劝我戒烟，我不能戒，戒了反而身体不好。’”

和金庸先生畅谈两个下午，我恍觉曾经听说“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原来只要是他感兴趣的话题，讲起来也像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我们的话题焦点始终并非武侠人物，而是学界中人，南下香港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远渡重洋的杨联陞、陈世骧、夏济安，一一道来，如同江湖一样好玩。

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

李怀宇：我特别感兴趣你在剑桥大学读书读得怎么样了？

金 庸：剑桥大学先给了我一个荣誉博士，剑桥的荣誉博士很难的，排名在一般教授、院士之上，所以我再申请念博士，他们说：不用

念了，你这个荣誉博士已经比他们都高了。我说：我的目的不是来求学位，是来跟这些教授请教一下，念书。后来校长就同意了。在剑桥念博士有一个条件，就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如果是人家写过的文章，就不要写了。那么，教授委员会有二十几个教授，他们要我提准备写什么东西。

我首先提到一个匈奴问题，因为中国学者认为在汉朝时，卫青、霍去病跟匈奴一打仗，匈奴打不过，就撤退到西方去。西方人就不同意这种讲法，认为匈奴是在东亚、西亚、中亚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民族，所以跟中国讲法不同。我准备用中国的史料写关于匈奴的研究，有一位教授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专家了，他用匈牙利文讲了一些话。我说：我不懂匈牙利文，对不起，你讲的意见我不懂。他说：这个意见已经翻译成法文、英文了，如果你去匈牙利，我可以推荐你，你可以念三年匈牙利文再来研究这个问题。我说：我年纪也大了，再去念匈牙利文恐怕不行了。他说：你最好另外写一个问题。

我就想写一个关于大理的论文，因为我到云南去，大理送了我一个荣誉市民称号，送了我一块地：如果你喜欢在这里住，我们欢迎你。我说：我有一些研究大理的资料，也去过几次，我写大理成立一个国家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大理是很好的，西方也不大了解。不过，有一个教授就讲了许多古怪的话，我也不懂，他说：这是藏文，本来南诏立国是靠西藏的力量来扶植的，所以大理等于是西藏的附属国，后来唐朝的势力扩张过去，才归附唐朝，大理跟西藏的关系是很深的。我说：我也不懂藏文。他也觉得写大理不大容易。

那么，我就考虑到中国考古学家从西安发掘出来的东西。以前说唐朝玄武门之变，兵是从东宫从北向南走，再打皇宫。我说这条路线不通的，为什么要这样大兜圈子呢？直接过去就可以。所以，我心

想唐朝写历史的人,是在李世民控制之下的,他吩咐这样写就这样写了。我研究发现是皇太子和弟弟过来,李世民在这里埋伏,从半路杀出来,把他们打死了。历史上这条路线根本就是假的,因为李世民作为弟弟杀掉哥哥不大名誉。教授说:有没有证据?我说:证据就是发掘出来,东宫在这儿,皇宫在这儿,过去就方便了,这样大兜圈子不通的。我认为唐朝的历史学家全部受皇帝指挥,不但是唐朝,从唐朝、宋朝,一直到现代,所谓真的历史全部是假的,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原来历史学家完全是皇帝叫他怎么写就怎么写,现在的历史学家还是一样,还是假的。哪个人打败了,胜利的人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现代的照片都有假的,我说唐朝的历史也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剑桥大学的教授就说:那你写这个问题好了,其中怀疑的地方必须要有历史根据。我说:中国历史上忠直的历史学家很多,但是假的历史也是很多的。所以我认为玄武门之变的那一段历史中有些假的,那些教授就一致同意:这个问题蛮好的,而且在外国人中没有人提过,你把这个问题写出来。我的硕士论文就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的内容:《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得了很好的分数。

李怀宇:现在你的博士论文准备写什么?

金庸: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安禄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儿子荣王去抵抗,后来这个荣王死掉了,历史上也没有讲为什么会死掉了,他手下的两个大将也给皇帝杀掉了,我说这中间一定大有问题,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把两个大将杀掉了。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了,

而且他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

我的导师也同意。我就认为中国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民主，从唐太宗开始，到宋元明清，都是所谓“枪杆里出政权”，哪个人兵权在手，就是哪个人做皇帝。我要在这上面发挥。我的导师就说：你这个意见蛮好的，可以写，尽量找点历史根据。外国论文好像跟中国论文没有关系的，外国人写论文，一定要有历史根据的，完全没有根据，自己想出来是不行的。我说：好吧，我会找根据。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宪法是讲皇帝的皇位应该传给嫡长子的，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哪个会打仗，就传给哪个。中国是不讲宪法，讲兵权，外国也讲兵权，但是外国做得表面上漂亮一点。

李怀宇：那你的博士论文规定什么时候要交？

金 庸：博士论文本来规定要到剑桥去念的，一方面是我年纪大了，另外一方面我已经得到荣誉文学博士，地位比校长还要高。教授委员会决定我可以不在剑桥做研究，要研究中国历史，在香港也可以，在北京也可以，在西安也可以。我的指导老师麦大维年纪大了，已经退休了，他要等我两年，两年之内把博士论文写好。他常常到香港来的，他以前在香港住过，他的大女儿喜欢中国，所以在云南大学念中文。

李怀宇：你原来在剑桥大学读硕士时住了多久？

金 庸：我在剑桥大学真正读书差不多两年。在剑桥大学，本来我骑单车就很快过去，我太太说：年纪大了骑单车很危险，汽车也不

大守规矩。所以要我坐的士去上课,坐的士就很贵,差不多一百块钱港币一次,也是她陪我去的。后来,我去一次,我的老师也会骑单车到我家里来教一次。

李怀宇:你可能是剑桥大学历史上最老的学生吧?

金 庸:是啊。剑桥大学校长到这儿来筹款,说:剑桥大学现在你是年纪最大的学生,我们最喜欢。

李怀宇: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你过了八十岁,还到剑桥大学去读书?

金 庸:因为剑桥大学有学问的人多,教授虽然只研究一个学问,但是一门功课很复杂的问题他都了解。

李怀宇:可是你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拿了荣誉博士学位和教授称号,还是那么感兴趣到大学读书?

金 庸: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历史学家认为投向清朝的那些有学问的人是汉奸,现在我们的种族观念跟以前不同了,不大分汉族、满族,大家互相团结,互相帮助。我到北大演讲也主要讲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是兄弟民族,汉族办得不好,满族管管中国也不差的。

李怀宇:《书剑恩仇录》的民族观念就比较浓一点,到了《鹿鼎记》

已经没有太强的民族观念了。

金 庸：进步了。我到了《天龙八部》已经很反对这种民族观念了。

李怀宇：我听说你的小说封笔之后，有人问你有什么感兴趣的事，你说想写一本中国通史，现在还有这个兴趣吗？

金 庸：我研究历史越多，越来越觉得困难了，历史的观点也不同了。北京大学有一位教授苏秉琦先生，现在过世了，他说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我们用汉族观点，满族人来侵略我们，投向满族的人就称为汉奸。我的观点跟苏先生一样，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各种种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一起发展。还有一个怪圈，他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的观点来硬套到中国头上，是不对的，中国历史的性质跟外国历史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有一个观点我是很同意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因为经济问题，经济因素是很重要的。有人认为中国历史要经过五个阶段这一套，苏先生认为是不对的。我觉得苏先生这个观点对，中国历史不是照西方这样发展的。

李怀宇：余英时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到了中年以后，已经没有写中国通史的想法了。

金 庸：我将来还是想写中国通史的，但是我觉得越来越难了。当时年纪轻，还不知道这样难，觉得照以前钱穆或者范文澜的中国通

史改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我觉得他们很多都写错了,其实中国通史不应该照朝代来写,应从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一路发展下来,你到西安看看,到杭州看看,哪一代的文化,不应该照朝代来写,而是照文化来写。中国通史是很复杂的。

李怀宇:其实你的一些历史观点已经表达在小说里了。

金 庸:像明代最后,李自成的手下到了北京城以后就奸淫掳掠,有些朋友就不赞成我这样写,他们认为李自成很好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老师,专门把李自成放纵部下在北京做很多坏事的资料给我,我把这些资料都写到里面。

李怀宇:你是不是对明代历史读得比较深?

金 庸:明代历史比较懂,明代、清代跟现代比较近一点。

李怀宇:有人考据说,《笑傲江湖》就是发生在明代的。

金 庸:噢,有人认为《笑傲江湖》就是明代的故事。

李怀宇:你的小说没有写过唐代,但是论文现在写到唐代了。

金 庸:我觉得唐代历史比较难写一点,因为唐朝离开我们太远了。我的《射雕英雄传》最早写到宋朝,宋朝还可以,唐朝的人坐在地下,喝的酒、茶跟现在不一样,宋朝已经跟现在不大同了。唐朝在中

国历史上是辉煌的，但是唐朝的生活习惯我不大了解，所以我不写，因为写武侠小说要写到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

李怀宇：我听说你对《资治通鉴》读得非常熟。

金 庸：因为那时候《资治通鉴》比较好看，容易看，我小时候在家里没有事，看《资治通鉴》像看故事一样，我觉得文笔好。

李怀宇：你做新闻的信条是什么？

金 庸：英国报人史各特(C. P. Scott)讲，“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Comment is free, but the facts are sacred)，事实很重要，不能够歪曲，官员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这个事实不能歪曲，但是评论可以自由。我们的意见可以不同，但是根据的同样一个事实是不能歪曲的。这一点是我们办《明报》必要的信条。

李怀宇：你从《大公报》出来，到了三十五岁时自己创办《明报》，重要的缘故是什么？

金 庸：我在《大公报》工作时，《大公报》还是独立、自由的，所以《大公报》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我考进去，当然希望讲真话，后来经过大跃进，全部讲假话，我说这个报纸不行了。大跃进饿死过

人,它还是讲一亩地出不少粮食,我讲这是假的,我亲自到广东去参观过。

李怀宇:后来《明报》还跟《大公报》打过笔战?

金庸:他们要来打《明报》,《明报》就退让,不跟它真正地打。他们打到《明报》门口,工人就把铅熔化了,放在楼上:你们过来,我们就倒下来。他们也不敢过来了。

李怀宇: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时,中国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

金庸:《明报月刊》的态度还比较温和一点,有些内地的学者或研究机构还可以订。《明报》就是跟“文化大革命”对着干。我说过办《明报》是拼了性命做事。幸亏最后没有死,那是运气好。

李怀宇:当时你和朋友姜敬宽通信时,就认为《明报月刊》的风格想办成“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

金庸:对,那是很公正,凭良心讲话。到《明报月刊》四十年时,我还是讲:我当时是拼着性命来办的,准备给打死的,结果没有打死,还好。他们觉得我很勇敢,我说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广州,勇敢才了不起。香港这个环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

李怀宇:你投入到办报的精力比写小说的精力更多?

金 庸：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李怀宇：当年《明报》凝聚了香港很多重要的报人，像林行止、胡菊人、董桥……

金 庸：现在董桥在《苹果日报》当社长，没有联系了。林行止有时候见面，他的《信报》卖掉了，但是有合同要他主持。胡菊人在温哥华，也没有联系了，最近《明报月刊》四十周年，请他回来了，他身体不太好。

李怀宇：胡菊人主编《明报月刊》光芒四射。

金 庸：后来因为台湾有一个报纸叫《中报》，到香港来办《中报》，请他去做总编辑，他就过去了。

李怀宇：你跟同辈的罗孚先生、梁羽生先生还有联系吗？

金 庸：我跟他们都是《大公报》同事，后来办《新晚报》。罗孚和梁羽生都是我的好朋友。罗孚常常见面的。梁羽生跟我也要好的，现在澳洲，生病生得很厉害，我准备过年的时候去看望他^①。他在香港中风进医院，我去看过他。现在我年纪大了，以前很多老同事都过世了。

^① 梁羽生于2009年1月22日在悉尼因病去世。

李怀宇：跟新闻界的晚辈交流多吗？

金 庸：我跟学生讲：你们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这是唯一的标准，不能跟我在香港那样写文章，我在香港是拼了命来做的，我是准备把性命牺牲，把报馆也准备让他们铲掉了。你们现在不能牺牲性命，牺牲报纸事业，你的报纸事业还没有牺牲，人已经先被炒了鱿鱼。如果做坏人的话，不做报纸也可以做坏人，男人可以做强盗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宁愿做坏人的话，不一定做新闻工作，什么坏人都可以做。假设浙江一个高官老是贪污，老是欺压老百姓，你写一篇文章美化他，违背良心，这是不可以的。这些同学就接受这个观点。香港的新闻自由在以前英国人统治的时候，跟英国是完全一样的。

李怀宇：你在香港办报纸和写小说，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

金 庸：最核心的精神是讲老实话。中国好的，我就讲好的，讲大话，我就揭穿他的大话。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写正义的人，好人就讲他好的，坏人就讲他坏的。社会上有这种人，我就要把他表现出来。

我喜欢改自己写的文章

李怀宇：听说你现在还在改自己的小说，是真的吗？

金 庸：现在不改了，已经改了三次了，第三次已经改完了。《碧

血剑》、《天龙八部》、《雪山飞狐》改得多。我第三次修改，陈墨提了很多意见，我都接受，主要意见是《侠客行》、《飞狐外传》、《雪山飞狐》。

李怀宇：还会再改小说吗？

金 庸：第四次将来过十年再改吧。

李怀宇：沈从文先生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张兆和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改了，越改越没有以前那么好。

金 庸：小说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看总是觉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人家的作品我觉得不好，但是不好去修改人家的。

李怀宇：你是自己喜欢改还是听了别人的意见才去改？

金 庸：自己喜欢改自己写的文章。鲁迅也讲，一篇文章写好了放在那里，不要发表，过十几二十天拿出来看看，觉得不好，再修改一下，又觉得好一点，还是放在那里，再一年半载拿出来看看，再改一下会好一点。

李怀宇：你的小说在四十八岁以前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就写完了，后来做了第一次修订，还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

金 庸：我自己不是好的作家，好的作家都是这样子的。托尔斯

泰写《战争与和平》，写好以后要交给印刷厂去付印了，印刷工人觉得这个字勾来勾去看不懂，他太太就重抄一遍，抄好了放在那里。托尔斯泰看这完全是根据自己修改的来抄，当然好得多，但是他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糊涂。印刷工人还是看不懂，他太太又帮他抄一遍，托尔斯泰又把它改了。所以自己写的文章，一定可以改的。

李怀宇：问题是人家觉得你的小说已经可以不朽了，还要那么改？

金 庸：不敢当，不敢当！我这个明河社是专门出我的小说的，我修改之后要重新排过，每修改一次要花很多钱的。普通作家写了以后，叫他修改一个字，他也不肯修改的，改一个字花钱太多了。这个明河社本来是可以赚钱的，赚的钱都花在修改上面。普通作家没有这个条件，给了印刷厂，印刷厂就不肯给你改的，要拿回来修改一个字也很麻烦的。

李怀宇：你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改自己的小说吗？

金 庸：当时看看改过已经不错了，但是再过十天八天看看，觉得如果这样写会好一点。我写武侠小说还是比较认真，比较用心的。

李怀宇：有人说，你是中国历史上最畅销的小说家。

金 庸：我的小说容易看，像沈从文的小说我比较喜欢，但是比较高深，比较难懂，鲁迅的小说也很好看，但是我的小说比较热闹。

李怀宇：如果没有香港这个地方，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小说？

金 庸：在内地不可能，在台湾可以，古龙也蛮不错的。

李怀宇：你相信一百年以后还有人读你的小说吗？

金 庸：我希望有。

李怀宇：你有没有想过“不朽”的问题？

金 庸：创作没有人生这样好，人生可以不朽，创作故事很难不朽。

李怀宇：你的小说大概是在中国最多被改编成为电影、电视的吧？

金 庸：很多改编把我的小说歪曲了。香港人看了也不满意，他们说：如果你有金庸这个本事，自己写一个好了。他们不会照我原来的小说这样拍的。

李怀宇：张纪中拍的电视剧改编得怎么样？

金 庸：我跟他说，你改了，我不承认。他拍的，我有些看，有些不看。有些拍不好，我就不看，我跟他说你有些拍得不好。

李怀宇：我觉得《天龙八部》拍得比较好。

金 庸：《天龙八部》没有什么改动的。以前我说：你不要改了，要改不如让编剧自己去写好了。编剧写不出来就没有本事吃饭了。

李怀宇：其实你在创办《明报》之前就已经做过电影编剧，你的很多小说一章一节就是电影、电视的写法。

金 庸：是的。我写剧本，当时是共产党领导的左派电影公司，他们要讲阶级斗争，讲贫富悬殊，要打倒有钱人，但是电影老是讲阶级斗争，人家是不喜欢看的。

李怀宇：你原来看过许多西方电影，然后把电影手法融入到小说里？

金 庸：对，西方电影、电视我都看。当时在香港写影评，就每天看一部电影，香港放电影很多的，每天看一部都看不完的。现在没有这么多电影看了。

我不到香港来，那就糟糕了

李怀宇：我到北京访问过李君维先生，当年他跟你一起考进《大公报》。

金 庸：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跟我一起考进《大公报》的。我到香港来跟他有关，本来要派他到香港来，他刚刚结婚，不来香港，那么，报馆就派我来了。他现在怎么样？

李怀宇：李君维年轻时写小说很像张爱玲，非常可惜，后来几十年都不能写小说了，就在北京的电影公司任职。他自己说：“1949年后，我所写的小说从内容到文字已不适应时代的号角了，只好收摊。”

金 庸：这个人蛮好的，当时在上海，他穿得漂漂亮亮的。如果他不是结婚，派他到香港来，我就不到香港来，那我就糟糕了，我在上海要经过反右，一定反进去，“文革”一定糟糕，反右和“文革”两次一定非常糟糕的。说不定“文革”的时候就死了，武侠小说也不会写了。李君维后来不写文章也好，逃过反右，逃过“文革”了。

李怀宇：人生有很多偶然性。

金 庸：我和李君维相识也是非常偶然的。我在中央政治学校念书，后来给学校开除了，那时候孙国栋比我高两班，也是历史学家，周策纵也是校友，我们学校最出名的就这两位。孙国栋就讲柏杨翻译《资治通鉴》有很多毛病。柏杨第一次来香港，我跟他辩论了一次。他认为秦始皇很好，我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我们辩论得好激烈，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秦始皇对中国有贡献。那时候张彻、董千里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家围攻他一个人。后来我们不谈了，去吃饭。讨论学术问题也不损害友谊，后来我们也是蛮要好的。这个是很奇怪，柏杨其实有很多意见

很好,像“酱缸”,“丑陋的中国人”,讲秦始皇这一点,中国历史学家讲秦始皇好的就很多,我认为不好。张艺谋也讲秦始皇好。

李怀宇:后来张艺谋拍《英雄》不就说秦始皇好吗?

金 庸:人家来访问我,我说:“张艺谋拍《英雄》一塌糊涂。”

李怀宇:你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心理,觉得自己没有很完整地读过大学,所以退休之后想到大学里去读点书?

金 庸:我喜欢读书,我觉得跟大学生做做朋友很有味道的。年轻人说什么话也不客气的,大家放肆地随便讲,在浙大,在北大,跟这些同学谈天蛮好的。

李怀宇:当年你在中央政治学校被开除是怎么回事?

金 庸:我到台北,我的表哥蒋复璁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做院长。他是我们海宁人,我们海宁地方小,世家大族通婚姻就这几个人,所以徐志摩、蒋百里、蒋复璁都是我的亲戚。蒋复璁带我去见李济、屈万里,我说,以前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书,蒋介石是我们的校长,一听到蒋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礼,我就说:“对校长当然要尊敬了,可是这样子就像对希特勒一样。”那些学生就打我:“你为什么把我们校长比希特勒,怎么可以比呢?”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了,说:“你污辱校长。”我说:“我对校长很尊敬的。”这一次到台湾去,现在政大的校长说:“查先生,以前我们把你开除了,很对不起,现在言归于好,好不

好？”我说：“我当时应该开除的，我把校长比作希特勒。”他说：“我们言归于好，送你一个文学博士，你接不接受？”我说：“当然接受，不是言归于好，是我向你们道歉。”我和张忠谋、林怀民三个人一起拿了文学博士。

我在政治学校是念“外交系”，现在“外交系”这些年轻学生都是我的师弟师妹了，他们让我去演讲：我们现在台湾念“外交”有什么出路？我说：你们学外语，现在台湾“外交”当然没有什么希望，你们学一些偏门的外文像阿拉伯文或非洲的文字，将来你是唯一懂阿拉伯文、非洲文的人，人家如果跟他们做生意，非得请教你不可。这些师弟师妹们很兴奋，见了我就问学什么文字好，我说东南亚这些小国家文字、伊朗文、土耳其文都有用，他们以后就去研究这些文字了。

李怀宇：你到台湾去得多吗？

金 庸：那时候蒋纬国生病得很厉害，我去看他。我就跟蒋纬国讲：陈水扁在搞台独，你一定要反对台独。他说：查先生，我现在每天都在反台独，他讲台独，我就骂他。我最反对台独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搞台独呢？后来蒋纬国的家私都给陈水扁拿出来抖在街上。他说：我也不行了。

李怀宇：李济、屈万里、张光直都过世了。

金 庸：我认识的这些人都过世了。我的表哥蒋复璁研究宋史的，他也过世了。沈君山中风了，以后能不能走路都不知道。柏杨生病的时候，我去看过他，他这个人蛮好的。

李怀宇：余光中最近刚过八十大寿，他的诗名气很大。

金 庸：余光中是因为温家宝喜欢引他的诗，引了他几次所以名气很大。他最近不大写什么东西了吧。他如果再早一点，跟徐志摩他们写文章，这样子蛮好的。生得迟了！

徐志摩是我表兄。他爸爸是哥哥，我妈妈是小妹妹。他跟我妈妈差不多同年，现在已经一百多岁了。他的诗比散文好一点。

我不赞成有“金学”

李怀宇：人家说“香江四大才子”，是金庸、倪匡、蔡澜、黄霑。

金 庸：这个讲法靠不住，不对的。倪匡本来在美国的。倪匡最滑稽了，讲笑话。从前写书的时候常常和蔡澜在一起，我跟蔡澜讲：你讲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他是新加坡人，喜欢的东西我全部不喜欢，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没有关系，你推荐的东西我就不吃。倪匡和陶杰跟我比较投机，陶杰的妈妈是我们杭州人，他父亲做过《大公报》副总编辑。

李怀宇：我和陶杰那次见面是在晚上十二点以后，我问他：香港谁的文章写得最好？他说：金庸。

金 庸：他妈妈跟我同乡，他爸爸跟我同事，倪匡跟我同乡，吃的

东西差不多。跟蔡澜先生就完全不同了。

李怀宇：我又问陶杰：金庸之后谁的文章写得好？他说：董桥。

金 庸：董桥在《苹果日报》，我跟《苹果日报》这些人都不往来的。他年纪大了，兴趣在古董字画上面了。

李怀宇：当年胡菊人和董桥主编《明报月刊》各有各的精彩。1966年《明报月刊》的发刊词写得真好，是你写的？

金 庸：是啊。后来也登了余英时和姜敬宽的信。我和胡菊人先生去访问过钱穆先生一次，钱先生的眼睛瞎了，报纸、书都是他太太念给他听。

李怀宇：钱先生晚年的《晚学盲言》就是由他口述，钱太太记录的。他讲话无锡口音重吗？

金 庸：无锡口音跟我是一样的口音。

李怀宇：钱锺书也是无锡人。

金 庸：无锡出了很多名人。章太炎先生在无锡也教过书，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也是有名的。钱锺书先生送了一套书给我，写一句“良镛先生指教”。我说《管锥编》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他送给我书，我就写了一封信多谢他。钱先生写信很客气，但是口头讲话就不

留情面的，很锋利。

李怀宇：钱锺书对陈寅恪是很有看法的。

金 庸：钱锺书写东西一点一点，写《管锥编》不成为一个系统。陈寅恪喜欢成一个系统，自己有前后，成为一个系统不容易，中国历史研究成为一个系统，这中间一定有毛病。

李怀宇：关于陈寅恪，余英时先生与汪荣祖之间的观点不大一样。

金 庸：他们两个意见不同的。余先生大概不赞成陈寅恪的意见。汪荣祖崇拜陈寅恪，一面倒，对陈寅恪很明显的毛病他也视而不见。陈寅恪在北京，在广州，不到台湾去，余先生觉得他不到台湾去，好像心里很苦闷，当时大陆有些学者就认为他自己不愿意到台湾去。

李怀宇：余英时先生关于《红楼梦》的观点也跟一般的“红学家”不同。

金 庸：余先生关于《红楼梦》的想法我很欣赏，一般人不是研究《红楼梦》，是研究曹雪芹，我就认为这个作品可能不是曹雪芹作的，作者如果不是曹雪芹，研究曹雪芹根本是错的。余先生的研究方向我觉得是对的。

李怀宇：余先生也不是专门研究《红楼梦》，只是玩玩，当时正好中文大学有个演讲谈《红楼梦》，后来成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金 庸：潘重规先生在中文大学的时候，我跟他也熟的，潘先生就是“索隐派”，他认为《红楼梦》是反对满清。

李怀宇：你自己对《红楼梦》看得多吗？

金 庸：我自己看得不多。我认为《红楼梦》不见得是曹雪芹写的，完全没有证据证明是曹雪芹写的，现在有人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一写几十万字，我觉得这个路线可能是错的。如果最后证明这个小说完全不是曹雪芹写的，那研究完全是空的。冯其庸先生跟我也是好朋友，但是我没有跟他谈这个问题。需要肯定作者是谁，如果连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没有用的。

李怀宇：现在除了“红学”，人家还提出“金学”。倪匡先生说，“金学”是他开创的。

金 庸：我不赞成有“金学”！

李怀宇：余英时先生家里有一套你送给他的金庸作品集，他说睡觉前看一看。

金 庸：余英时先生跟我下过一盘棋，我认为他的棋比我好，因为他一开头不小心让我占了上风了，没有办法转，结果这盘棋他输了。我到现在为止还是认为他的棋比我好。

李怀宇：现在普林斯顿没有人陪余先生下棋了。

金 庸：我也没有人陪我下棋了。我看了很多书，花巧很多，余先生都知道，一路下一路讲给别人听，胡菊人先生在旁边。

李怀宇：余先生以前跟沈君山先生还参加过新英格兰的围棋赛。

金 庸：我们几个人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我三子，让余先生两子，我跟余先生还不及沈君山。牟宗三先生就比我们两个差一点，他的棋瘾很大，我请他星期天来下棋，他一定来的。

李怀宇：以前余英时先生和张光直先生在哈佛大学谈武侠小说，严耕望先生从来不看武侠小说，听他们谈，最后受感染了，临行时向余先生借了一部武侠小说作为途中的读物。

金 庸：严先生算不算余先生的老师？

李怀宇：不算，是师兄，他们都是钱穆先生的学生。很有意思，黄仁宇先生比余英时先生大十二岁，却是他的学生。

金 庸：余先生的学问做黄仁宇的老师绰绰有余，我认为黄仁宇非常不对，余先生教得不好。余先生学问很好，不应该教出这样的学生来，这个学生很差。余先生我很佩服，可是余先生这个学生我一点都不佩服。

李怀宇：在哈佛大学的学者，王浩也非常迷金庸小说。

金 庸：我见何兆武先生，何兆武先生跟王浩是好朋友，他就跟我讲王浩，王浩很迷武侠小说。我到浙江大学去，何兆武先生推荐一个学生来考我的博士，这个女学生是研究五行的，我说：我不懂五行，你另外去找导师吧。浙江大学束景南先生就比我更懂。照我了解，五行是迷信，没有什么意思。

李怀宇：许多我采访过的先生都喜欢看你的武侠小说。

金 庸：他们拿武侠小说来换脑筋。很多科学家喜欢武侠小说，北京天文台发现一个行星，来征求我的意见，叫“金庸星”，我说：那欢迎得很。这些天文学家说：我们空下来就谈金庸小说。

李怀宇：很多人给你写传记，你自己看吗？

金 庸：人家写的传记不对，全部是假的，我可以肯定讲一句，完全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谈过。我自己不写自传。写自己的事情，有好的，有坏的，坏的事情自己不大会写的。一本书全部讲我自己好的，那这本书就是假的。

袁伟时：启蒙是这个时代的命题



(摄影：姬东)

袁伟时：1931年12月生，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曾任中山大学中山市分校——孙文学院院长。著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近代中国论衡》、《大国之道》、《文化：中国与世界》、《风骨·风情·人生》等。

袁伟时先生总是不老。我常常忘记他已经八十岁了，有时一个电话打过去，一聊就是半个钟头，随时约他吃饭，好像每一次他都有空。聊天是他的赏心乐事，总不显累。有一次吃饭时，我问起养生之道，他笑道：“我在饮食上是一等良民，‘四不’：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内脏和动物脂肪，不吃辣；‘五多’：青菜，水果，鱼，脱脂奶，杂粮。”他的生活习惯是早睡早起，每天早晚做广播操，早晚各走一小时路，步速飞快，名为“天天走一万里路，日日干八小时活”。

袁先生比我年长四十五岁，却比我乐观，我总觉得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客厅里挂着书画家尚涛写的古代格言：“虚能养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他说，家里还藏有一方闲章，印文是“不疑不悟”，边款全文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袁师着以黄宗羲句制印。丁丑冬陈小敏记。”他在学术研究上总抱着怀疑精神，在历史中时有发现，自得其乐之余，也一再遭到莫名其妙的压力。面对不平之事，我记得他不只一次用广州话说：“天跌下来当被𠵿(盖)。”

多年来经历的曲折与甘苦，袁先生置之一笑：“背后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我想以后应该写出来，让历史的小浪花和人间百态白白消逝了有点可惜。”而他在聊天时碰撞的思想火花，更是精彩，但愿有机会公诸同好。

我常想，袁伟时的人生是中国 1930 年代之后典型的时代缩影。早年左倾，中年蹉跎，晚年反思，一以贯之的梦想和追求是国泰民安，其间“心史”绝非

生于安乐年代的晚辈所能体会万一的。我常常有劝他写心灵自传的冲动，但见他对新的研究课题乐此不疲，便按下不表。多少次的闲谈，我没有记录，有一次专门细细地问起他的学思历程，如今记下来也显零散。

1931年12月，袁伟时生于广东省兴宁县罗岗蕉坑村善述围。祖上是地主，人丁兴旺，家道宽裕，他的伯父袁树森是以回力牌鞋子和轮胎著称的上海正泰橡胶厂的高层管理人员，父亲袁俊森在汕头是正泰橡胶厂粤东地区的代理商，还经营汽车运输等生意，但在童年的记忆里，袁伟时印象最深的是人间的苦难。从小学到中学，他目睹了遍地饿殍、路有冻死骨的景象。小学时，他常见家乡土地庙冻死的乞丐。初中时，他穿过城楼，不时见到死尸。1943年，他在兴宁县城老街的良友照相馆见到人吃人的大照片。高中时，学校旁边是方便医院、棺材铺、善堂，常见收尸之事。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使袁伟时一生都梦想中国的富强。

袁伟时从小就是书迷。杂读古典名著和武侠小说，憧憬侠义情怀。初中时迷上巴金、冰心、老舍，巴金的《家》里好像也有袁氏家族的影子，使他低回沉吟，而老舍《月牙儿》中母女先后沦为妓女的故事，将他的目光引向被欺凌的小人物。1947年，在广州念大学的叔叔袁蕉村回家度暑假，有一天突然对他说：“伟时，兴宁太闭塞，乡下人眼光太窄。看看黄埔江上一艘大轮船载来多少东西，就不会为一点蝇头小利争得不可开交了。留在家乡不会有什么出息，跟我到广州读书去。”于是，袁伟时考入广州南海中学念高一。

在广州，袁伟时常在书店“打书钉”，站着免费读了许多名著。当年各种思想激荡，《观察》提倡自由、民主、法治、和平，《世界知识》支持苏联、反对美国“假自由”、“假民主”，在袁伟时看来毫无矛盾。时风所及，袁伟时闭门读禁书，悄悄地读了大量“左倾”著作，并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1949年10月14日解放军进入广州当晚，袁伟时在好友温沃强家里一起印毛泽东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凌晨时分，他手上的油墨没有洗净，跑到街上一看，马路边的骑楼下已睡满了解放军。

1950年高中毕业，袁伟时满脑子想的是为国家富强出点力，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又考入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1957年，袁伟时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回中山大学任教，不久下放到高明县大沙乡大南合作社劳动。反右与大跃进使袁伟时开始产生怀疑，而接踵而来的荒唐事更让他心潮激荡，有人饥饿、营养不良、肝炎、水肿，饿死人也时有所闻。然而，在课堂讲课时，他只能按统一口径大讲“持续跃进”、“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袁伟时渴望有一个自由的思考空间，于是一步一步走向近代中国研究。

改革开放时代，袁伟时感慨：“整整二十年浪费了，我要将这二十年补回来。”

五十岁以后，他的研究和写作进入成熟期，激扬文字常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册)、《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中国现代思想散论》、《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的增订新版)、《近代中国论衡》、《大国之道》相继出版，一新国人对近代史的认识。袁伟时自认所做的无非是将历史真相告诉读者：“作为有独立人格的学者去研究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是把任何人看成人，我不是他的奴仆，不是他的宣传员，他是我的研究对象，我不会跪在伟人面前唱赞歌。”

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富强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

李怀宇：你小时候在兴宁生活，家庭的环境如何？

袁伟时：我祖父袁述初有很多孩子，光是男孩十四个，他有三个太太。我祖母是第三个姨太太，包括我爸袁俊森，一共生了五个男

孩,五兄弟感情很好。我祖父是地主,又是一个开明的官员吧。清末民初,他做当地的警察分局的局长,当时的警察分局是代替原来清政府的旧式管理,是新政。当地到现在,还有些故事在流传,说他办事很公道,他的两个姨太太,都是因为办事公道得到当地民众的好感,送个姑娘给他做姨太太。我祖母生了五个男孩子,我爸是第三个;还有五个女孩。但是我祖父逝世以后,家道中落,我爸爸出来做生意,供养哥哥和弟弟、妹妹念书,我有个伯父在上海,在全国第二大的橡胶厂——上海正泰橡胶厂做事,是高级管理人员,生产现在很有名的回力鞋,连那个商标都是他设计的。工商业改造以前他是这个公司的襄理。他懂技术,设计胶鞋在行内很有名,1950年代胶鞋的国家标准,是他参与制定的。最小的弟弟在广州念书。

李怀宇:抗战时兴宁有没有沦陷?

袁伟时:没有沦陷,但是县城给炸得一塌糊涂。战争环境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我念小学,战争已经爆发了。六岁刚好入学,念初中的时候一直都是战争环境,我喜欢看报,我们家乡给日本飞机炸,县城好多地方都炸得一塌糊涂。我初中一年级就是在兴宁一中念书,校舍是前清的学宫,三分之一被炸烂了。初中生只能够到城外,将整座客家人的围屋租下来,在那里上课。在那种战争的环境,老是想: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富强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家虽然是地主,土地也不算太多,我们自己衣食无忧,主要是靠工商业的收入。我接触到的是很穷困的农村,我小时候很怕看死尸的,虽然是男孩,但是胆子不大。我上小学的路上,有间不大的

土地庙。我走过就常常看见乞丐躺在那个地方。冬天，没有被子，盖的是干稻草。我走过的时候，往前走，根本不敢看，但是小孩又好奇，走过了，反而回头看，往往看到那个乞丐冻僵了。我印象最深的是1943年广东大旱，饿死很多人，而且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我爸爸念过书，在兴宁县城做生意，对面有一间照相馆叫良友照相馆。那一天，我回到我爸住的地方，照相馆就挂出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潮汕地区的照片，满地是童尸，旁边是一个白木板钉的棺材，佯作手提童尸往里面放，旁边还有两个小孩，正在哭。那时候破获了一起案件，人吃人，把那个吃人的人抓到了，枪毙以前给他拍一张照片，地下还放着他吃剩的一个头颅，还有四肢。看起来很恐怖，这两张照片我终身不忘。

我1947年到广州以后也是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在南海中学读书，旁边是恩宁路，一溜都是棺材铺，旁边是方便医院。方便医院是个慈善医院，附带有一条，就是收敛死尸。天气一变冷，报纸就说：昨夜北风起，收尸多少具，都是冻死、饿死的。我有时走出校门，往观音山（越秀山）散步，就经过医院、棺材铺、收尸的地方，老是想：为什么中国那么穷？那么受人欺负？

李怀宇：1947年来广州读书是人生的重要改变？

袁伟时：1947年，是我的生命的一个转折点。要得益于我的叔父，我的叔父在广州念大学。那年暑假回家，他跟我讲，留在家乡不会有什么出息，要我到广州读书去。我当然高兴。他一句话就行了；我爸没什么意见。

李怀宇：你在广州南海高中念书生活怎么样？

袁伟时：除掉叔父还没毕业的时候，周末到他那里去，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住在学校里面。老家回不去，路上很不安全。我经常去书店看书，所谓“打书钉”，就是站在那里看。学校五点半饭堂就开饭了，十来分钟吃完就出发，走半小时，到现在的北京路，那个时候叫汉民路，是书店集中的地方，看半个多小时书，七点钟左右就往回走。七点半上晚自习，学校管理很严的。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杂志，一份是《观察》，一份是《世界知识》。《观察》大家都知道了。《世界知识》宣扬美国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苏联是和平民主的堡垒。一方面受自由思想影响，一方面受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灌输。

李怀宇：当时对学校外面的广州市井生活有印象吗？

袁伟时：那个时候广州很萧条。到后来基本上用港币，因为国民党的货币靠不住了，家里面给我们钱，也给港币。一般的公务员、教师，领到薪水马上去换港币。那个时候出现“反饥饿”，凡是政府办的学校，吃不好饭，教师的待遇很低，学生很多是所谓领公费的，配给他们的米里面有很多是有石头、沙子。他们“反饥饿”，要求改善生活。1949年，华侨第二师范教师的工资发不出来，学生就举行义卖活动，拿出自己的一些破衣服、书到汉民路摆出来义卖。其实就是揭露国民党腐败，确实是民不聊生。这是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得到很多人呼应。

李怀宇：你当时思想左倾吗？

袁伟时：左倾。1949年我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秘密组织，叫做爱国民主协会，实际上是地下青年团组织。很严格的，参加这个组织要写申请书，要把家庭状况、个人情况全部写出来，要交钱，等于交团费。

很多学术火花都在聊天里爆发出来

李怀宇：1950年读大学时怎么去考经济学专业？

袁伟时：我认为中国独裁的政府垮台了，中国今后走向建设了，顺理成章，中国要解决富强问题，要发展经济，所以就考经济。对我来讲，毕生没有变的东西，就是希望中国富强，希望中国民主。对我来讲，自己的生活没有问题，关心的是整个国家的富强民主问题，以为共产党找到了这条道路，中国走上了富强民主的道路。所以，就毫无保留地要参加共产党，要参加经济建设。

李怀宇：你在中山大学经济系读了什么课程？

袁伟时：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学苏联了。当然高等数学、会计、统计、财政学等等都要学，还要读所谓国民经济计划，但是有些课——如国民经济计划，老师也不懂，看几本书就乱讲。我们的系主任林伦彦，记得是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他很早就读马列主义，读《资本论》，他是很自高自大的，对很多人都看不上眼，说那些领导人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后来不搞政治了,回来教书。他亲自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自己编一套,后来就捞了一顶帽子——右派。我们的统计学教授唐炳亮,有一次给我们讲,现在教师的待遇比前几年好,但是还没有恢复到抗日战争前的水平。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实,后来变成他划右派的一个根据。我们的经济史教师是很有名的梁方仲教授,是重要的明史专家,经济史的权威。

李怀宇:你在学校里活跃吗?

袁伟时:我上学,要做很多学生工作,因为我是党员,高中就入党了。进到大学,党还没有公开,全校就一个党支部,是秘密的。一入学我就是学院的团总支副书记,三年级是学院的团总支书记。一方面,我要完成社会工作,一方面要学习,很用功。但是,我又很喜欢看杂书,看了很多历史书,将太平天国有关的书都看了。

李怀宇:当时对历史系有印象吗?

袁伟时:没有,不同学院。

李怀宇:在中山大学有没有见过陈寅恪?

袁伟时:见过,但是没有听过他的课。

李怀宇:那时候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很有名吗?

袁伟时：有名，而且受到很特殊的照顾。也有传闻说，毛泽东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就问起他。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反正有此一说。我后来想，斯大林文化不高，这个可能性很小。

李怀宇：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中山大学影响大不大？

袁伟时：大。因为学苏联，就把工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医学院都划出去，加上其他大学的同类院系，前面加上华南两个字成为独立的学院。中山大学只剩下文理两个学院的有关系科。当时广州除中山大学外，最有名的是岭南大学，合起来了。岭南大学规模不大，但是教师、学生质量很高，是公认的贵族学校。岭大校长陈序经很会延揽人才。1950年代广东最好的医学教授、医生原来都是岭南大学的。我先在广州石牌读了两年，1952年院系调整就搬到这里了。这里是岭南大学校区，不然没那么漂亮，但是旧中大也不错。

李怀宇：旧中大是现在的什么地方？

袁伟时：现在两个大学的地方：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一万多亩地，全国最大的校园，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哪个大学有那么宽的地方。现在中大扩充了那么大，连珠海、大学城，四个校区，加起来才七千亩地，还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李怀宇：1955年你怎么去考复旦大学经济系？

袁伟时：复旦来招，我就到武汉去考。东南的五个省都集中在武

汉考,在武大。那个时候暑假去考,热得要死,体育馆放上几张床,考生就住在那里;臭虫多得要命,根本睡不着。真是要命,又热又给臭虫咬。

李怀宇:复旦大学两年印象怎么样?

袁伟时:复旦两年读书很多,因为那个时候最安定。早上到了图书馆,还没开门就在门口等。经济系图书管理员有句名言,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那个家伙老迟到,我们说他,他讲了一句话:“迟到十五分钟不算迟到!”笑死我们了。到中午要吃饭了,十二点钟才离开,下午睡完午觉两点半钟又去,晚上也去,都是到关门才离开。到五点半,出来跑步,在复旦体育场里跑十个圈,一个圈四百米,生活非常规律,非常勤奋。

李怀宇: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有一次去伦敦访问?

袁伟时:那是1950年代中国学生外出访问比较早的了。伦敦经济学院是世界上很有名的学校,1955年他们派了两个学生代表访问中国,1956年中国也派两个学生代表回访。人民大学挑选一个,复旦大学挑选一个。复旦大学就选上我。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叫宛樵,他念经济思想史。我们去了三个礼拜,印象很深刻。

我那时满脑子的社会主义好,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经过苏联,短暂停留,当时还不能直飞,还要在旅馆住。第一站在伊尔库茨克,要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才飞,飞到莫斯科又住一个晚上。利用在莫斯科的时间,上街,冬天很冷,街上的人吃冰激凌,令我们大吃

一惊。到达红场，最大的百货公司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排队买东西，排到红场上来了。那时中国还没有这个现象。我们就很好奇：究竟排队买什么？进去看，货架上没有什么东西；沿着队伍上到二楼，原来是买皮鞋。然后飞机从莫斯科飞到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的团中央接待我们。是很优待的了，住在捷克的最古老最大的饭店，但没有什么东西吃。他们团中央派了一个翻译来陪我们。有一天晚餐，问我们想吃什么？我说：鸡肉。一问，这个最好的饭店没有鸡。最后一天，那个翻译主动告诉我，今天晚上请你们吃鸡。结果，鸡上来，硬邦邦的，咬不动。我就开始想：社会主义怎么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到英国，英国那个时候物资供应也不是很充分，但战后的状况相对而言比苏联、捷克要好多了。刚好苏联开二十大，到我们访问的后期，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好像已经有一些消息透露出来，批判个人崇拜。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赶快买一本赫鲁晓夫报告的英文本来看，那不是秘密报告，是正式的报告。走到哪个地方，那些记者都追问这些事，跟那些学生交流，也问这些事。我们就有点像政府发言人一样，受围攻，我们那个时候英语不行，有个翻译——时钟本陪着我们。他的英语很好，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是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的一个翻译。去的第一个晚上，我们住到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宿舍里面。那些学生就说：不要这个翻译，这个翻译是共产党派来控制这些中国学生的。于是，找一个香港学生做翻译。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很尖锐，我们简直等于答记者问。到了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又刚好碰到有美国学生，那些家伙就怂恿中美学生辩论，搞得很热闹。那个时候我们当然都是为中国讲话，讲中国怎么优越。

李怀宇：唐德刚的《五十年代的尘埃》有一篇《俄国的苍蝇和皮

匠》，讲何炳棣去苏联访问的经历，很有意思。何炳棣去了苏联饭馆，服务很差，苍蝇也特别多。

袁伟时：我们住的那个饭馆，苍蝇倒没有。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没有苍蝇。

李怀宇：有一个剑桥大学的教授请你们喝下午茶？

袁伟时：对。我们到剑桥去参观，是满脑子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观念，我们都是带着一种挑剔资本主义缺点的眼光去看他们。看他们图书馆，啊，看起来真漂亮，设备很好，但是人不多。我们就沾沾自喜：我们的图书馆是挤满人的，我们自己都是很努力的，一早上去，很晚关门才出来。你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不努力，没有抓紧时间读书。一天，有个教授请我们喝下午茶，聊天，最初我们感觉到他们不努力，上午十点钟就喝咖啡了，下午四点钟又喝咖啡，吃点小点心，就想：资本主义这些人这么懒，社会主义都很勤奋。当时跟那个教授一聊，他说：学问有一半是在聊天中出来的；很多学术火花，很多学术观念，都在聊天里爆发出来的。聊天中的思想碰撞会产生思想火花，给我的印象很深。

李怀宇：你们访问回来要干什么？

袁伟时：回来给全校做了一次报告，那个时候很热情。复旦的领导先听我们汇报，各个方面看到什么，他们都很感兴趣，他们也没有到过那些地方。然后，组织一次全校的报告会，就在复旦的大礼堂，

叫做“登辉堂”，因为复旦的一个校长叫李登辉。坐满人了，讲那些见闻。

李怀宇：1957年在复旦大学毕业，那年正好反右。

袁伟时：反右时我就是研究生班的党支部书记，结果不但自己没有当右派，全班同学也没有一个人划右派。党总支书记找我汇报；我说同学中没有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右还没完全结束就毕业了。

李怀宇：毕业是分配到中山大学？

袁伟时：回到中山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因为经济系早就没有了，合并到武汉去了。

李怀宇：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做什么？

袁伟时：中间都是不断搞运动了，根本就没办法，都浪费掉了。经常下乡，下放劳动，或者是工作队，反正就是很动荡。

李怀宇：后来怎么到哲学系？

袁伟时：我的性格太独立了，因为经济是不能随便讲的，要按照《红旗》、《人民日报》的口径来讲，我不愿意，感到很不舒服，就转到历史，特别是转到思想史。在哲学系就教中国哲学史，我研究的是中国近现代的哲学史。

李怀宇：中山大学在“文革”中算不算重灾区？

袁伟时：当然破坏很大。但是相对来讲，整个广东稳定得比较早，虽然也破坏得很多，但是相对其他地方，比起武汉、四川那些地方都好得多。这跟广州军区有很大关系，他们制止武斗比较有力。同时，广州的造反派组织，保守派占优势，所谓的保守派已经是够左的了，但是，不会那么离谱，以产业工人为主，打砸抢的东西少一点。

李怀宇：在“文革”期间看书受到限制大吗？

袁伟时：乱套了。“文革”期间造反派将图书馆占据了，武斗。那个时候，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后来有段时间干脆就封掉，不借了。到“文革”后，大家重新要教学了，要研究了，中山大学图书馆目录都没有完整的一套。中山大学是原来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合起来的，而做历史研究最有用的是岭南大学的藏书，因为岭南大学抗战时把图书搬到香港、澳门去，保护起来，损失很小。中山大学的图书从广州撤退到云南，再从云南搬回粤北，这个过程很长，辗转好多地方，损失很大。“文革”时，图书馆的最好的书目卡片是岭南大学编制的，一般不给学生或者教工用，只给图书馆工作人员用。好在他们让我随便翻，找到好多资料。中山大学图书馆有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但是，根本就不放在一起，要研究梁启超，必须读这套资料。好在有一个图书管理员——何永钟，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原是大附小的教师，被划为右派，不能教书了，调到图书馆。他很热情，费了多少劲才帮我找齐那一套书。因为我跟那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熟，所以就破例让

我使用他们的目录卡片，把规定不外借的书偷偷地借给我，我读了好多这样的书。我是利用了熟人关系，才有这样的优惠。在国外，这种情况根本是不可能的，那里随便一本书都可以借。

大学首先应该培养现代公民

李怀宇：改革开放之后到美国去访学，对学术研究有没有一些触动？

袁伟时：没有大的触动。因为大的触动，是要自己坐下来，一个人去钻研去解决问题。我儿子先是在美国念博士，后来他在大学做教授，他的岳父是加州大学的教授。我就向他们请教美国学校究竟是怎么运作的。我感觉到，两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差距很大，从内容开始，我们的那一套就比人家落后。内容上我们是规规矩矩，着意培养好孩子；他们不是，他们要张扬个性，培养孩子们要自信，从大学到研究生都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的研究能力。过去中国人盲目地吹：人家的研究生比我们好，但是中小学的教育我们严格，我们的比美国好。

李怀宇：杨振宁好像就公开发表过这样的观点。

袁伟时：杨振宁甚至说我们的大学比他们好。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美国整个教育制度是培养自由的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没有这种人格的培养，学术的推进，是很困难的。特别是要有创新，非有独立自由的思想不可。从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到后来西南联大，都守

护学术自由,这是现代大学灵魂。他们紧紧守护,虽然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要干预,但是他们拼命抵抗。一部分大学还是将这个灵魂保留下来了,这样就出了很多人才。今天,我们恰恰就没有认识到这个根本。钱学森的谈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五六十年来培养不出大师?关键是不懂教学的人瞎指挥,又学了苏联那一套落后的东西,那就糟糕了。苏联那一套是斯大林的东西,取消学术自由,结果受到意识形态干扰,出不了敢想敢说敢干的拔尖人才。没有好的学术环境,人人都谨小慎微,那是出不了大师的。另外,不能把原因完全推在苏联身上,我们在某一些方面比苏联更糟糕。苏联没有在大学里实行党委领导制度,是大学校长负责制,大学里的党组织只是管党员自己,不管整个学校的事,因为苏联的大学校长里有一些是真正有学问的人,他们的大学的建设就比我们强,也没有像我们那样的思想改造制度,没有摧毁知识分子的自尊、自信。在中国,思想改造运动把人彻底摧毁,在人格上摧毁人,侮辱人,使得学者根本就不敢发挥自己的天赋。而且运动没有完结的时候,随时有人监督和批评你的思想。苏联保证了知识分子的待遇,没有后顾之忧。我们的知识分子就变得很卑微,老是想怎么解决温饱问题。一直到“文革”结束,我都要花好多时间想办法买菜,特别是买肉,保证自己家庭能够吃饱,保证孩子足够的营养,费了不少心。“文革”期间,我几乎跑遍了广州的菜市场,骑个自行车到处看哪里有肉。我六点钟左右骑车出去,到八点钟就回到家里开始工作。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车,所以可以骑个自行车到处去闯,也很快,过海珠桥也不下车,年轻有力气就冲过去。这样,怎么能够好好做学问?好好去发挥自己的才智?

现在大学在教学制度、教学方法上,每况愈下。我们念大学的时候,学苏联,课堂讨论是课程的一个基本教学环节,要很认真准备,在

课堂上争论很热烈。另外，主要课程期末的考试是口试的。口试想作弊是不可能的，几个教师坐在一起，学生抓阄，抓到那个题目，就出去准备半个小时，然后轮流进去，在老师面前讲。讲完以后，老师还提问。这样，想偷懒是不可能的。连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考试都是口试。所以，1950年代那样的学习质量还是较好的，主要课程学得比较好。现在根本不是这样了。

李怀宇：我去香港发现，各所大学的图书馆条件优越，很让人羡慕。

袁伟时：我去香港主要就是找资料。那里图书馆的面积宽，而且是学西方的制度，那些学生跟国外的交流比较多，往往在大学念几年，有半年到一年是到其他国家去交流，当交换学生机会很多。另外，研究生要作论文的话，有很多经费到其他地区去搜集资料。我们内地现在的教育和香港比起来差距很大。

李怀宇：我觉得香港有一些好处，报纸杂志那么多，买书很方便，我每次去香港中央图书馆，看书方便得不得了。

袁伟时：对。香港有好多旧书店，我到香港、台湾就跑旧书店，买大批的书。那里采用廉价经营的方式，包括内地的旧书，都是楼上，有些五六楼，到上面去找，很多旧书在那边找。找到以后，买下来，他们还负责给你带到深圳去，从深圳寄出来。我都买了好多包书。

李怀宇：到台北“中央研究院”访问，给你的印象如何？

袁伟时:那是做学问的地方,完全是按照西方的办法做。好像我到近代史研究所,电脑室是二十四小时开放的,随时都可以在那里工作,你没有带电脑都问题不大,电脑室几十部电脑可以随时用。图书馆开放随使用,到那边找资料,够了。

李怀宇:据说现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搞生命科技的学者比搞人文的学者多得多。

袁伟时:1990年代,台湾有钱,从华人学者里面挑一些顶尖的科学家,要求在台湾克隆同样的研究所,就是买美国一流的设备,邀请留学生回来,从美国邀请华人科学家回来做研究。我认识一些人,其中王正中教授是研究生物科学的,他跟我的亲家是同学,大家是很好的朋友,聊起来,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他讲:我在“中研院”建了一个所,而且兼所长,完全是按照美国办法管理,研究人员和所长各方面都是很自由很平等的。但是,一出了所,就碰到问题,官僚的习气很重,要耽误不少时间。他认为科学在美国发展得很好,其他地方很难跟上,与文化传统确实有很大的关系。美国的一个所里面,从研究助理到教授,互相都以名字称呼,年轻的学者很容易冒尖,其他地方很难做到这一条。他说:这就是文化传统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彻底的自由平等,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李怀宇:何兆武先生讲,有一个美国人从台湾到北京,何先生问她:台湾跟大陆到底有多大的不同?那个美国人说:两边简直太一样了。

袁伟时：对。东方文化的等级制。我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有些朋友聊天时发牢骚，也说：官大学问大。领导的权威，很厉害。所以，有些新左派的可恶就在于他们老是讲：我们要回到中华文化本位！而且讲：民主、法治这些都是方法，没有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西方文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中华文化，解决什么是人，什么是根本的问题。我说，他们闭着眼睛说瞎话，真是太糟糕了。

李怀宇：当今中国的教育有没有要向国际上学习的东西？

袁伟时：当然要吸取英美的大学精神，真正保证学术和思想自由。大学首先应该培养现代公民。通识教育的核心，就是启迪学生一个现代公民的人格、权利是不容侵犯的，现代公民是一个自由的平等的公民。陈寅恪很明确讲，三纲六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从政权机关到一个家族内部，都是按照三纲六纪运作，这已经成为一个风俗习惯，不打破这一条，中国是不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左派说要回到中华文化本位，回到儒家。真正的孔子，《论语》是他的代表作，跟同时代的古希腊的哲学家、思想家来比，孔子有他的特点，但是整个理论水平、学术水平是不是差一大截呀？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的政治学、逻辑学怎么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真正有前途的民族，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现在我们成了一种风气，敢讲中国的弱点的，敢讲汉民族的弱点的人就是卖国贼，就是汉奸，这太可怕了。不承认自己的弱点，怎么追上去？现在，新左派跟所谓国学派结合起来，误国殃民。

李怀宇:在 1980 年代初的风气,大家对西方思想的了解是不是如饥似渴?

袁伟时:是,那个时候整个知识界的倾向,向西方学习,是比较明显的。现在是刚刚吃饱饭,还有几千万人还没吃饱,多数人吃饱饭了,兜里也有几块钱了,就很浅薄地翘起尾巴来了:中国怎么了不起。国民人均的 GDP 才两千来块美元,就翘尾巴了,太浅薄了,无知加浅薄。

李怀宇:在晚清民初,广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镇,为什么这三十年来广东好像没有这种能力了?

袁伟时:晚清的时候,思想家出在广东,但是这些思想家施展才华,都不是在广东。广东是维新运动的落后地区,广东会出思想家,得风气之先,交流方便,很接近香港,有很多华侨,要接触外面方便,这样就会出思想家。但是,在广东的官僚不支持他们,很多都没有作为,广东就落后了,没有有为的政治家,办学也落后了。要出思想家,学术氛围要比较好,而且基础要比较好,1949 年以后,人民共和国时期,北京、上海是全国的重点,什么都倾斜到那里去。全国最好的学术人才都吸收到清华、北大去了,那边资金、设备、图书都比广东好。光是图书资料就比广东好得多,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资料全着呢,北京大学图书馆资料都很全。1980 年改革开放以后,有几个有为的政治家在广东搞改革。原来广东是不受重视的地方,没有投资,没有建设,说这里是国防前线,不能搞建设,原来的工业基础差,科技基础差,所以出不了人才。后来,打开国门,改革开

放，借助香港的资金人才，经济一下子发展起来了，经济总量从全国第二十一位上升到第一位；科技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广东完全靠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

做学术研究，学者的人格、学术良知很重要

李怀宇：以 1930 年前后出生为界，差不多年龄的李泽厚、汤一介、庞朴、陈乐民、资中筠，这些人你都认识吗？

袁伟时：都认识，都是很好的朋友。

李怀宇：李泽厚在 1980 年代影响有多大？

袁伟时：当然很大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看他的东西，特别是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我特别欣赏近代那本。1990 年代，我还请李泽厚到中山大学讲学，讲了一个礼拜，李泽厚说要告别革命，要坚持不懈搞改革。有人打小报告，告袁伟时请李泽厚来讲学，告到教育部。他们派人来调查。我说所有报告都有录音，我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后来不了了之。

李怀宇：听说，庞朴说过一句话很妙：去了海外，觉着自己在学术上浪费了二十年。

袁伟时：庞朴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其实余英时他们做的工作，应

该是我们做的，结果我们的时间都浪费了，没有做成。庞朴是有可能做这个工作的，他的学术基础扎实，人也聪明，做学问舍得下功夫，不是很浮躁的人。

李怀宇：汤一介呢？

袁伟时：汤一介因为在北大这个位置，当然有优势，似乎组织能力比庞朴高，有大批年轻人在他周围。汤一介后面有一个军师，叫孙长江。孙长江这个人为人很好，点子多，热心肠。汤一介要是没有他，就麻烦了。“文革”时要汤一介去“梁效”，那是不去都不行的，上面点名让你去，你敢不去啊？孙长江就给他出点子：你在那里做什么，悄悄地记录下来，而且最好争取管那些杂务。“文革”结束后，汤一介如实地讲自己做了什么，很快解决问题了。听到“四人帮”抓起来了，孙长江连夜蹬自行车到北大告诉汤一介。很难得的热心人。

李怀宇：对孙中山的研究，为什么你的观点跟所谓的主流观点不太一样？

袁伟时：大家看资料都差不多，没有特殊的资料。这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我研究的出发点是，中国的现代化自由民主的社会，为什么迟迟不能实现？中国社会转型为什么那么困难，那么慢？我在这个大的坐标下，大的视角下来研究所有人物。孙中山放在这个坐标下，我去解剖他，审视他的一生，我认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有很多重大的失误。所以，我要如实地说出来，就是那么回事，这是做学问的立足点。做学术研究，学者的人格、学术良知很重要。没有一个

自由的、独立的人格，是做不好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有人可以做宣传委员，可以做吹鼓手，但是拿不出真正有见解、靠得住的学术结论来，或许可以做一些枝枝节节的研究，把事件搞清楚，但对整个大局说不清。一切历史人物，我都按照这个标准一视同仁加以审查。

李怀宇：你的《蒋介石日记》研究进行得怎么样？

袁伟时：还差很远，写了一部分。

李怀宇：你看了杨天石的《蒋介石日记》研究文章？

袁伟时：看了。写得不错。

李怀宇：南通的辛丰年先生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对蒋介石简直是深恶痛绝。

袁伟时：我们年轻时候也是这样看蒋介石，把他作为一个专制独裁的体现者。

李怀宇：看完《蒋介石日记》后，对他的观感有没有改变？

袁伟时：没有大的变化，蒋介石做了好些工作，但是我评价不高。

李怀宇：你的著作里面，《晚清大变局》是最重要的一部吗？

袁伟时：应该讲，目前影响最大的，也最重要的。

李怀宇：你跟李慎之先生也很熟？

袁伟时：是非常熟的人，他年纪比我大，是前辈。1949 年以前我还是中学生，他已经是老革命了。他后来跟我关系很好。准确说，对我说来，他是亦师亦友。

李怀宇：后来“北李”和“南王”怎么回事？

袁伟时：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尽管后面不完全是各走各的，但双方有误解，有点分道扬镳的样子。

李怀宇：“南王”的门生弟子很多。

袁伟时：门生弟子很多，经历也是很坎坷的；学术成就怎样，我不是那一行，不敢评价。

李怀宇：在上海，贾植芳先生给我印象很深。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袁伟时：那是受苦受难的，我们这些小萝卜头根本不算什么受难。人家打小报告有点压力，算个啥？没有坐过牢，也没有当过右派，比他们来讲，顺利得多了。

李怀宇：汪曾祺就讲：我如果没有当右派，我这一生会更加平淡。

袁伟时：汪曾祺的小说是写得好，写得很简洁，文字好，很深刻。我喜欢看。

李怀宇：不过汪曾祺后来身体非常差，酒喝太多。其实他跟黄永玉、黄裳差不多年纪，是年轻时最好的朋友。黄永玉、黄裳现在精力充沛，只有汪曾祺1997年就过去了。

袁伟时：那就是跟喝酒有关系。

李怀宇：可能汪曾祺心情也不太好。他写那个样板戏，后来审查了几年，真可怜。

袁伟时：人生最好的时光，唉，也是没办法。所以，我说一代学人整整二十年被糟蹋了，补不回来。我自己退休后就暗下决心再干二十年。

李怀宇：沈昌文是跟你同年？他也是很有意思的。

袁伟时：他大我几个月。沈昌文灵活，好玩。我跟他交往很开心。我很谨慎，不敢乱吃东西；他是什么都乱吃，他老婆是医生，也管不住他。到北京，我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他：“沈公，我来了。”他马上回应：“什么时候有空？想见谁？”我告诉他想见谁，他很快安排在哪里请吃饭，将我想见的这些人请来。

李怀宇:你们这代人已经挺难得了,年轻时正好见到那个时代的尾巴,中间有一段历史空白,这三十年又重新做研究。

袁伟时:其实我们这代人是最惨的。一到要真正学点东西了,就斩断了跟世界学术主流的联系,在很封闭的环境下学苏联那一套,就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人来说,白白浪费时光。外语也差,花很多时间学俄语,用处不大,很惨的。我们这一代到现在真正还在做工作的,百分之五都不知道有没有。大部分人无声无息过了一生,真真正正学术上做出一点成绩的,我估计不到百分之十。所以,我是学术成就不高的了,但在这代人里面,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后来的改革开放,不过是冲破缺口,学到西方一些好的东西,才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不容剥夺

李怀宇:你为什么特别关注启蒙的问题?

袁伟时:没有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不了解人类文明的进程,不可能建设现代社会。直到现代社会制度、现代国家建成为止,启蒙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在进行。最近攻击启蒙的很多,攻击新文化运动的也不少。比如有学者说胡适新文化运动讲科学是科学主义。胡适他们对西方的了解不够深入,不够全面,不够准确,都有可能。但是说,新文化运动讲科学就是科学主义,对西方文化的一个歪曲,这个判断不准确。最初提出这个论断的是夏威夷大学的郭颖颐教授,他的博士

论文就叫做《论科学主义》。

可是，第一，从新文化运动来看，它一开始就不是孤立地讲科学，是跟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张，叫做人权与科学，民主与科学是后来提的。1912年，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二十六位知识分子发现，中国的国民素质，与共和国公民的要求不适应，便发表宣言提倡人道主义与科学，比《新青年》提出人权与科学早将近四年。那一年，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下令废除了读经。他们很有远见啊。

胡适讲科学，没有把科学片面化，同时讲个人主义，讲易卜生主义，提倡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权利。

第二，“五四”提倡的科学是指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也就是理性，与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文化一脉相承，要摆脱圣人、古人、神权迷信的束缚和民族局限。陈独秀是这样，胡适也是这样。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勿尊圣，勿尊古，勿尊国。这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至理名言，至今仍闪闪发光。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后很多人怀疑，后来出现很多问题？这就要分清楚界线，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什么？第二个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他个人的素养不足或失误，跟整个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关系？

新文化运动主要领袖是陈独秀和胡适。十年前我说过，陈独秀对启蒙有很大的贡献，但也是一个很极端的人物，政治上更是很幼稚。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不在现场。6月，他头脑发热，草拟一个《北京市民宣言》，说市民应该“直接行动”，北京市的权力，应该交给市民。他自己写好宣言，印好传单，拿到戏院里去发，给人抓去坐牢了。他一贯都是这样的，辛亥革命前在日本留学，不满意清政府的留学生

监督,几个人就将那个官员抓起来,陈独秀抱腰,其他人将他的辫子剪掉。当时将辫子剪掉可是大事。他就是这样很极端的人。

李怀宇:你现在讲启蒙,跟近来文化思想的一些观点有什么样的关系?

袁伟时:现在强调启蒙,是因为好些人认为现在中国抖起来了,发达起来了,西方那些观念,应该由我们加以修正了。

对普世价值怎么看呢?很多人提出来要修改,要补充,要以中国的核心价值去补充修正,要抵制西方那一套。说得冠冕堂皇,但是蕴含着一个危险:妨碍中国学习现代文明的精华。这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很不利。中国要深化改革,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经济制度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了,还不健全,还有很多地方受到权力的侵蚀。市场经济跟法治密不可分,中国的法治却不健全,腐败严重。为此还得学习人家好的东西。有些人却不这样看。

有人说前三十年的思想解放是学西方,建立市场经济,现在的思想解放要从西方解放出来。这里他回避了一个问题,当前中国继续改革开放主要障碍在哪里?中国当前的改革,仍然面临一个文明的落差。为什么要启蒙?说到底,中国现有的文明跟世界现代文明的成就有很大的落差,我们必须继续向他们学习。承认这个基本状态,才会努力介绍有关的思想,有关的制度,有关科学技术的成就,让它融化到中国。

核心价值当然会发展补充,但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府说了算的。它取决于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

什么？陈寅恪先生认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三纲六纪（六亲），国学派的先生们否定得了吗？

李怀宇：有些学者认为“五四”以后启蒙和救亡是两大主题，救亡压倒启蒙，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启蒙被人家遗忘掉。

袁伟时：这个我也不同意。其实是救亡呼唤启蒙。恰恰是中国面临危难之际，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根本问题是中国落后了，是思想文化落后，是制度落后。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将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思想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在中国传播，在中国生根，启蒙运动就起来了。说救亡压倒启蒙，与历史事实不符。

压倒启蒙的不是救亡，而是没有深刻理解现代文化，民粹主义的平等观念压倒了自由观念，选择了错误的救亡道路。比如十九、二十世纪，中国主权受到侵犯，怎样救国呢？

一派主张在现有体制内部不断改良、改革。另一派要推倒重来，革命。这两种主张辛亥革命前存在，辛亥革命后同样存在。

辛亥革命特别是1920年代后，国民党左派和那些年轻的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联手提倡很极端的斗争哲学，一切打倒，却忘记了自由、民主、法治这些根本，提倡民粹主义的平等，散布取消个人自由的歪理，就将启蒙思想压下去了。

又如那个时候反对帝国主义，有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是改革内部，将腐败的东西去掉，发展经济，壮大力量，通过谈判收回主权。

这是日本的道路。日本原来和中国一样，有不平等条约、租界、治外法权。司法不独立，外国人犯法，由外国领事来审判；关税也不

自主,协定关税,跟中国完全一样。通过学习西方,建立新的制度,通过谈判,至二十世纪初,一一收回。

中国怎么办?列强说,治外法权可以取消,条件是你的司法体系、司法制度必须改革。中国原来的司法体系是很落后和黑暗的。行政跟司法合二为一,要是犯法的话,打屁股,用肉刑,还有其他很不人道的东西,监狱也很不人道。列强提出:这些残忍黑暗的制度消除了,我就同意取消领事裁判权。晚清新政和北洋政府努力向这方面前进,1920年代经过谈判,局部地收回了治外法权。上海是个成功的例子。孙传芳做五省联军总司令,委任中国地质学的开创者丁文江做上海商埠总办,让他建设大上海。丁文江在很短的时间内,跟租界当局交涉,收回会审公廨的审判权。上海的治理水平比较高,经过交涉就收回来了。

五四爱国运动提出山东问题。山东丧失的利权也是在1921年末至1922年初的华盛顿会议上经过谈判基本上收回来的。人类确实在进步,侵犯别国的主权,违反正义原则,是要受到谴责的,加上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交涉不是没用的。当然要改革和发展自己,有实力,再通过外交,维护主权是有希望的。收回关税自主权,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了,商定1929年收回关税自主权,但随即北京又政变,只好等到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后才实现。

另外一条道路,是夺权、革命。

当时孙中山在南方另立政府。他逝世后,蒋介石率师北伐,扫平其他割据一方的势力,摧垮北京政府,基本统一全国。孙中山几次军事行动都有外国背景,或者说国际援助。

1917年开始的护法斗争,德国人给了钱。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政府怕中国政府与英美联合起来参战。中国从国家利益出发,应该

参战，应该和英美结成同盟。好了，孙中山就叫朱执信写文章，用他的名义发表，提出交战双方都是非正义的，中国不应该参战。这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观点。背后是什么呢？德国政府给了一大笔钱，直接交到蒋介石手上转给孙中山，蒋介石日记有记载。

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则是苏联给钱，给枪，给人，给顾问。派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到广州来，培训新的军事干部，办黄埔军校，并且把军事顾问派到党军里，很多战争都是他们参与指挥的。与此同时，学苏联的“以党治国”，“党化教育”，“党化司法”，取消新闻和言论自由，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国民党实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法西斯专政”。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把启蒙压下去了。所以根本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救亡一直呼唤启蒙，要求更好地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推动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只有自由民主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离开自由，经济无法发展，人的创造性无法发挥，人的地位无从提高。民主、宪政则是保证自由不受侵犯的手段。“九一八事变”后，也是到处呼唤要自由，要民主，同样被国民党当局压下去了。

李怀宇：启蒙最根本的精神是什么？

袁伟时：最根本的精神是启发公民认识个人的自由权利不容剥夺，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民主、宪政、法治）予以保障。有几个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文献，一个是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文献《权利宣言》，集中了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成果。继承英国革命的成果，1776年产生了美国的《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三大革命的文献，核心思想是什么？《独立宣言》讲人生来就有生命权、自由

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启蒙的真谛就在这里。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继承英国和法国启蒙运动的成果,提出“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等十七条原则。有人说不要普世价值,我们就要问:你接受不接受现代文明?不要的话,那个国家的国民是臣民,不是现代公民。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实现全面的现代化。

很多人问:中国现在民主宪政还有欠缺,为什么经济能发展那么快?秘密在哪里呢?中国公民的自由,特别是经济自由得到颇大恢复,并且毅然参加 WTO,主动融入世界一体化的洪流,奥秘就在这个地方。这跟普世价值是一致的。

李怀宇:现在重新提倡启蒙,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袁伟时:阻力在敢不敢承认我们仍然落后,必须继续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上有一句话:“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这是各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不可等闲视之。

1966 年我们开始搞“文化大革命”,联合国又制定了两个人权公约。从 1948 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到 1966 年的两个《人权公约》,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力图在思想文化上、制度建设上总结文明的进展,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灾难。要遵循另外一条道路,不要再陷入暴政和战争的漩涡。为什么有些人老是不理解和不接受这些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警惕。

新文化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承认世界一体化的进程是不可抗拒的。《新青年》的创刊宣言里面就谈到要开放,不是闭关锁国

的。有些人简直连《共产党宣言》都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讲全球化的进程是不可抗拒的，尽管是野蛮的进程，也没有办法抗拒。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没有看清楚这个趋势，老想抗拒世界一体化的进程，结果国家吃了大亏。现在不应再做这样的蠢事了。

李怀宇：从1919年“五四”到现在，为什么不停地有人提倡启蒙，提倡新的思想解放？

袁伟时：思想文化有一个特点，没有国界。它的优劣只能在自由交流、自由讨论中，自然变化，自然更新。当思想文化被加上桎梏，就有思想解放问题。

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各样的思想可以自由流通，一大批杰出人物的才华就展现出来了。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奠基发展起来的。那是中国学术文化罕见的黄金时代。

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权扼杀思想言论的自由，神化领袖人物，将一个党的教义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实行党化教育，建立新闻和出版检查制度。尽管有一批知识分子抵抗国民党的干涉，北大、清华还有后来的西南联大保持了现代大学的基本制度、基本精神，其他学校和社会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当时没有领导现代国家的经验，全盘学习苏联，学了很多错误的东西。

邓小平的改革是冲破思想枷锁的勇猛举措。他指出不要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纠缠，非常英明。有些人至今沉迷斗争哲学。不同阶级当然有矛盾。但是我们过去讲阶级矛盾，光讲利益的冲突，没有讲利益的调和和双赢。现在如果将资本家都关起来，都打倒，那怎么办？

民工到哪里去找工作？不要简单化地理解私有制，要尊重现代经济学、市场经济学的基本东西。所有权的保障，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公民自由权利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冲破思想枷锁。其实邓小平已经解决了，有些人还要纠缠。民国元年，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他说新道德就是自由、平等、博爱。陈寅恪 1920 年代提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永世不灭的。这些对不对呀？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称得上是现代公民吗？

李怀宇：1929 年的经济大萧条产生了罗斯福四大自由的概念，八十年后的金融海啸，有没有可能促进新的思想？

袁伟时：有这个可能。就中国来说，要看有没有足以让出类拔萃的学者发挥聪明才智的自由天地。

很明显，要度过金融危机，政府要采取有力措施。中国现在外汇多，资金充足，有人就说中国拯救世界，中国这条道路最好。其实，中国之所以发展较快，是吸收了人家的东西。现代国家的政府都要推动经济发展，这不是中国特点。

纳税人拿 GDP 的 20% 至 30% 去组建、供养一个政府，养那么多公务员，是吃白饭的？光叫他们去抓小偷？整个社会他们得管理得井井有条，包括保障市场经济的秩序，保障公民的权益。政府要不要管理经济？这是个不值得讨论的问题。假如不要的话，纳税人为什么要拿那么多的钱给政府？问题是怎样管理。这次金融海啸，关键是经验不足，管理不到位；是美国管理不善，连累全世界。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了，各国密不可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世界银行、国际法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实是世界政府的雏形，是地球管理

委员会的分支机关,但这些机构,还不健全。

能不能成为推动中国改革的一个契机呢?

第一条要看在经济领域有没有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按照健全市场经济的方向去做,不要缩到计划经济的轨道上去。这里面的标志是对民营经济的态度。是不是着重去扶植民营经济?全世界90%以上的国企都是亏本的,办不好的。国企办得比较好的是新加坡。它就三百万人口,管理容易一点。好了,最近,新加坡最大的一个国有公司,淡马锡,巨亏三百九十亿美元。切记一定要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像发展汽车,最有活力的是民营的吉利、比亚迪等企业。光是支持合营企业还不够,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不然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第二条就是公民的福利制度,民生的大问题,是不是下决心解决了。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所谓三座大山要解决,老百姓后顾之忧减少了,才敢大胆消费,内需才会真正拉动。这是经济转型的关键。与此同时,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要建立现代教育体制,关键是学术和思想要自由。不要让中国人老是担惊受怕,谨小慎微。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变成乖孩子,要变成很有创造性的、很有活力的现代公民,是敢想、敢说、敢干的孙悟空,那样才能够把中国的事业持续不断往前推进。

第三条,这次危机的处理,让舆论监督得到尊重。现在已经出现这个情况,凡是有改革思想的官员,都支持舆论监督。网络这么发展,博客这么发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现在是全民办报阶段,人人都可以办报——写让人自由浏览的博客。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把别人的嘴巴封住。所以凡是有改革思想的都支持舆论监督。

这个舆论监督也是体现了两条,第一条体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

人。另外一条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性质。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从十九世纪开始,有一些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就看到了这一步。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就提到:什么人怕报纸?贪官污吏!现在的贪官污吏、专制主义者就怕报纸,怕新闻舆论监督。所以,尊重舆论监督应该成为危机处理过程的特征。所谓“躲猫猫”事件,云南的有关领导在舆论监督下,纠正错误,将事情真相公布了。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让信息公开,就让一般的民众感觉到你的行为是可靠的。这是让政府的公信力重新建立的一个重要措施。政府官员慢慢变了,跟着时代步伐前进,希望通过危机处理,真正将政府变成一个公开的、透明的、服务型的政府。

江平：我的中国梦就是法治天下



(摄影：郭延冰)

江平:1930年12月生于大连。先后就读燕京大学新闻系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参与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立法的历程。江平八十自述《沉浮与枯荣》,由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

2010年，江平先生八十岁。法律出版社出版了江平八十自述《沉浮与枯荣》。事缘江平的弟子们总劝他写一本回忆录，江平犹豫再三后自己动笔写了近十万字便停笔了，后以口述历史的形式，由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成为这本四十多万字的自传。

江平历尽世间的变幻起伏，在最失意之际，寄情于诗词，抒发胸中块垒，曾集成诗词选《信是明年春自来》。《沉浮与枯荣》的书名，便取自江平自己诗词中最喜爱的一首：“千言万语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无穷。谁主沉浮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

江平从小在富有书香气的家庭中成长，受过良好的教育。1948年，江平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既沐浴了燕京独特的学风，也亲历中国天翻地覆的巨变。1951年，江平由组织选派到苏联学习法律，此时他对法律一窍不通，而且没有兴趣，但服从安排。江平赴苏后，先被分配到喀山大学法律系，1953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接受了正规的法律教育。

1956年底，江平学成回国，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他自以为步入了“天堂之门”，没想到1957年给他开启的是“地狱之门”。在反右运动中，江平成了“右派”，结婚不满一个月的妻子立即提出离婚，家庭破裂。不久，江平在西山劳动时被火车轧断了一条腿，他给自己写的座右铭

是：“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

在“文革”期间，江平有一段时间几乎一天到晚都得写大字报，而且还得写工整，因而练就了一手风格独特的书法。后来他常常开玩笑说：“我这个毛笔字，就是‘文革’期间天天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江平回到学校教书，1983年1月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后不久，江平担任副校长。1984年起，江平主要分管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和图书馆。1988年至1990年，江平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退任时，他正好六十岁，曾有七律抒怀：“残肢逆境未曾摧，乌纱抛却田园归。宠辱应似花开落，忧国何分位尊卑。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峰壑梦中飞。长夜寒冬无声处，信有大地响惊雷。”

此后，江平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普通教授。“我开始从学者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公众知识分子。”有一次，一位美国学者问他：“从校长岗位退下来有什么感受？”他说：“可以不说那些违心的话了，可以不去干那些不得不做的没有用的事了！”

江平参与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立法的历程，这在《沉浮与枯荣》中有相当详尽的回顾。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江平是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李慎之是法律委员会委员，两人言语投机。有一次，李慎之对江平说：“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此话让江平至今记忆犹新，也促使他更关心宪政，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江平说：“我的中国梦，就是法治天下。”

法律比较保守，新闻更开放一些

李怀宇：你在燕京大学读的是新闻专业，那时候根本没有想过去读法律吧？

江 平：那时候对法律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新闻是很热情奔放的，更自由一些，法律有点按法律条文来办事，比较保守一些，所以这两个职业是不太一样的。总的来说，法律是比较保守，新闻是更开放一些。所以我自己的第一志向就是学新闻。

李怀宇：在民国时期，你对法治有没有概念？

江 平：没有，因为学法律已经是在新中国之后，那时候《六法全书》已经全部都被废除了。包括我到苏联学习的时候，是不允许带任何旧法的东西，所以新中国的法律跟旧法是一刀两断的，不承认有任何继承的关系，这个现在看起来是很“左”的表现。法律在相当程度上是有继受性的，除了有一些法律，比如说国民党时期的戡乱、镇压共产党的法律，那些当然必须要废除，但是社会规则方面，应该有继受性。如果没有继受性的话，那民国时期的婚姻到底承不承认啊？如果废除了民国时期的法律，连带婚姻的法律都废除了，那很不现实。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提出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这个举动有点太仓促，缺乏慎重的考虑。

李怀宇：在苏联留学对你后来从事法律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江 平：应该说，在苏联学法律的这五年，打下了我的法律的基本功底，或者说对法律的基本认识，在我一生当中当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可是回过头来看，我回国以后就被划为“右派”，所学的苏联的法律知识基本上没有派上用场。等到派上用场的时候，苏联法律的

这些理念和体系,已经在中国不起什么作用了。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我学习的时候正好是中苏的蜜月期。但是等我用上这一段的时候,中苏的关系发生变化,后来变成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在中国的地位也已经不是原来的老大哥的地位了。

李怀宇:新中国的立法是否受到苏联的影响?

江 平:我觉得中国的法律受苏联的影响很小。建国初期,中国有一段在外交方面上是有些一边倒,跟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背景的情况,可以看出来,建国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但是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并不是这样。中国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受到苏联的牵制,也就是说第三国际对中国的影响就没有多大,毛泽东也有抵制第三国际的做法。建国初期的立法也不多,除了《宪法》、《婚姻法》,其他也没有多少法律。因为《宪法》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的,婚姻制度更是很难学习外国的,那是完全根据中国社会的情况。中国和苏联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以公有制为基础,但是土地的问题就不太一样,苏联的土地全部是国有的,中国的土地还分成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应该说,苏联在立法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小的。

李怀宇:你亲历了反右和“文革”,这两次运动对你后来大声呼吁中国健全法治有很大的触动?

江 平:反右的背景很复杂。我看,一个主要的背景是国际上“波匈事件”后,为了防止“波匈事件”的重演,把中国社会中知识分

子的作用限制到最小程度，这能够确定共产党的主导思想在社会中不发生任何动摇和变动。反右运动时，中苏关系还不错，但是实际上，反右运动里有些东西批判的不仅是西方国家的，也包括当时的苏联的。比如说，法院提出来司法独立，在苏联也提司法独立，但是我们在反右运动中因提出司法独立被打成“右派”的人也有。再比如说，学校提出来的是无罪推定的原理，我们学校讲刑法的老师有人就讲无罪推定，这是苏联的一套，但是当时也被批判为“右派”言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反右的背景很复杂，包括西方的乃至苏联的有些法制观点，同样受到批判。

至于“文革”就是一个很独特的时期，“文革”总的来说是无法无天，不需要法律，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应该说，这两个时期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性质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反右还是在整个保留中国的政治传统、法律传统下来搞的，而十年的“文革”是在不要法律、破坏法律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在“文革”时代是认识到了“文革”的破坏性，但是对它的走向，最后走到了改革开放的时期，这个自己心中是没有把握的。所以“文革”最后是以这种断然的措施、激进的办法把“四人帮”抓起来审判，然后中国走向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点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当然，后来中国的法律建设走过来的路程，三十年有很大的不同。我是一心一意的，平反了以后在为中国的立法和司法来奋斗、服务。总的来说，我的法律观念还是跟原来一样的，没有太大变化。

教师队伍中应该有不同思想、不同理念、不同学派的人

李怀宇：你在中国政法大学可谓是门生遍天下，像贺卫方先生就

讲过在学校里你对学生和老师都是宽容和爱护的。

江 平:我是特别欢迎年轻的人才,贺卫方是很有才能的。当时,学校又缺乏老师,这些老师来了之后,我们当然是要千方百计地希望他们留下来发挥才能。另一方面,我是特别欣赏那些思想解放的教师,能够有不同的看法,不是人云亦云、唯唯诺诺的人。教师队伍中应该有不同思想、不同理念、不同学派的人,这一点是我的主张。

李怀宇:你在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有没有思考过中国的法律人才断层的问题?

江 平:这是很明显的感觉,因为十年的断层是看得很清楚,在中国的法律教育里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真正正规大学法律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也就是到了六五届、六六届的这一段了,因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学校就停课了,即使算是政法大学的学生或者别的高等院校的学生也没有上过课,所以实际上的断层已经不只十年了,而是十三四年了。学校要么去参加生产劳动,要么去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学生在学校里能够学点知识的时间也寥寥无几,正经学的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些法律的政策,而不是法律的条文。因为那时候《刑法》也没有,《民法》也没有,《民事诉讼法》也没有,强调的是阶级斗争,应该说法律也不正规,也没有正经的东西,而且那时候整个说来,法律是个“左”的东西。所以,等到我们1978年复校的时候,就算是那些归队的老一点的教师,他们的受教育的水平和能力也远远不适应现在的需要,外语不行,知识欠缺。相对来说,我这样当初派到苏联去留学的,莫斯科大学的学习是很正规的,原来我在燕京大学有英语的基

础,又有留学的俄语的训练,应该说很不错了,像这样的一些人才就显得很缺乏。

李怀宇: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材怎么完善起来?

江 平:这也是当时欠缺的一个东西,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可以进口一些外国的法律书籍,但是很少人能看懂,或者说基本上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但是台湾来的书籍就比较方便,所以可以说当初对中国大陆的法律教育界影响最大的是台湾,也就是说台湾的这些书籍,法律的体系、法律的内容和中国大陆还是差不多,都属于大陆法体系,文字上又是同一种语言,所以大家接受起来也很方便。可以说,改革开放前十年里面,台湾对中国大陆法律的影响很大。当然现在我们自己的一些法律也越来越多了,学法律的招生人数也越来越多了,这促进了中国法律教育的发展。

李怀宇:你参与了很多法律的立法,当中你的意见有什么影响?

江 平:参与了,也不见得在里面起到多大的作用,立法都是集体的,尤其是立法决策的领导人更重要。我们只不过是起参谋的作用吧,出出主意。

李怀宇:你在八十自述中说《新闻法》还是不通过为好,现在你对《新闻法》的看法还是这样吗?

江 平:最近我们一些老同志呼吁开放新闻自由,这是我们的态

度,中国必须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这样一些法律,但是怎么来制定这部法律,问题是很大的。如果我们制定的是一部新闻管制法,那还不如不制定,我是持这个看法的。但是最近情况也有所变化,国家的《宪法》规定了言论、新闻、出版、结社自由,结果我们相应的单行法就没有,这也不合适。因为法院判决是不能够依据《宪法》来判定的,这是我们明确有规定的,单行法又没有,那么侵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行为又非常多,所以看起来还是要制定真正的、至少是相对自由一点的新闻自由的法律,所以制定一部《新闻法》是完全有必要的。

李怀宇:最近你们呼吁新闻自由的初衷是什么?

江 平:这主要是针对温家宝总理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看法,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有具体的措施。温总理在深圳讲了,结果报纸上发表的内容却删掉了一些,但是能明显看出来温总理几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恳切,能感觉到他面对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明知道我们的声音不见得被采纳,但是,应该更多地唤起民众注意,能够起到唤起民众注意就不错了。

解决高房价最主要的应该是治本

李怀宇:最近几年,每次出台一部法律都会引起很大争议,包括《物权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江 平：最近这些年，法律的通过比过去难度加大了，就是社会的不同声音突出了，而社会的不同意见表达又跟透明度有密切关系，现在网络的信息很畅通，完全封锁也不太可能。而《物权法》又是涉及到土地、房屋这些不动产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物权法》通过的时候争议很大。应该说，《物权法》最后有些条文是在笼统原则的指导下来把它规定的，所以《物权法》通过后并不见得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特别涉及到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拆迁和补偿的问题，所以到现在相应的土地管理和征收补偿这样一些法律出台不了。最近学者也呼吁要加快这两个法的制定的步伐，而且呼吁能够加强透明度。

李怀宇：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也有很多的争议？

江 平：对，《劳动合同法》争议比《物权法》争议还大，网上的各种意见有几十万条。企业家和劳动者的看法截然不同，企业家认为这部法是倒退的法，但是劳动者则认为这部法还是进一步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所以看法分歧这么大，这也表明现在立法的难度的增加。

李怀宇：《劳动合同法》里关于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你持什么态度？

江 平：我觉得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是必须要加大加快步伐的，过去像深圳的发展，很多都是外面去的劳动者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在那铺就了深圳的繁荣。改革开放的一定时期里，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长期下去不好。我们不能够只靠赚取廉价的劳动力来发展，这是一定要改变的，但是这个改变的速度应该把握好，不能太快，如果过分地强调劳动者的利益的话，也会造成经济发展的阻碍。如何

把握这个尺度,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发展了,劳动者的利益必然要提高,但是怎么来提高,时间怎么掌握好,这还需要很好地思考。

李怀宇:现在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特别像房地产,大家非常关注,因为房价涨得非常快。中央、地方出台很多新办法来限制高房价,这些措施跟中国法律有没有冲突?

江 平:解决我们当前房价的居高不下,最主要的应该是治本。当然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地的价格。土地的价格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国家供地的数量,一个是供地的价格。现在来看,北京房地产里,房屋的价格中,土地价格占了很重要的因素。那么,现在政府提出来土地的数量应当适量增加,这个是对的。如果我们土地供应的数量不掌握好,物以稀为贵,就这么一点地,大家抢着买,那当然是不行的。土地价格确定的方式需要很好考虑,现在这种拍卖的方法说起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大家都是公开的,谁价格出得高谁就能得到这块土地。但这种方式也有缺点,就是必然导致土地价格快涨,因为大家都想去得到这块土地,那么在竞价过程中,谁出的价格高就能得到,大家就会竞相抬价。现在,各地政府财政预算里面相当部分是土地收入,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北京市现在市政建设,地铁、公交需要很多财政上的收入来支持,而这种财政收入又是靠土地来取得,所以怎么能够从法律上规定限制政府从土地差价中来得到财政预算的收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从农民手中拿到土地的钱,跟卖给开发商的土地差价是很大的,不解决这个差价的问题,不能解决好房屋价格的关键问题,就是土地价格不能再上涨,土地价格应该下降。我们注意这个问题还不够,就是在银行贷款

只能限购两套房三套房其他方式上多考虑还不够,其实更应该从土地价格这个源头问题来解决。

李怀宇:这个问题跟地方的财政又有很大的关系,如何解决当中的矛盾?

江 平:这就是政府建设的利益冲动,现在一个县城也是到处盖房子,到处改变市容,但钱从哪来啊?主要是从地的差价中获取,这就是利益的冲动,因为为官一方,总是希望有政绩,总希望能够表现出来的是城市的建设,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趋势。有的人说现在城市的现代化就是靠拆迁,拆迁了就能表现城市化,要不然都是破破烂烂的房子怎么能体现城市建设的成绩呢?

李怀宇:你认为在法律建设方面对房价高涨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

江 平:还要配套地来变革,现在是想不出更有效的办法。我觉得现在抑制房价不能上涨过快了,这有可能做到;但要让房价长期能够停留在现在这个水平,办不到。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治理过程,要解决好现在土地的原始价格上涨过快的问题。北京现在开发后一块地卖多少钱啊?比起十年以前涨出很多倍来的,这些不解决的话怎么办呢?

民主是制度的制衡,自由是人民的权利

李怀宇:你在八十自述中谈到律师在法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认为现在律师的素质需要提高,还谈到要发扬“思之精神”。我前天去拜访了张思之先生,也深深体会到律师素质问题的重要性。

江 平:律师在一个国家的作用很重要,是一个民主的橱窗,人家要看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就看律师。律师有律师职业的困难,因为律师是自由职业,要靠收入来养活全家。但是我觉得维护权利是律师最主要的职责,无论是为犯罪的被告来维护或者为民事案件来维护,都要维护当事人的权利。中国公权力太甚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对律师应该是更宽松地来管理。但现在政府对律师规定得过严,限制收费、纪律、管理的办法,使得现在的律师很少能够发挥作用,尤其是政治案件当中的一些辩护,弄不好往往会由于辩护而获罪,像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现象,这需要很好解决。

从律师的教育素质来说,我们国家的律师总体素质比法官高。法官素质现在比过去高多了,高素质的人进来也多了,招了一些学士、硕士、博士也多了。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律师的素质稍微偏高一些。但是律师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中国的律师地位不高,为了发挥作用,就要更多地仰仗法官。这就造成了律师和法官不正常的关系,利用校友的关系、同学的关系,通过关系来解决法律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很正常的现象。律师素质不高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业务素质,一个是道德素质,业务素质相对来说好一些,但是道德素质有一些就

差了,为了能够多挣两个钱,有时候只能够低三下四地靠法官来帮忙。

李怀宇:你在八十自述中指出宪政的核心是民主和自由,现在如何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江 平:首先把《宪法》规定的权利都落实吧,这是最起码的一步。言论、新闻、出版、结社这些自由,它们的法律应该制定吧,这是实现宪政的第一步,很重要的一步。老百姓的知情权、参政权都是应该由法律具体来落实的吧。比如说选举权,我有选举权,但是选举结果我知道不知道啊?这也是应该保障我享有的权利。人大选举的结果我起码要知道。很多东西老百姓都没有知道的权利,这些应该是逐渐解决的问题。

李怀宇:你认为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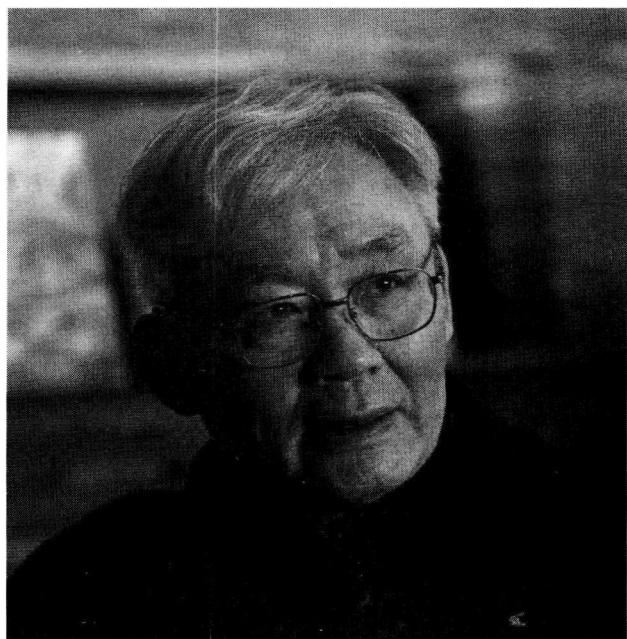
江 平:关键还是在于宪法的民主和自由,民主是制度的制衡,自由是人民的权利,这两个是最根本的。公权力要有制衡,没有制衡就要产生腐败;私权要得到保障,规定的人们的权利自由应该充分得到体现,这才是宪法的最根本要义。

李怀宇:经历了八十岁的人生,你认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发展到现在有没有大的进步?

江 平:看怎么说吧,如果纵向比较来说应该是进步很大了,这三十年发展很快,比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天壤之别了。但是如果

横向比较起来,还感觉很有欠缺,比起一些民主自由比较发达、政治比较开明的国家,很多老百姓应该享受到的自由我们还没有。

张灏：只有法制才能控制权力怪兽



(摄影：林津鹭)

张灏:1936年生,原籍安徽省滁县。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著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时代的探索》等。

英国思想家伯林(Isaiah Berlin)的名著《刺猬与狐狸》灵感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的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后来伯林研究托尔斯泰的历史观,发现托尔斯泰有细微描写人类生活的天才,可又像刺猬一样,希望找出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刺猬”与“狐狸”正好可以用来形容托尔斯泰作品所呈现的两歧性。我读张灏先生的著作,不由得联想到伯林之说,张灏学识渊博如“狐狸”,厚积薄发似“刺猬”,他提出“幽暗意识”与“转型时代”已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理论。

张灏 1953 年入读台湾大学,深受殷海光的影响,对自由主义思想有深切的认识。在纪念殷海光逝世四十周年暨雷震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张灏作了《殷海光先生的理想主义道路:从公共知识分子谈起》的主题演讲,刊载于 2010 年 1 月出版的《思想》第 14 期。张灏从美国学者罗素·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与萨依德的《知识分子论》谈起,两本书的中心意思都是对当代知识分子发展趋势表示不满,认为知识分子已失去应有职责与功能,对政治社会没有理念与关怀,不能发挥批判的意识。而“公共知识分子”要本着理念与知识,走入公共空间,面对时代的问题,真诚而勇敢地发言与介入。张灏认为殷海光是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公共知识分子的先驱与表率,面对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危机,不断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热烈地参与当时的各种政治社会的活动与讨论,终生把他的知识与理念,投入公共空间。

1959年,张灏负笈美国,1966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在读书时代与余英时成为挚友。张灏先后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在海外辽阔的学术天地与思想视野中,张灏渐渐形成多年治学的中心问题:如何探索时代大风暴的思想根源与背景。张灏的思考结晶之一便是名著《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张灏探索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认为中国传统也有着“幽暗意识”,不是一味乐观,但对人性缺陷和阴暗面的警觉和批判,则不如西方精神传统强烈和直接,因此对政治权力的看法也受到限制,是开不出民主宪政的重要原因。

2010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第三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邀请远在美国华盛顿的张灏担任讲者,两次学术讲题分别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政教关系——一个历史的考察》、《中国现代史上思想的激化》。在讲座期间,张灏先生难得半日闲,我有幸在香港沙田与张先生畅谈,这是2007年秋我在华盛顿张先生家拜访后的重逢。

公共知识分子要关心社会

李怀宇:你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在中国学界很有影响,关于“幽暗意识”的问题,我们在2007年探讨过,几年来你对“幽暗意识”有没有新的研究和阐述?

张 灏:“幽暗意识”是一个我常常想的问题。我也联想到别的问题,那就是幽暗意识带来对人的悲观的看法。假如顺着幽暗意识一直想下去的话,人似乎没有什么希望。那么,人的希望在什么地

方？中国人自 1895 年后，为了寻找希望，开始做“未来之梦”。梦是很美丽的，也是很危险的。可是，人也不能没有梦，没有梦的话，跟其他动物没有分别。顺着这个思路，我开始思考幽暗意识与人的希望，也可以说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对于我而言，这个问题因为近年出现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观念而益加迫切。

当代西方提出“公共知识分子”，主要是因为现代化发达的社会，很多人都是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在先进国家满街走，可以说是很普通的。假如大学生就算知识分子的话，那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一些忙着职业、忙着生活的人，没有理想，没有社会责任感。甚至在高等学府也是这样，大家都忙着升迁，忙着写专业论文，没有像从前罗素、萨特这些人关心社会，走入公共空间，本着他们的理想，发挥批判意识，所以要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观念，以别于一般的知识分子。因此，就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有理想，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关怀。放在中国近现代的脉络去看，中国的问题不是有无公共知识分子，而是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安排理想。因为，大致而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 1895 年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就承袭了来自儒家传统的经世理念，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再加上他们从西方近代文化特别是启蒙思潮，吸收了激进的人本中心意识，因而本有的理想主义有着极端化、乌托邦化的趋势，从而忽略了幽暗意识所要求的对人性负面的警觉，以致理想泛滥成灾，殷鉴就在二十世纪发生的历史巨变，但这并不代表，从幽暗意识出发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反对乌托邦主义。因为在我看来，乌托邦主义有两类：一种是高调的、建构型的乌托邦意识，认为人定胜天，人力无边，透过政治的运作发挥出来，建造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指日可待；另一种是低调的、指标性的乌托邦意识，认为乌托邦理想的实现性是很低的，它就像天空中的北极星一

样,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就人类群体生命的发展而言,它可以指示一个大方向,作为人类希望的寄托与努力的指标。因此,从幽暗意识出发,这后一种的乌托邦意识是可以肯定的。展望人类的前途,这两种意识相辅相成,相互为用,都有它们的价值。这些想法,是我近年来低调自由主义的一个发展趋向。

李怀宇:台北《思想》第14期上刊发了你的《殷海光先生的理想主义道路:从公共知识分子谈起》,殷海光先生去世几十年了,他的思想在当今的学术文化界还会产生影响吗?

张 灏:我那篇文章就是讲他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从早期高调的自由主义过渡到英美型的自由主义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殷海光先生真要讲学问的话,中外学问是不多,但是衡量殷海光不能用这样迂腐的看法,这用英文来说是 miss the point。殷海光可能没有什么我们所谓的很多现代中外学问,但他是指标性人物,也就是说在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中,二十世纪下半期,在海峡两岸,他是一个代表型人物。我在那篇文章里谈到殷海光一方面有强烈的理想主义与乌托邦思想,另一方面他走的是英美的自由主义道路,而不是从前在二十世纪初期由欧陆来的卢梭、黑格尔、马克思这一流派的激进主义的自由民主观,那是因为他师承的思想背景关系——金岳霖、罗素、海耶克。因此,他的自由主义并不完全放弃乌托邦,这就似乎和美国自由主义大师罗尔斯(John · Rawls)提出的“现实的乌托邦”有些暗合,是很有意义的。

李怀宇:现在好像是大陆研究殷海光的人比台湾和香港都多。

张 灏：2004 年殷海光基金会找我去演讲，谈现代的自由主义，没什么人来，一个大礼堂四五十个人，寥寥可数。大陆有很多人在追问“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所以对殷海光这种指标性人物还有兴趣。殷海光是二十世纪下半期公共知识分子的先驱人物。他是从少年时代、大学时代就走入公共空间，面对国家、面对社会发言。

李怀宇：当今社会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恐怕很少，什么才是公共知识分子呢？

张 灏：当然大陆很多人跟着起哄，很多人别有意图，但是大家都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不是所有读书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很多人读书完全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很多人念书都是随波逐流，这个问题提出来，我觉得很有意义。在西方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就是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是市场挂帅，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专业知识分子，以谋生营业为主，不算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只干自己的活，在大学教书的人真正关心的就是怎样升迁，怎样拿永久任期，到底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有多少关怀？西方人至少从二十世纪下半期开始自觉没有多少人关怀，所以要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来有别于一般知识分子，我想这个问题在大陆、在台湾也值得讨论。

中国人还需要学习“幽暗意识”

李怀宇：目前美国普遍的舆论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怎么看？

张 灏：美国这个国家很现实，我听说比尔·盖茨参观中国的经济建设，他的印象很深刻。说整个西方现在被中国经济发展震撼是没问题的，因为认为中国居然能够有这样的进步，在经济建设方面，有很多经济学家、观察家关注中国经济很好的现状，他们也有人看到隐忧。很明显，社会分配不均、贪污、能源、环境污染等等有很多问题，但西方也有人看到了，说不能只看眼前的繁华，这不代表未来的健康、未来的进步。

李怀宇：法制是不是在“幽暗意识”里面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张 灏：在西方，民主自由与法制是不能分开谈的。透过幽暗意识，西方人很早就认识到权力这个可怕的怪兽，只有法制才能把它控制住。例如，美国的开国之父们（founding fathers）在这方面很了不起，在构想未来的国家的时候，他们真是高瞻远瞩，知道民主处理危机可能是很慢的，但是民主能正视权力的可怕。美国开国之父们讲清楚了：我们的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可是我们头一个关怀就是把权力的怪兽控制住，然后再用权力做别的事情。我们做别的事情很可能没有开明专制快，开明专制是厉害的，如果政治第一，有些政策正式通过了，全国就马上实施，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另一方面，权力的怪兽到现在还在肆虐，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在“幽暗意识”这方面还需要学习。

民主的道路还很漫长

李怀宇：美国的开国之父当年就考虑到权力的制衡问题。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会铺天盖地纪念辛亥革命，你认为辛亥革命发生后，民国的开国元勋有没有和美国开国之父们类似意识？

张 灏：二者之间思想的距离很大。不过，那跟 1895 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很有关系，共和国成立了，可是共和国所要面对的问题是，他们的自觉性很差。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从人的基本性格去考虑整个社会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太差了。

李怀宇：你如何评价辛亥革命？

张 灏：辛亥革命代表 1895 年以后对皇权体制挑战的结果。但是推翻王朝以后，什么是民主，民主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应该有什么条件等等，对这些问题都很缺乏准备，所以，辛亥革命基本上是失败的。因为大家以为革命一来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没想到革命一来，国且不国，马上出现一连串的问题：袁世凯专制、张勋复辟、军阀割据，从这个意义讲，辛亥革命是失败的。从长远看来，它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透过辛亥革命，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政治秩序危机的深重。辛亥革命要成立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成立以后，虚有其表，反映了中国 1895 年以后的文化、政治的空前巨变。

李怀宇：从历史来看，在 1911 年之前，清政府在民心方面已经基本上丧失了吗？

张 灏：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是垮了。那么，垮了以后，中国人发觉先贤替他们思考的有关群体生命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教训，都不管用了。知识分子觉得要重新思考人作为群体生命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了，在这种彻底的重新反思与检讨之下，传统政治秩序，特别是它的核心——皇权体制，在一般的知识阶层的心中不但失去了有效性，也失去了正当性。所以，辛亥革命发生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革命以后，革命的正面功能，完全看不出来，国家反而陷于分崩离析的局面。另一方面，在 1895 年到 1911 年发展的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陈天华等人都看到，中国的民主不是轻易能搞的，要走开明专制。所以，辛亥革命作为一个革命而言是失败的。

李怀宇：孙中山在那个时代提出三民主义，是否具有先进性？

张 灏：那当然。那个时候他把这三个东西凑起来，都是大家关怀的。民族、民权虽然很模糊，很渺茫，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提纲挈领地讲出来了。还有一个民生，代表社会民主意识也增强了。

李怀宇：你对孙中山在他的历史时代所产生的作用如何评价？

张 灏：这很难说，很多人对孙中山的评价都不高。我们殷海光老师就是瞧不起孙中山，自由主义这一派的人多半是很反他的。我

认为,他无可厚非。在那种时代,要搞民主是搞不起来的,辛亥革命就是前车之鉴。共和政体一成立,马上就有人复辟,有人搞帝制。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很容易将民主搞烂掉。孙中山很早提出所谓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当然在那个时代是思想的先进人物,不过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的争议性很大。自由主义者很不喜欢他,我并不完全同意自由主义者的看法。从民主自由的观点看,孙中山在1923年以后搞民主集中。但是我认为中国在1895年以后需要稳健地搞民主,喊“民主万岁”的人非常多,可是了解应该怎么样建构民主的人非常少。所以,我可以了解开明专制,但问题是怎样再由开明专制走出来跟民主化接轨,这又是个挑战。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百年来思想上的准备是不够的,很多问题随着大变化而来,但他们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深度的思考,“五四”就是现成地将民主、科学拿来做口号。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就像夏志清先生讲的,主要关怀是“感时忧国”。但缺少人文意识,“五四”在这方面是相当肤浅的。他们对民主、科学的态度是拿来主义,拿来后马上就对时代的问题发言了,但是没有对时代问题后面的人的问题,对不论是个人生命或群体生命进行深入的思考。辛亥革命的影响当然没有“五四”大,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很偶然的。孙中山搞革命到处募捐,靠许多海外华侨资助。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后内斗得非常厉害,例如孙中山跟章太炎他们闹翻了,章太炎说孙中山在处理捐款时不干不净。内斗最厉害的时候,革命的阵营也分裂了。在湖北搞武昌起义的这些人,跟同盟会的关系是很松散微妙的。所以,辛亥革命并不是孙中山与同盟会在后面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动。辛亥革命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应该怎么处理,他们在很多方面是缺乏准备的。

金耀基：大学是知识创建基地



(摄影：林津鹭)

金耀基：1935 年生，原籍浙江天台。台湾大学法学学士、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著有《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大学之理念》、《中国民主之困局与发展》、《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国的现代转向》、《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敦煌语丝》等。

在金耀基先生的研究室畅谈了半天，我们沿着香港中文大学的山路散步下来，金先生笑道：“我退休几年后，学校里很少人会认出我，这是我最愉快的事。”共进午餐后，叫上咖啡，我们又悠闲地漫谈了起来。

2008年，金耀基先生出版了第三本散文集《敦煌语丝》，和第一本散文集《剑桥语丝》的问世已然相隔三十年了。在金先生看来，《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都是生命里的特别际遇：平常教学和行政工作繁忙，但是1975年到剑桥当访问学者，1985年到海德堡当访问教授，有了许多悠闲的时间，而这两地又如此漂亮，便自然地写了这两本“语丝”。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退任后，金先生有了更多悠闲，六十年后重回故里，便写了《归去来兮，天台》，畅游丝绸之路，便写了《敦煌语丝》。朋友们笑道，金先生写起“中国语丝”来了。其实，金先生写中国最早的是1985年的《最难忘情是山水》。牟润孙先生读后，写过一封信托董桥转交给金先生，说那是一篇古今以来难得一见的美文。

金耀基先生抗战时随家四处逃难，胜利后曾回家乡天台住过很短的时间。1977年，金先生写了敬悼父亲的《“相思”欲静，而山风不息》。如今金先生回忆起来，父亲是“中国转型期出来的读书人”，本是天台深山老坳里的穷小子，祖母硬是卖掉田地让他到外地大学读法律，二三十岁时就做过几个地方的县长，很有政声。1949年，一家迁台后，父亲在司法界做事，这也影响了金耀基先生后来就读台湾大学法律系。

从台湾大学毕业后,金耀基先生到政治大学研究所读政治,师从王云五。王云五在金耀基眼里是“奇人”:只有小学毕业,学问来自苦读勤修,“又像牛又像马又像骆驼”。王云五十九岁在中国公学任教时,购《大英百科全书》,穷三年光阴通读。“他的英文可以教胡适。在他任台湾‘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招待国宾,那些外国的领事或大使坐他旁边,怕他老先生不懂英文,以为要给他翻译。结果他一上来就是一席英文,令宾客惊讶不已。”金先生笑道,“他喝醉酒的时候,常满口英文,有时候会哭,因为金圆券的事情,我相信他是有大委屈的,背了这个黑锅,不愿意讲,也从未讲过。当年蒋中正让他做财政部长,那些黄金和外币换了金圆券后来都变得一钱不值,很多人把他看作是罪魁。我相信真相要比这复杂得多。”在王云五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时,金先生写了《人间壮游》一文追念这位恩师。金先生说:“王云五先生那个时代是大时代。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更不寻常,中国的变迁如李鸿章所讲‘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也是我一直关心中国的现代走向的缘故。”

1905 年的废科举改变了中国的文化宇宙

李怀宇:近几年来你特别强调大学问题,为什么?

金耀基:很简单,整个中国怎么样进入世界,有两个重要转向。一个就是 1905 年,废科举,那还是清朝,当然已经在维新的压力之下。另外就是 1911 年,整个政治宇宙改变了。现在一般人对于领导人怎么讲也无所谓,过去天子是皇帝,辛亥革命后,统治权已从帝王转到人民了,所以,孙中山说,现在四万万人都都是皇帝了。

但是,最根本的是 1905 年的废科举。我以前念书的时候还没感觉到这个重要性,最近十几年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今天所有转变,

都从这里开始，它是把中国的文化宇宙改变了。过去我们有士大夫，中国讲的读书人，当然学而优则仕，这是所有政治社会里面的中心思想，读什么呢？基本上四书五经为中心，当然，策论、文学也有，这是做人治国的基本知识的来源。

我们以前的学校，韩愈讲是传道授业解惑，传过去之道，这个情形在今天大不一样，是要创造知识，不只是传道而已了。过去以四书五经为主，等于欧洲的中古大学以《圣经》为主。到十九世纪末中国废科举，设学校，严复就讲，这等于秦朝废封建、设郡县一样重要。所以，我认为 1905 年之后是中国的文化与政治改变。从此之后，尽管有些转折，但出现了现代大学，先是京师大学堂，后来是北京大学。中国的大学一开始就是“现代”大学。

李怀宇：中国大学的发展和西方大学的变迁有什么样的关系？

金耀基：西方的现代大学是从欧洲中古来的，其实跟我们一样，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建立一个好的、善的东西，用英文讲是寻求 good, common good。很多大学传道授业，把道传出去，达到止于至善。1905 年以后，我们一进入现代大学，西方的大学包括美国开始从传统型转到现代型，也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中国大学从这点讲，几乎是跟世界同步走向现代的。当然中国自从有了大学之后，转折点太多了，政治上干预也太多，没有发挥到真正大学的作用。到了“文革”，几乎是没大学了。中国大学的文化灾难，是“文革”，因为不讲别的，人都跑去跟贫下中农学习，不要大学，知识都是坏的。

1905 年之后，中国大学成立，文、理、法、农等，这些都是按西方

大学的知识谱系。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蔡元培颁布《大学令》。《大学令》基本上就是把经学从知识谱系中拿掉。严复做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就不设经学了,蔡元培任校长前一段时间,经学又回潮,袁世凯居然称校长是中大夫,教授是下大夫,他根本不知时代已经变了。袁世凯死后,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大学再有改革,不设经学。蔡元培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德国的大学把中古大学重中之重的神学拿掉了,他说,北大把经学拿掉是一样的道理。可是,并不是中国传统的东西不要了,而是把经学里面的东西,适合文学的放到文学里面,适合史学的放到史学里面,适合哲学的放到哲学里面。应指出者,经学今天固然还在大学里有传承,但在过去,经学是学问的整体,而现在经学只是属于大学“文科”的一部分。在大学的知识谱系中,文科又是众多学问如理、工、商、医、社会科学等科之一科而已,故可以说中国的“经学时代”已结束,代之而起的则是“科学时代”,因为现代大学的学问是以“科学”为最大范畴的。今天我们讲中华文化复兴,无疑大学里面中国文化是以文史哲为主的,而只属于文科中的一部分而已。很多人说,今天人文凋零,这是有道理的。试想,在以前的话,所有学问都是人文,哪里还有人文与非人文之分?现在大学知识的谱系里面,相对地说,人文已退居到众科学问之一的地位了。不过,单就人文学科本身说,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一百年来,其成绩是可观的,甚至不会低于清朝以前。在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当然不止于文史哲),很多东西累积起来,成绩是不可菲薄的。

五四运动客观的作用是启蒙

李怀宇：如果我们用时段来回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19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就是五四运动。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但是他后来又说，因为这个运动受到冲击，没有达到文艺复兴的目的。你对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概念如何看？

金耀基：胡适是把新文化运动当做新潮看，把它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谈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我是把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分开而又结合起来讲的，五四爱国运动，争国家主权，而新文化运动则是对传统文化的重估与批判，主张思想的解放、个体精神的树立。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客观的作用是启蒙。陈独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最能象征地抓住了启蒙运动的精神。启蒙运动在欧洲也有分别的发展。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英国、德国的启蒙运动表现就不大一样。中国则是以法国的启蒙精神为主。当然，欧洲的启蒙运动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破坏力很厉害，所有的东西都被怀疑了，批判了，启蒙运动影响到大学核心精神之转变。中古大学讲信仰，现代大学则讲求理性，启蒙运动之后，大学成为建立在理性上的学术性团体，不再讲信仰了，尊科学、重理性以追求真理为终极目标。

现代大学的精神在德国最先出现，然后扩延到美国、英国，甚至那个时候中国也加进来了，蔡元培就碰到那个历史时刻。蔡元培是世纪之交特殊的人，他是一个老翰林，留学德国，那个时候德国科学

最先进,美国一流学者不到德国去留学的话,谈不上有学问。所以,德国大学影响到以后的美国研究院制度,研究院再加上英国的大学本科教育,就变成二十世纪的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这也成为世界的大学的典范。

李怀宇: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天翻地覆,再到“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几乎每三十年都有大变化。

金耀基:诚然,我觉得中国今天是进入另一个关键性的三十年。我最近在《明报月刊》写了一篇短文,名字叫做《2009年》,中国的现代转向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文明秩序,必须要另一个三十年。过去三十年,我们的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了不得的成绩,可以说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变成世界上经济国力第三。尽管现在仍有这样那样的缺失,中国第一个三十年经济现代化实在是太成功了。中国经济现代化之巨大成就,原因很多,这个成功的故事还没能讲清楚,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正遇上资本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在过去十几年,每年差不多都有五百亿美金以上的资金落在中国,这个不得了。这是中国所以能有巨大的生产革命,成为了“世界的工厂”。可是,我们社会还不够现代化,政治上更不够现代化,所以未来三十年,应是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并举。经济最后还是带出社会政治问题,所以未来三十年假如成功的话,在一个和平的状态之下能够继续有三十年的全面发展,那么,中国的现代转向基本上将会初步完成。我认为这时中国真正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在未来三十年的时间里,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是不能避免的,但它们的发展不会,也不能完全走西方过去的道路。政治

现代化并不一定说完全仿效西方的模式，其实西方本身也有多个模式，但是必须把民主的精神贯彻了。民主不能只是一个口号，必须制度化，孙中山讲每个人都是皇帝了，后来又有讲人民当家作主了，国民党创建的是“中华民国”，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把“人民”定为国家的主体。在这个情况之下，人民的同意与认可是统治正当性的源泉。因此，必须建立起一些制度，使政府对人民有责任，有交代。当然，包括一个现代的政治，不能没有司法之独立，法治与民主是不可分的。总之，老百姓要有参与权，老百姓的权利要有保障，政府不只要注意到老百姓的意见，还要有交代的机制。未来的政治秩序，必须是一个有公义的秩序，就不能不是一个有民主性的政治，就如黄遵宪讲的“太平世必在民主”。千万不要以为民主是洪水猛兽，或者是可爱的天使，它只是在人民主体性被唤醒之后，唯一能够建立政治秩序的制度。过去在中国社会、西方社会里，君主专制的时候，好的时期也是靠运气，出了圣君贤相，民主政治就不是要靠运气，在民主的政治秩序下，天堂上不了，但不会出现地狱。

经济的现代化可以带动社会现代化

李怀宇：文化因素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金耀基：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不知不觉地认为文化是最重要的东西，实际上，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说到底，文化也在发挥重要的作用。最近亨廷顿去世了，我以前谈过他，有些地方他讲得很有道理，

最主要是说在全球领域中,今后的大冲突,其根源是文化。文化取代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也许不是“取代”,但表现到最后的方式,不能避免有文化冲突的出现,这基本上是说得通的。在社会学里面,一般授课讲制度,讲文化,我认为制度与文化观念可以分开讲,但是到最后,制度的问题也牵扯到文化。一个社会,就算是移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是有文化的因素在里面发生作用的,当然,文化本身也是会变的。人类历史之变,也必然是文化之变。中国过去三十年变化够大的了,显然有一个全球化的影子,我有的时候到了深圳、上海,在有些高档的商场,有的连中国字也看不到,好像中国文化不见了。当然,这只是看到事物的一面,其实中国自来就不断吸收外来的东西,中国文化的内涵不断在扩大,这是中国文化能够长久的原因。汉代以前我们哪里有佛教的文化呢?可是汉代以后你说中国文化可以不讲佛教吗?我是从事社会学的,讲中国宗教生活有比佛教更重要的吗?没有。中国读书人,很难说没有受佛教的影响。从宗教层面讲,宗教是人类生命世界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佛教之后,基督教也进来了,这是不是我们被“印度化”了,“西化”了呢?没错,我们是接受了印度文化,接受了西方文化,可是从另外一个观点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并未消失,中国文化其实是把自己扩大了。今日我们视之为西方的东西,五百年、一千年之后,我们就会视之为中国文化的新元素。

李怀宇:现在大陆很多人讲到普世价值的问题,有些人非常希望普世价值遍及中国,而有些人又抗拒。你是如何看这种现象?

金耀基:普世价值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这也很自然,这种争论

也不限于中国大陆。价值的东西是常受文化局限的，同一个文化圈的人，常会觉得他们所喜爱或尊重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不同文化圈的人就往往不作此认同。在今日全球化的时代，文化间交流或接触多了，一个文化所认同的价值便被另一文化圈所认同了，也就增加了该价值的普世性了，过去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韩国，中国的价值也就为日本、韩国接受，中国的仁、义、忠、孝等价值也就有了跨文化性或普遍性了。十九世纪以后，西方文化向世界扩散，出现了一个全球西方化的现象。西方近代形成的一些核心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也渐为许多非西方社会的大众所认同，也因此有了跨文化性或普世性了。无疑的，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在全球是处于主导性地位的，因此，西方人，特别是有的政治人，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做法作普世性地宣称。在全球化的时代，价值的普世性是存在的，但我们也必须了解，今日全球仍是一个多元文明并存的时代，要世界有一个和平的秩序，“对不同文明的价值尊重”就是必要的，而这本身也许应看作是多元文明间一种“普世价值”。

李怀宇：全球化的浪潮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什么重要的影响？

金耀基：到目前为止，形成所谓世界性的政治经济的型态有好多种，但最有世界性意义的两种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苏联垮了之后，弗朗西斯·福山认为 the end of history——历史终结了。他这话讲得太快了。从 1917 年列宁革命之后，二十世纪出现了一个共产世界，与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平分天下，共产世界的社会主义从经济上表现出来最具体的就是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相对立。

到了二十世纪末叶,共产世界的经济普遍落后,最后崩溃了,这当然证明计划经济失败了。现在的中国,经济上已经开始大大地变革了,也走上市场经济了。最根本的是,1978年后,中国真正展开现代化了。中国参加WTO,意味着中国进入世界,世界也进入中国。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成为最生猛的一员,正因为中国进入世界,中国才能成为“世界的工厂”。整体上说,经济的全球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李怀宇:这次金融海啸对中国未来的变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冲击?

金耀基:中国能够在三十年中尤其在过去二十年有巨大的发展,每年的GDP是双位数的成长,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现象。原因很多,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其中一个外在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遇上了全球的金融体系。全球金融资本是看全球哪个地方比较优越,包括政治安定性与开放性,就会投向那里。孙中山革命的时候就希望借外国的资本来发展中国,可是钱不肯来。现在,全世界的资本,每年五百亿美金以上跑到中国来,五百亿美金转化一下,可办几个工厂?可用多少人?中国过去二十年成千上万的工厂、公司遍布大江南北。当然,正因为中国与全球经济紧扣一起,美国或其他地方是出了金融危机,就立即成为全球性的经济海啸。中国以前有句话叫:“铜山西崩,洛钟东应。”这就是说,全球化的影响,西边一崩的话,东边马上就出问题了。纯粹从金融体系来讲,中国还没有跟西方百分之百地融接在一起,幸亏不是,因此还有一道防火墙,所以那些古古怪怪的金融衍生工具中国还很少用。香港出问

题就比大陆多,但是,虚拟经济马上就转到实体经济了,中国的问题就大了。出口出问题了,所有外资、外销导向都出了问题。订单不来了,怎么办?外销占了中国GDP近三分之二,中国的出口是世界的,但以美国为主,而美国的经济主要靠内需,中国太靠外需了。诚然,政府处理经济危机相当有力,稳健与有方向感,把主力放在创造内需市场上。大家很了解,美国基本上靠内需,日本也以内需为重。中国十三亿人,真正进入消费市场大概只有三四亿人口吧,开放前后说中国是个大市场,未必真实,现在消费革命出来了以后才真正有市场。中国内需加大了,才会有一个扩大的消费革命。当然,有生产革命才有消费革命,人民口袋没有钱的话哪里来的消费革命?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大量的人进入到所谓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在消费活动里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认为消费革命是中国走向经济民主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消费者有自主权,不是以前计划经济,你生产什么东西我就要什么东西,你有什么我就吃什么。现在不是了,我要吃什么就买什么,我有选择了,这种就是“消费者主权”的观念。近来出现毒奶粉这些问题,消费者受害,而最后消费者拒绝他们,他们就得关门了,不需政府把他们关掉,消费者会把他们关掉。

未来内需扩大之后,中国的消费革命进入到第二波。这个消费革命真正强大的时候,在总人口里占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以上,那中国的社会力量就大得很多,经济的现代化可以带动社会现代化。

李怀宇:唐德刚先生提出中国两百年走出历史三峡,从1840年到2040年,你对他的这个论断如何看?

金耀基:到底二百年还是几百年,我不会这样说,但是大的社会形态的转变,绝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我说中国的现代转向就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事情,中国现代化的路程,大概要跨越三个世纪,从十九世纪末开始,通过整个二十世纪,我希望在二十一世纪另外一个六十年,中国的现代化会完功,我不晓得加起来是多少年。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型。科学,特别是科技,真正有飞跃性的发展是在二十世纪,发明东西之多,影响人类的生活世界之大,史无前例。过去中国有发明,欧洲与其他地区都有,但大都是极少数天才型的人做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搞科学研究,玩票的多过专业的,但是在二十世纪,数以万计的人全天候的、全职的,并在一种专业的基础上从事科研工作。二十世纪的研究型大学里,理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各种研究所、研究中心就是做全天候的、专职的、专业的科学研究,这是知识的创造。以前中国有儒学、理学、道学、佛学等等,二十世纪最大的学则是科学。不止有自然科学,还有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也被论成“人文科学”了。

二十一世纪科学研究的对象已经到人本身了。过去研究自然,今天到人,生物科学中基因的研究已有突破性发展了。这些知识,搞人文的常常不看重,其实真正改变世界、改变人的自我形象的就是这些。中国现代化企图建构的现代文明秩序,无可避免的是一种科学元素极重要的文明秩序。今日人类的文明,跟科学是分不开的。现代大学尊理性,重科学,对科技知识的推动的角色越来越重,但是,却也不能走科学主义之路,不能够让科学万能的观念笼罩一切,大学教育中人文的地位是绝不能妥协,或被边缘化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理，在新知，在止于至真。”

李怀宇：你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大学之道，中国的大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什么重要的角色？

金耀基：在整个现代化过程当中，今天已有了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概念。以前，知识本身不是一种资本，但在新经济中已成为最主要的资本。二次大战之后，大家越来越清楚，大学已经成为创造知识最主要的地方。古典的“大学之道”是“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在我看来，现代大学的“大学之道”已变成“在明明理，在新知，在止于至真”。“在明明理”的“理”，不是中国过去讲的做人的道理，而是事物之理；“在新知”，是在创造新的知识；“在止于至真”，是寻求真理。这是现代大学的大学之道，不是传统时代的大学之道。欧洲十八世纪在启蒙运动以后，西方大学已经变成了以理性为主，与中古大学以信仰为主不同了。十九世纪科学进入大学之后，在大学的知识谱系中，科学的分量越来越重，科学的范畴越来越大，科学的知识不止占据主位，科学已成为衡量一切知识的尺度，中国过去讲的“德性之知”或希腊讲的“实践知识”都是求好、求“至善”的知识，今天都有被边缘化的现象，有的大学甚至不讲！

中国的现代化，讲到底，必须依赖知识，而大学是创造知识的主要基地，因此大学在中国现代化中扮演了根本性的角色。中国现代化是为了建构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这个秩序，不止是经济的，政治的，也必然包括道德的秩序，伦理的秩序。因此，我要强调，现代大学

的大学之道,讲追求“至真”是不够的,还要讲追求“至善”,这样,今后的大学之道必须把古代的大学之道与现代的大学之道结合在一起,亦即求“至善”与“至真”同时并举。若如此,则大学所传授所创造的知识就不可只重“理智的知识”——最有代表的是科学知识,还需重中国过去讲的“成德”之学,“德性之知”,或者希腊所讲的“实践知识”。这也是一种价值之学。

知识变成了经济的重点

李怀宇:现在中国大学的教育水准,放在全球视野来看,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金耀基:香港的几所大学,最近几次被 *London Times* 排名在一百名之内,最近该报又把香港三所大学排名为亚洲大学前五名之内。试想,全世界大学有两万五千到三万所以上,能够排名在一百名之内甚至五十名之内,这是了不得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排名游戏看得太重,许多这类的评估方法都太粗糙,都很难精确,未必能完全反映实际状况。至于中国大陆的大学,我了解有限,不完整,很难作全面性的评论。我只能讲,中国大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大学残败到那样的程度,几乎比零点开始还难。我没有想到中国大陆大学在过去三十年中能够有这么强大力量的恢复,现在不但是恢复,有一些大学跟世界接轨得很紧。有世界级的水平,这是很令人鼓舞的,这是中国大陆过去三十年国力大增的原因之一。我举个例子,三十年来这么大的经济发展,需要很多的人才,绝不能完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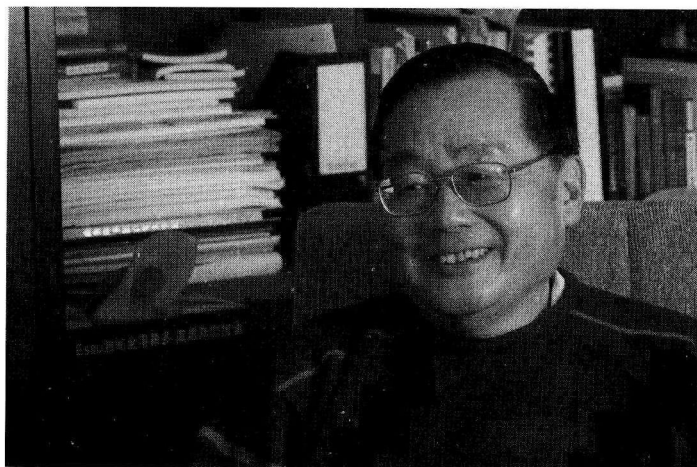
从外国来，不去说公司、工厂总经理、CEO，也不去说政府高中层的领导班子，下面不同层次都需要大量人才，哪里来的？绝大多数是从大学来的。大学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成千成万的技术人才。一些高素质的大学，很多方面都跟世界一流的大学接轨了，所做研究跟世界最先进的东西没有什么落差，师资显然在不断优化、强化。有一点，中国大陆的著名学府，不讲别的，学生素质都十分优秀，学生好，办学就成功了一半。有好学生，好学者也愿意去教，当然，有出色的教师阵容，也就能吸引出色的学生。今天的大学生就是三十年以后国家社会的主干。目前中国大陆好好坏坏有一千六百所大学，美国好好坏坏有三千多所，他们是三亿人口，我们是十三亿人口，我们的大学绝不算多。一个现代化越先进的社会，其工作人口就越要大学的毕业生，中国现代化越成功，就越要更多的大学提供更多的人才，更多的知识人。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必然是一个“知识社会”。大学在今天已成为国家社会创建知识的中心机构。一个国家的大学实力与一个国家的国力是分不开的。其实，国家的硬实力也好，软实力也好，讲到底，都是知识力，而大学是创建知识力的场地。

李怀宇：余英时先生讲到美国大学的发展时，认为民间的力量非常重要。

金耀基：美国立国才两百多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已经是三四百年了，这表示，美国是先有社会再有政府。要注意，美国只有州立大学，除此之外就是私立大学。很多世界著名的大学，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芝加哥、哥伦比亚、斯坦福等都是私立学校，很难得的公立学校，像加州大学的伯克莱或者密西根大学也是出类拔萃的。但是，

美国基本上是民间办大学,社会办大学。美国是一个大社会。为什么二十世纪美国能变得那么强?是因为国家强,社会也强。在美国,许多事政府可以不必揽过来,社会都去做了,社会办大学就是其一。美国这种公、私立大学并举的现象,可说是“美国模式”;日本、韩国都采用这个模式,1949年前,中国亦如此。1949年后,政府什么都管,什么都承担,教育这一块,更是如此,可以说是走欧洲模式。欧洲没有私立大学的。在欧洲,像英国都是公立大学,私立学校只有一两间,那是异数。坦白讲,现在私人要把大学办得像公立学校那么成功,很难,因为需要的钱太多了,不是一点点钱,比如说要创设一个像样的医学院,要多少钱放进去?中国近二三十年来市场经济出现了,有钱人出现了,私人办学的可能性有了,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是为了真正办教育,认为这是一笔生意,很好做,这就不可能办得好。我想,在中国未来三十年当中,可能会出现真正像样的民间大学,那是真正的一个强国家、强社会。强社会跟强经济、强市场是联在一起的,不能分开。

陈方正：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散步



(摄影：林津鹭)

陈方正：广西岑溪人，1939 年出生于重庆，1949 年随家人迁港，中学毕业后，1958 年赴美深造，在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及拔兰大大学 (Brandeis University) 分别获得物理学学士及物理学博士学位。1966 年返港，任教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并从事理论物理及高分子物理学研究。1980 年出任大学秘书长，1986 年出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参与创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负责建立“中国古代文献电子数据库”。2002 年退休，2004 年受邀出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自然科学史讲席”。著有《在自由与平等之外》、《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坎上：陈方正论文自选集 1984—2000》、《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迎接美妙新世纪》等。

穿过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庭院，进入陈方正先生的办公室，迎面是江兆申的书法，里间则挂有黄胄的驴子。书架上，中英文的科学与人文著作杂陈，一眼可见他与吴清源、杨振宁等人的合影。

“我喜欢说笑，可是我太太讲：陈方正正在他父亲面前好像变了一个人，老老实实，一句笑话也讲不出来了。”陈方正先生笑道。他的父亲陈克文（1898—1986）留下了十二册日记，记录八年抗战和国共战争期间在国民政府的见闻，特别是两度撤离南京的始末。由他编校的《陈克文日记辑录》，从2010年3月起在《万象》连载。在前言中他介绍，陈克文生于广西岑溪县，在广东高等师范毕业后加入国民党，“促成此事的是比他稍长的小同乡甘乃光。甘毕业于岭南大学，才华出众，深得左派领袖汪精卫器重，在党内扶摇直上。”因为这层关系，他父亲也长期被视为汪派中人，直到1938年汪公开投向日本之后，才和他划清界线。陈克文历任行政院参事、立法委员、短暂的立法院秘书长，长期负责实务，得以从内部和中层来观察政府运作和众多政坛人物言行，因此这《日记辑录》颇具历史价值，而日记全文由陈方正编校出版。

1949年，陈方正一家人在父亲带领下先后到了香港，后来他父亲到圣保罗中学担任国文和历史教职，陈方正最初进岭南小学，初中毕业后，也到圣保罗就读。有一次，钱穆到学校来演讲，他被派在前排做记录，虽然不大听得懂无锡口音，却深深为钱穆的言谈和气度所倾倒。他后来读到钱的《国史大纲》和

《历代政治得失》，对历史产生了极大兴趣，也翻阅过唐君毅的《人文精神之重建》、牟宗三的《认识心之批判》、劳思光的《康德知识论要义》，更对刚创刊的《自由学人》月刊入迷。当时他父亲用课余时间办《自由人》政论周刊，和这些学者大都稔熟，陈方正却从来没有想到和他们攀谈，向他们请教。“大概因为我是广西人，比较笨。爸爸是从乡下出来的，脑子并不那么灵活，许多事情不会拐弯。”

在中学期间，陈方正兴趣广泛，英文学得很好。他的英文老师最初是尹振雄，谢扶雅的夫人，岭南大学的高材生；后来是赖恬昌，他出身世家，父亲赖际熙是前清进士，著名的“赖太史”，香港大学第一位中文教授。多年后，陈方正到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有机会与赖恬昌的大学同班同学刘殿爵合作编先秦两汉传世典籍逐字索引。他说：“刘殿爵晚年神经老是很紧张，消化因此不好，这和他做学问很严谨认真，不知道是否有关系。刘教授终身不娶，他四兄弟姐妹都没结婚，是很奇怪的。赖先生说，当年在港大他们同班四个好朋友中，大家公认金应熙学问最好，同学都尊称为‘金老师’，他后来去了岭南大学任教。刘殿爵第二，赖自己只排第三。赖先生为人豁达，他教我们英文是大而化之，很宽松的。他将近九十岁了，还天天自己上街，和朋友喝酒吃饭，真是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太难得了。”

1957年，陈方正中学毕业，其后申请到全额奖学金，赴哈佛大学攻读本科。他从香港带了一口至少重三百磅的大木箱，装满科学、数学、历史、小说、诗歌、哲理的书籍，八年后回港工作，又全运回来，还添加不少新书。他自认在哈佛大学“一味以行军打仗的心情去攻读最艰深的课程”，后来选择去附近的拔兰大(Brandeis)大学攻读博士，但此校所处的Waltham小镇闷得要死，于是他跟从前哈佛大学的同学陈礼谦在剑桥合租房子同住，开一辆有十年历史的雪佛兰破车上学，但此车有灵性，从来不在离家方圆一英里以外的地方抛锚。1965年夏天，住在楼下的吴大峻带来一位哈佛教授介绍给陈方正，说那位教授围棋上了瘾，希望和他下棋。陈方正当时正为论文苦苦挣扎，推说没空。那位教授

苦笑道：“论文嘛，我倒可以替你写的啊。”然后无奈离去。三年后，陈方正到日内瓦国际原子能研究中心（CERN）访问，不意和那位教授异地相逢，两人客中寂寞，下棋消磨了许多个黄昏。那便是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共同得主之一格拉肖（Sheldon L. Glashow）。

1966年夏天，陈方正通过了博士论文口试，随即回到香港，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的教学生涯，1980年他出任大学秘书长，1986年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认为，自己从事大学行政可能是受父亲熏陶。“我从小看父亲起草公文、编目录和报表。他访客总带我去，他们谈公务，月旦人物，议论国家大事，乐此不疲，我这六七岁的孩子一句也听不懂，总是很不耐烦地跑来跑去。可是没有关系，他照样带我去。后来我才明白，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办法：听虽然听不懂，可是不知不觉中会吸收很多东西。三十多年后，马临让我去当秘书长，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到了秘书处，我觉得一切都很自然，很容易上手，都不用怎么样学习，其实是我小时候无意中跟爸爸学过了。”

退休后，陈方正花四年时间埋首于《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的写作，这部厚重的著作因“李约瑟问题”而起，重点则是科学史。余英时先生在近万字的长序中说：“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也就是‘incommensurable’的。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李约瑟问题’说：中国的‘科学’曾长期领先西方，但十六世纪以后‘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于是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这无异于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艺’突飞猛进，已远远超过前者了。通过‘棋’的模拟，我们不必再多说一句话，已可知‘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远在1950年代，陈方正正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已经常和余英时下棋论道。

几十年来，陈方正正在科学与人文之间自由漫步，既从事物理学的教研，又长期担任行政工作，热衷人文思想的讨论。1980年，时任中文大学秘书长的陈

方正与杨振宁相识,并结成了长久的友谊。陈方正回忆,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无疑刺激了他选择攻读物理学。他笑道:“我认识的很多人聪明才智其实都相差不远,但杨振宁的确是天才,头脑不是我们能够相比的。物理学博大精深,和我同辈的许多人钻进去一辈子,运气好,可以有不错的发现,运气不好,就如入宝山空手回,至于说得上开拓新境界的,则绝无仅有。”就在访谈的前一天,陈方正与杨振宁共进午餐,杨讲了朱自清的大儿子朱迈先的故事。朱迈先和杨振宁当年是住在清华园的朋友,极为聪明,意志坚强,组织了一个救国读书会,杨振宁也参加,跟着他转。后来朱迈先不见了。1973年杨振宁回国,问起他的情况,无人知道。两年后,有人告诉杨振宁,朱迈先参加共产党,在广西叛变被处决。最近,杨振宁才又得知,朱迈先平反了:原来他加入共产党是秘密的,抗战胜利后投国民党,从事间谍工作,当地的共产党不知内情,以为他叛变,就把他杀了。陈方正听后劝杨:“你赶快写回忆录吧,这许多故事都要尽快写下来。”

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深

李怀宇:外人从你父亲的日记中了解历史风云,你脑海中的父亲形象是什么样的?

陈方正:我父亲有个别号叫用五,因为他排行第五,又觉得必须学以致用。他在家乡的大新小学毕业后,到县城的岑溪中学读书。当时广州的国民党派人沿西江往上游去宣传革命,父亲受了感染,又看到广东高等师范招生,那里不但完全免费,还包吃住,所以他就心动要出来闯荡。我爷爷去世很早,祖母卖了不知道多少担谷子,也许还卖地,这才给他筹到旅费,让他到广州应考。他很幸运,考取了,成

为从我们那荒僻的桂珍村出外读书的第一人。岑溪县在国民政府时代出了两个政界人物，最有名是甘乃光，他做过国民党中央委员，广州市长，后来外放首任驻澳洲大使。其次就是父亲，他毕业以后入了国民党，因为是农村出身，就安排在农民部工作。在武汉时期，父亲和毛泽东一起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给他的一封信，谈所里人事问题的，现在还存在台湾的档案里。我问过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但不得要领，不知道是不想讲，还是不大记得了，因为当时他已经八十岁了。北伐成功，定都南京，他1935年进行政院任参事，管文书、后勤之类事情。七七事变以后南京失守，他是政府撤退的最后几个人之一，大概是南京沦陷前两三个星期才走的，这在他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载。可是他在1937年以前的日记都失陷在南京了，没有能够带出来，非常可惜。

撤退后，国民政府先去武汉，再去重庆，我爸爸仍然在行政院做参事，没有变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整个交通安排由他负责，所以他又是最后走的人。抗战胜利是1945年8月，他1946年10月才回到南京。后来他不愿意继续留在行政院了，1948年行宪，他回到广西竞选立法委员。我问过他：“这应该很容易吧，国民党当然是支持你的？”他说：“哪里，国民党一点都不支持我，我是一个人自己去的，跟当地国民党所支持的人竞选。”后来我看他1948年的日记，这一段竞选经历讲得很详细。他是很辛苦的，一同竞选的对手有汽车，到处拉票很容易，他没汽车，这位对手还很慷慨请他一同走。无论如何，他选上了立法委员。1949年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做代总统，这时他已经被拉出来做立法院的秘书长了，但只做了大半年。1949年10月左右，他在广州辞官，到香港来，没有去台湾。那时他已经对国民党，对蒋介石感到十分失望，后来李宗仁也跑到美国去了。

李怀宇：唐德刚问李宗仁为什么不去台湾，李宗仁说，我在那里没有班底。

陈方正：父亲从1925年到1949年，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前后工作了二十五年，这是他的前半生，他到香港的时候刚过五十岁，打算做点小生意谋生，结果彻底失败。他从来没做过生意，所以没用多少时间半生积蓄就亏蚀光了，只好回到老本行：教书。他在1952年到圣保罗中学教书，一直教到1978年，足足二十六年。那时候我们极力劝他，结果他还是到八十岁才肯退休。所以他的工作生命恰好分为前后两半：前半从政，后半教书。

李怀宇：你父亲对你有什么影响？

陈方正：影响非常大。他讲话很少，直接教导我的，只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给我讲故事，讲《三国演义》、《水浒传》；在我初中阶段，他利用暑假教点英文，教点《古文观止》、唐诗宋词，前后也不过两年。平常他只限于言传身教，不满意的时候从来不会责骂，甚至不开口。有一次，我考试成绩很差，他很不高兴，但只是在门前沙滩上沉默散步，让我感觉他的失望。父亲是那种规规矩矩，老实忠厚的人，有抱负，有思想，但是不灵活，更说不上政治手腕。他在行政院的最高职位是审计长，大家觉得把钱交给他，把人事交给他很可靠，因为他毫无私心，绝不会玩花样。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深，但完全是心底里无形的影响。

物理学是一门没有止境的学问

李怀宇：我非常感兴趣，你在香港读完中学，直接考到哈佛大学读本科，而且拿了奖学金，这在当时的香港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吧？

陈方正：那时候大概很少，后来慢慢就多了。美国开头对香港学生兴趣不大，我那时候主要是受惠于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美国很紧张，要大量吸收全世界优秀青年帮他们发展科学，以赶上苏联，这成为一个国策。其次，杨振宁和李政道那时候刚刚拿了诺贝尔奖，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也令美国对中国人刮目相看。第三个原因却比较微妙：当时香港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青年，但他们并不懂得怎样申请进美国大学，更想不到人居然会给奖学金让你去读书。我很幸运，因为父亲的老朋友何炳贤是在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园毕业的，他两个儿子都已经去了美国读书，所以他很熟悉申请的门径。本来我想都不敢想赴美留学，他却极力主张我向多所大学申请一试。我照他教的办法进行，因为中学会考成绩很好，所以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

李怀宇：在中学，你已经对物理学感兴趣吗？

陈方正：我最早是喜欢文学的，着迷于传统诗词、小说，冰心、巴金、鲁迅的作品都看过，很多西方小说也看。到初三，无意中看到一册《微积学发凡》，自此就对数学发生浓厚兴趣。那时候对物理学并没有认识，也没有兴趣。到高二，有些积分题我做不出来，到处问人，

于是有一位同学介绍我认识还在香港大学读书的陈匡武。我们很投缘,在他指导下,我开始对物理学发生兴趣。到了哈佛以后,导师问我:“你到底预备学什么?”我说了一句很狂妄的话:“我对数学、物理学、哲学都很有兴趣,希望三样都学。”这当然很幼稚,导师笑笑说:“你志气很大,很好,不过这三样都很难,最难的是物理学。”我想,应该先学最难的吧,这样才真正决定主修物理。

李怀宇:当时哈佛大学物理学系在物理学界的地位如何?

陈方正:我的物理学老师里面后来得诺贝尔奖的最少有四五个人,即施温格(Julian Schwinger)、兰西(Norman Ramsey)、格劳伯(Roy Glauber)、庞德(R. V. Pound)、基尔拔(Walter Gilbert)等。可是当时就已经得奖的,好像只有布列兹曼(Percy Bridgman)和佩塞尔(Edward Purcell)两位。我修过格劳伯、佩塞尔和基尔拔三人的课。还记得相当年轻的基尔拔教我们量子场论,在上完最后一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今后要转行了,转到分子生物学去,后来他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当时物理学的中心不知道是否仍然在芝加哥大学,但是费米已经去世,而哈佛正在急速冒起。

李怀宇:你还修了很多人文学科的课?

陈方正:对,我野心很大,第一年就已经修了三年级的数学,二年级的物理学,所以学得很快。当然我一直对人文兴趣很大,我在高中的时候胡乱读过不少哲学方面的书,当时友联出版社出了《自由学人》月刊,可惜只有两三年就停刊了,记得余英时在里头也有文章。那杂志好极

了,介绍西方的哲学、历史学、各种思想、各种大学者的传记,我看得津津有味。所以到美国之后,我很自然地对历史学、哲学产生兴趣。历史方面我念的是欧洲十九世纪外交史,那是近代史最重的一门课,老师朗格(William Langer)是个德国人,对一次大战前欧洲外交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演讲也炉火纯青。另一门是康德的“纯理性批判”,我一点背景都没有,就去修了,而且拿到不错的分数。记得老师是刚毕业不久的吴尔夫(Robert Wolff),他很自豪,把自己的师承一直追溯到康德本人。此外我还修了佐敦(W. K. Jordan)教授的英国十七世纪史,讲清教徒革命,讲英国大转变的枢纽。那时候我不知天高地厚,专挑最难的课来上,所以搞得很紧张。

李怀宇:当时有没有想以物理学作为终身研究?

陈方正:我当时很不成熟,觉得什么都可以做。实际上,物理学博大精深,是一门没有止境的学问,要有成就,得一辈子钻在那里。其实大部分人天赋相差不远,努力一点,读书多一点,或许际遇好一点,那么成就可以稍微好些。当然,杨振宁不一样,他的确是天才,我跟他熟了以后清楚知道,他的头脑绝不是我们比得上的;丘成桐虽然不熟,一定也一样。物理学那么博大精深,像我们这样资质的人运气好,可以有重要发现,运气不好,也可以及格,但前提是必须一辈子钻进去,浸淫在里面,不能够心有旁骛,还想做别的事情。我那时候总以为只要努力,这可以学,那也可以学,实际上精力一分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在中文大学我做过不少事情,有很好的同事跟我合作,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可是都算不上什么,就是因为精力分散,兴趣太广。

李怀宇:在哈佛大学的时候,你跟余英时先生已经很熟了?

陈方正:他家里去过好多趟。当时中国留学生都是孤家寡人,精神上比较孤寂,到周末总要聚一下。余英时父母在那里,有个家,地方也很大,大家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李怀宇:当年哈佛大学名师云集,你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大家?

陈方正:奎因(Willard V. O. Quine)很有名,我去听过他的数理逻辑导论,可是我跟这没缘,半个学期就作罢了。教我们“史诗与小说”这门通识课程的芬利(John Finley)讲荷马史诗,年纪虽大,还是风度翩翩,妙语如珠,至于教高级量子力学的费利(Wendell H. Furry)则因为受过“非美活动委员会”折磨不久,已是个愤世嫉俗的老人了。当然,还有当时得令的费正清,我1958年刚到哈佛就见过他,不过对他的地位、成就一无所知。第二趟见面则已经是三十年后,当时我已经离开物理系到中国文化研究所来工作,1987年回哈佛进修,碰上他八十大寿,他们为他办了一个盛大庆祝酒会,于是躬逢其盛。我刚到哈佛的时候也见过杨联陞,费正清那酒会他也来了。然而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他踽踽独行,几乎没有人认识他。后来我特地去看他,他带三明治一个人在办公室吃,真令人心酸。余英时跟他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杨联陞的时代,歧视仍然很普遍;到余英时的时代,风气就大变了。当然,他们师徒二人背景、学风不同。陈世骧和赵元任在伯克莱,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李方桂在华盛顿大学听说都过得很好,可是哈佛、耶鲁比较保守,仍然是白人世界,杨联陞一直不能够吐气扬眉。我还见了洪煊莲,记得他没有抽烟斗,因为刚

刚患大伤风，讲话很不清楚。

当年剑桥是藏龙卧虎之地，经济学家邢慕寰跟余英时是老朋友，那时候也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人。他是我们老校长李卓敏的学生，所以李一到中大就把他拉过来做研究院院长。除此之外，还有吴大峻、王浩、张光直等，也都是一时俊彦，我都有机会认识。他们有些在教书，有的还在研究院。

李怀宇：你在哈佛大学生活过得愉快吗？

陈方正：在哈佛那几年，其实我并不很愉快，因为觉得太孤独了。来往的人虽然不少，书也读得可以，可是精神上没有寄托。因为我跟早一辈的留学生不一样，那时的留学生全部都打定主意，学成就要回国，没有人留在美国，留下来工作机会不多，也难融入社会（后来时局大变，他们很多人反而留下，是另外一回事）。我那时候，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凡是去的人都决意要留下来，几乎绝无例外。只有我是打定主意要回来的。所以我的心态、人生观跟别人不一样，现在我还有很多不错的朋友，他们都留在美国搞物理，也就一辈子了。

李怀宇：你怎么一去就有这种想法？

陈方正：不知道。我总觉得做中国人就应该回来做事情。我很坚定，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决定。1997年之前，或者是中英正在谈判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害怕，都要走。有个中学同学问我：“方正，你做好移民的准备了吗？”我说：“没有。我已经给了我的孩子选择的机会，他们去外国之后也没回来。他们有他们的选择。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需

要跑的。”他很吃惊,说:“哎呀,你對自己太不負責任了!”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没错。此外,坦白讲,我也并不那么喜欢美国。当然,美国有非常令人喜爱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学的东西太多了,可是我不觉得那是我的国家。我在那里始终觉得是外人,精神上飘飘荡荡,不痛快。所以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考完以后,立刻就回来了。

要开放,不要搞宗派

李怀宇:1966年你回到香港,“文革”已经爆发,香港的景象如何?

陈方正:我回到香港,“文革”大爆发。到1967年,香港大暴动,遍地“菠萝”——就是左派的土制炸弹,但不知为何,我并不害怕,更没有大难临头之感。到了1980年代还认识了《大公报》和《新晚报》的许多人,像费彝民、罗孚、李侠文、叶中敏等。我回到香港以后很想回大陆看看,可是当时没有可能。到了1973年,忽然听说我们学校有几位资深教师已经回过大陆,好像是世界大变了,我立刻就心动。他们把我介绍给罗孚,我说,我很希望回去看看,请你给我安排。结果中大三十位年轻教师和部分家属在1973年7月回大陆参观了一个月,走过广州、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郑州、洛阳、西安、延安、北京这十一个城市,很兴奋。当时风气未开,我们的女同事穿得很漂亮,到了街上有如稀奇动物般被围观,从鞋子一直看到头发。回来以后,《大公报》要我们写文章,西方传媒也要访问,我们大家统一口径,让我做发言人。我现在重读我当时的讲话,仍然觉得分寸拿捏得不错,并没有“左倾”,不需要后悔,感到脸红。同去的人当中,黄继持本来很

“进步”，但回来以后就不大说话了，他为目击的贫困感到很伤心。

李怀宇：听说余英时先生 1973 年至 1975 年从哈佛大学回到香港中文大学，经历了一个大学改制的风波，那风波澜得多大？

陈方正：风波澜得很大。余先生首当其冲，自然最受伤害。那时我们是初生之犊，没有什么顾虑，认为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余先生不一样，他是新亚书院第一届校友，学术成就也最高，回到母校做院长，大家对他期望殷切，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得照顾。李卓敏校长深谋远虑，以好像不经意的方式把他拉住做所谓“工作小组”的主席。中大本来是邦联制，每一个书院都是一个实体，都是独立法人。要把这个体制改变，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各书院当然都不会轻易同意。香港政府要推动此事，李校长基本上是赞同的，但他认为必须先由大学自己提出一个方案来，经过充分酝酿，才可以进行，这样就成立了工作小组。当时，联合书院院长郑栋材是从香港政府出来的，基本上支持此议；崇基书院院长容启东是前岭南大学的植物学家，他虽然有许多顾虑，但原则上也认为可以考虑，视乎新制度是否合理，是否比旧制优胜来决定。至于新亚，那时候钱穆先生已经走了，大部分在校元老、教师和校外的校董、校友都坚决反对改制，认为这是港府颠覆书院法定地位的阴谋。他们因此对余英时极为不满，明枪暗箭，使他腹背受敌，举步维艰。为此，他付出了极大代价。

李怀宇：这个大学改制对他们利益触动有多大？

陈方正：在我看来，重要的倒不见得是实际利益有什么触动，而

是感情的抵触，是憋了一股气。

李怀宇：听余英时先生说，你在大学改制工作小组里最年轻，而提出的问题最为锋锐。

陈方正：改制小组最主要的人是余英时、邢慕寰、马临。他们三位老成持重，瞻衡大局。跑在前面的年轻人是金耀基、傅元国和我。到了后期，具体的收尾工作确是我们做得比较多。

李怀宇：从历史来看，这次改制对中文大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陈方正：影响很大，因为中大后来的整个格局就是在这次改制中定下来的。我们那个工作小组的真正作用，早已经在李校长计算之中，那就是把全校的神经和注意力调动起来，让大家充分意识到，中大是个整体，并非单单书院的集合，而改制势在必行。小组的报告完成之后，由李校长转交给香港政府，政府立刻委任了一个新的委员会，负责人就是从前的富尔顿勋爵。对于中大以后的制度到底应该怎么样，这委员会另外做了一个和工作小组报告完全不同的建议，香港政府就立刻接受并且付诸实行，这就是中大今天单一大学体制的由来。不过，他们也对成员书院作出了一些让步，所以书院校董会至今仍然是独立法人，虽然权力大大削减，功能也完全改变了。

李怀宇：后来，你是怎么在马临做校长时期任大学秘书长的？

陈方正：马临是1978年做校长的，1979年他提出来，要我替代杨

乃舜做大学秘书长。那时候我对行政兴趣不那么大，本来很不愿意，但他一再坚持，我看在老朋友份上（我一到中大就在联合书院和他同事，那时书院的理学院很小，大家经常见面聚会，前后十几年了），盛情难却，终于觉得也不妨一试，就同意了，结果一下子做了六年。

李怀宇：怎么去当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陈方正：那时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郑德坤已经八十岁，刚刚得了中风，需要有人替代。至于让我来负责，则有个巧合的原因。1984年，我提议把荣誉博士学位颁给巴金，当时大学当局很迟疑，我就把他的《随想录》和《创作回忆录》拿给大家看，使大家认识到他的反省精神。校内同意之后，还得争取国内的支持，幸亏那时候王元化做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他大力支持。新华社的人让我先去找王元化，再去看巴老，最后得到他们的批准。在荣誉学位颁授典礼上，本来是请余光中教授撰写和宣读赞词的，但他后来拒绝了，他说：“秘书长，我要向你告罪，因为这个赞词我不能写。本来写赞词对我无所谓，无论是谁总要称赞，但巴金是文学家，我也是文学家，我对巴金的文学造诣有意见，我不能违心讲他的好话，所以我要告罪了。”话说成这样，我当然就只有尊重他的意思，但那时候典礼已经逼近，仓促间难以另请高明，只好决定自己动手。连所有其他领受荣誉学位者的赞词，我一共写了五份，然后自己翻译成英文，经过了两个多星期的紧张工作才完成。结果很好，大家包括报章舆论都很满意，也有点惊讶。文化研究所的刘殿爵教授说：“秘书长能做这事情，也不容易。”后来马临提名我负责研究所没有人反对，这可能有点关系吧。

李怀宇:1986年到中国文化研究所,现在回忆起来,重要的工作有什么?

陈方正:我到研究所主要做了两桩事情,一是编辑先秦两汉古籍索引,那是和刘殿爵合作的;后来又和饶宗颐合作编出土文献的索引。第二件事情就是出版《二十一世纪》。

李怀宇:先秦两汉古籍与出土文献的索引怎么做起来?

陈方正:刘殿爵向来就很想编一个先秦典籍的索引,但用人手和卡片来做很困难,也做不好,从前很多人做过,做得都不完整,也有很多错误,所以必须用计算机做。我1986年到中国文化研究所,1988年和刘殿爵向香港的“大学资助委员会”申请研究经费,第二年就批准了——那时才刚刚确定资助学术研究的制度,我们的计划是第一批获得批准的。此后十五年里面,我和同事们申请得到的做文献数据库的经费一共大概有一千五百万元港币。先秦两汉所有的传世典籍一共有六十多本书(汉代的大部头历史著作除外,那当时已经有索引了),共九百万字,我们全部做了逐字索引,这些典籍里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根据其中的单字查出来,但《说文解字》的古字太多,太复杂,最后没有做出来。

到1996年,北京的李学勤来演讲,他的一句话触动了我:甲骨文的发现,完全改变了中国人对古代历史的观念,现在竹简帛书的发现,特别是帛书的发现,也要改变我们的历史观念。这样,我就想到传世典籍做完了,就应该开始做出土文献的索引。从那时候起,就和

饶公饶宗颐合作做竹简帛书、甲骨文、金文的数据库和索引。其实，饶公年纪大了，他挂帅总其成，实际工作主要是他的助手沈建华和我们聘请的客座研究员曹锦炎来做。沈是上海博物馆老馆长沈之瑜的女儿，她非常刻苦，非常有冲劲和毅力，能量大极了，真可谓一以当十。没有她，所有这些出土文献计划全都不可能启动。

李怀宇：《二十一世纪》是怎么创办的？

陈方正：1987年我放假去美国，在费正清中心进修。那年4月的一天在中心听演讲，刚好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坐在我旁边，那时候我跟他们还不认识。不知道怎的，他们提到余英时，我就顺便邀请他们那天晚上参加我和余英时的饭局，因为美国的中国学会(AAAS)正在波士顿开年会。那天晚上大家相见，尽欢而散。其后他们回北京，我回香港，开始经常有来往。1989年4月他们到研究所来访问半年，到了年底，金耀基、我和他们两位，一共四人，就决定办一份学术文化杂志，定为双月刊。这本刊物从1990年初开始筹备，当年10月底出版创刊号，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现在已经庆祝过二十周年了。那时耀基兄负责大学行政，很忙，杂志的发展主要由我们其他三人推动，但观涛和我也不管日常事务，负责实际工作的是刘青峰，她是全职编辑。我们几个人办这杂志的理念很一致：首先，要开放，不要搞宗派，各种观点兼容并蓄；第二，强调思想性，以文科为主，但也要推动学术多元化，像科技、艺术、经济、法律等等都要逐步发展；第三，坚持文章的原创性。我们这些想法、做法得到了很多人支持，可以说是得道多助吧。现在中国学界很多名人例如秦晖、金雁、谢泳、许纪霖、崔之元、王绍光等当年都还很年轻，都曾

经在《二十一世纪》发表文章，而渐渐为人注意。我想，我们的确抓住了一个机遇，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李怀宇：《二十一世纪》的经费问题如何解决？

陈方正：开始的时候是东拼西凑，从所里的经费挤出一点，当然也向大学伸手。我们非常感谢高锟校长，他很欣赏我们的理念，也很支持这杂志，为它开了不少方便之门。但在大学，甚至在研究所内部，这自然也要引起不少反应。从1994年到我退休之后两年（我是2002年退休的），整整十年间，每一年我都要写报告，编预算，为这本杂志辩护，争取经费。到2006年，大学又为这本杂志的存废考虑了很久，最后校长刘遵义通知我们两点决定：第一，这个杂志要继续办下去；第二，它的规模、内容不要改动，也就是说，一切照旧。这是个意外惊喜，我想这恐怕和余英时、金耀基、杨振宁等三位元老（他们和刘一样，都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的鼎力支持有关吧。

李怀宇：在中国，一个杂志能办二十年，很不容易。

陈方正：你这句话令我很感慨。英国的《经济学人》从十九世纪中叶办到今天，每周一期，没有停过；美国的《科学美国人》也是十九世纪中叶办到今天——虽然中间经历了许多沧桑变化。此外像《自然》、《科学》这些专业杂志也都是一个半世纪了，而我们中国的杂志办二十年就觉得很难得。

李怀宇：在多灾多难的年代，最辉煌的杂志像《观察》，寿命也不

长。在香港,《明报月刊》从1966年办到现在,实属难得。

陈方正:的确如此。不过,也不要忘记,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等九个留美学生在1914年创办《科学》杂志,几年后把它搬回上海,此后一直出版到1951年,这老《科学》前后有三十多年历史(在1957至1961年间还短暂复刊),而且,它在八十年代中复刊,出版至今又三十多年了,这是所谓新《科学》。这本杂志虽然命途多艰,中断两次,但再过几年也就满百周年了。我们祝它长命百岁,也希望期刊出版能够向它看齐。

“一个传统,两次革命”

李怀宇:《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的源起是什么?

陈方正:2004年,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邀我讲课,前后共作了八讲,讲稿约八万字。三联书店的编辑张艳华也来听课,她劝我把讲稿出版。这样我兴致来了,一下子就写了四年,字数扩充到五十多万,幸亏三联支持我,仍然愿意出版。这本书的核心是批判李约瑟。他说中国的科学向来比西方优胜,只是到文艺复兴时代才被西方赶上和超越,于是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但中国对它也还有巨大贡献。作为一个学物理而且对它的发展有点涉猎的人,我觉得这种说法真是不可思议,因此在1998年写过一篇长文章反驳这个论调。可是,李约瑟做了那么多扎实的考证,写了那么二十多卷大书来证明

中国科技的优胜,因此名满天下,在中国,他的思想更是深入人心,有极大影响力。所以,要让大家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我就得花力气写这本书。

李怀宇:你跟李约瑟本人见过面吗?

陈方正:见过,可是说不上交往。李约瑟在1979年到中文大学来,主讲“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一共三讲,我都去听了,但没有跟他讨论。那时,我对科学史还没有发生兴趣,更谈不上了解,只是听他演讲之后心里老觉得有点不太对头而已。1987年,我在美国听何丙郁(他是李约瑟的后辈、合作者)讲中国数学,觉得很困惑,对他的答案也不满意。当时还有一位钱文源出版了用英文写的《巨大的惯性》,他认为中国科学停顿没有发展是从汉朝开始的,我对此说也将信将疑。回到香港以后,劳思光先生来找我说:“李约瑟的书问题很多,我们应该一道好好地把它整理一下。”那时我仍然没有这个兴趣,对他的这个建议并无反应。1995年,李学勤邀请我到海口去开一个国际汉学会议。当时,我正在教通识课程,是介绍物理天文学的,觉得对中国的天文学也应当提及,就去读中国最早的天文学论著《周髀算经》。这本书条理很清晰,看完以后我写了一篇考证它结构和形成过程的论文到会议上发表。从那时开始,我对科学史发生了兴趣,涉猎渐多,陆陆续续写了几篇东西,慢慢形成一些想法。后来退休了,能够更专心地做这方面的研究,才得以写成这本书。

李怀宇:李约瑟问题在西方影响有多大?

陈方正：并没有很大影响。西方学者对他的实证研究非常尊重，但对他的思想则普遍持批判态度，而且相当严厉。我在这里要强调，所谓“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个误解，因为他对中国和西方科学史本来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看法，只不过是问题的方式引导出这个看法而已，而并不真认为那是需要解答的疑问。所以“李约瑟问题”更应当称为“李约瑟论题”(the Needham thesis)。我这本书的导言和总结都涉及李约瑟论题，可是它的主体，也就是从第一到第十二章，都是讲西方科学发展史。我认为，倘若明白了现代科学到底是怎么发展出来的，李约瑟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在国内，科学史著作虽然有不少，可是比较详细和有系统地论述西方科学史整体的著作似乎还未曾出现。所以我希望这也可以成为一本有用的参考书。

李怀宇：这样说，其实你是由李约瑟论题引发，而写了一本介绍西方科学史的书？

陈方正：是，它的确是李约瑟那个论题引发的，为此我需要解答一个相关的，更有意义的问题，那就是书的副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用“一个传统，两次革命”来概括——这本来也被考虑用作书名。它的意思是：首先，西方科学从古希腊一直到牛顿，中间虽然有长期间断，可是它的理论、问题、方法、人物、师承，却仍然都是从同一个传统中产生出来的。其次，这个传统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大概在公元前 430 年西方科学发生了一场革命。革命的后果是出现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那不只是讲几何学，还讲算术、代数，理论相当艰深。它不是一本教科书，而是数学研究成果的汇编，它的精神在于要求精确的证明。这个古代革命和牛顿的

现代科学革命同样有划时代意义：前者开创了西方的古代科学传统，后者则结束了这个历时两千多年的老传统，同时开创了现代科学的新传统，所以叫做“一个传统，两次革命”。从《几何原本》一直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西方科学有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基于对数学的理解，而并不追求实用，但中国的传统科学则以实用为目标，这是两者的大分别。

李怀宇：从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连人文学者都在探讨中国的科技落后于西方，因而受到列强欺负的问题，李约瑟论题的提出，对中国学者的观点有什么挑战？

陈方正：从1915到1945年大约三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问题是“为何传统中国没有科学？”这是从1915年任鸿隽（他是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之一）在《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开始的，到1945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仍然在问同样的问题。在这其间有许多其他学者写过文章，提出各种不同答案，但李约瑟一来，就把这问题颠覆掉了。他说，你们都错了，中国传统科学丰富得很，好得很，而且比西方更好，可是到文艺复兴时期，却被西方赶过头了，以致到后来，现代科学是在西方而非中国出现。为什么会有这个大逆转呢？那是因为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太巩固，太厉害，它压制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没有被突破；西方的“军事—贵族封建体制”却没有那么坚强，它被突破了，颠覆了，因此资本主义得以在西方兴起，而它的实用精神则成为现代科学出现的关键。换言之，现代科学的出现是以资本主义出现为前提的，而后者是否能够出现，则取决于东西方封建体制的差异。这就是李约瑟论题的核心概念。至于说中国受列强欺负，那

从1840年一直到1945年都是如此，科学不发达当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它并非唯一的，还有其他重要原因。

李怀宇：难道中国近代的体制很阻碍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吗？

陈方正：“科学”意义很笼统，它是个包罗万象的大口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有“科学”，但是它没有转化为现代科学的可能，所以也无所谓“近代体制的阻碍”。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传统中国虽然有各种技术，甚至是很高超的技术，也有对自然的观察、猜测、论述，却没有成套的、以数学来表达论证的、关于自然现象的理论。西方科学传统则不一样。第一，它有高度发达的，以严格论证为核心的数学。第二，它还把这样的数学应用到自然现象的研究上去。中国的数学则不讲究论证，也没有和自然现象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成为它的基础。讲中国传统科学我们总要提到四大发明，可是那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又会提到天文推算的精细，可是那仅仅是为历法服务的，至于天文现象背后的成因，则不受注意；此外，祖冲之父子计算圆周率的精确自然也很令人敬佩，但方法没有传下来，所以没有继续发展。反而最早的《周髀算经》却颇有现代科学精神，它是中国最早也是唯一的数理天文学著作，但很不幸，它的精神后来没有延续下去，这传统就断绝了。这恐怕跟中国人的实用性格有相当密切关系：不实用的东西在传统中国都是不发达的。

李怀宇：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针对电视上为康熙和乾隆歌功颂德的现象，认为在康熙时期，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时机。然而，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这个机

会失去了。康熙在用人上对一些科学家并没有重用,在制造仪器时,只是把所制成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只供皇帝本人使用,而没有用来进行观测;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系统性、理论性不弱的弱点,康熙未予以重视。康熙时期的科学政策是中国同欧洲科技发展拉大差距的起点,此后乾隆时期的统治政策中也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陈方正:徐光启在 1607 年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它的确引起了中国士大夫的兴趣,由是在此后大约一个世纪,掀起了一阵研习西学之风。可是整体来讲,那说不上是中国的科学革命,因为所谓西学,都是传教士传授的,并非在西方最崭新的学说。况且,明清士大夫也并非对那些东西本身真正感兴趣,他们没有深究、发扬西学,反而是用它来附会我们古代的学术,来证明其优越,也就是复古。这种普遍的心态、风气恐怕不是单凭皇帝的旨意、政策所改变得了的。席泽宗院士还有一个看法我不赞同:他认为古希腊科学不那么重要,对现代科学并没有决定性贡献,这个看法他在好几篇文章里提到。这看法和李约瑟的见解大体是一致的。至于中国科学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于西方的问题,这根本无从回答,因为在近代以前,中国科学和西方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情,两者是无可比较的,我这书基本上就是讲这一点。倘若一定要问,我们的科学从什么时候比西方就落后了,我只能够说,从孔老夫子和毕达哥拉斯的时代(公元前 550 年左右)开始,东西方文明就已经南辕北辙,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问谁在科学领域走得更远、更快,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直至近代为止,中国科学和西方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各自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譬如一在海滩上,一在山岭间,两者是无从比较的。

李怀宇：到了现代，中国的科学研究慢慢跟国际接轨，特别是很多人留学后归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

陈方正：1910年以后有很多留学生从外国回来，他们是直接在西方大学学习科学的，从那时开始中国和西方的科学方才接轨，此后就没有什么分别了。所以中国现代科学的起点是1910年，而不是十七世纪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也不是十九世纪的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翻译微积分和许多其他西方数学著作，因为他还是坚持用直排的中文和自创符号，而拒绝使用西方经过长时间发展出来的极其方便的国际通行符号和方程式。所以他的译本也还是不能通行，不能发挥数学的力量。

中国的现代科学传统是像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那一代早期留学生开创的，但中国在解放后高等教育发生了翻江倒海的巨大变化，使得前数十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现代学术传统中断，这是非常可惜的。比起二三十年代的前辈来，我不认为我们这一代的人或者更晚辈的人，聪明才智有所不及，然而从成就来说，却显然相差很远。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学术工作有赖于气氛和传统，倘若没有师友的提携、激发和鼓励，那是很难有大成就的。中国在物理学的当代传统，有很大部分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而激发出来的，而且，众所周知，他们的成就又是和西南联大的培育与激励分不开的。

李怀宇：对学科学的人而言，这些故事的激励很重要吗？

陈方正：对，因为榜样对年轻人太重要了。我在中学阶段对科学

发生兴趣,就跟读科学家传记和科普书籍有很大关系,这应该是大部分科学工作者的共同经验吧。科学有巨大的应用价值,但它还有本身的魅力和意义,那就是以简明的规律解开宇宙万象的奥秘。中国自解放以来很注重科技,最近还提出“科教兴国”的口号,这都不错,都很重要,但也有弊病,就是太强调科学的实际功用,使得它落入单纯的技术层面。其实,科学也跟文学、哲学、历史一样,是一种文化。要深入和全面地发展科学,就必须培植这种文化,使得一般年轻人感受它的熏陶和潜移默化,那样科学才会进入中国人的深层意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李怀宇:陈之藩先生曾经谈到当代学界忽视了科学和人文的结合,科学是科学,人文是人文,讲起来有点痛心疾首的感觉。

陈方正:这是无可奈何之事,科学发展到现在,的确是太深入专门了。我们只能够唤起大家对科学的兴趣,号召科学家多花时间帮助一般人了解科学,也就是尽量消除史诺(C. P. Snow)所谓“两个文化”之间的隔阂。但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科学与人文两者的真正融合,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其实,不但人文学者不可能在专业层面了解科学,反过来也一样。杨振宁是我们《二十一世纪》杂志的编委,他经常参加编委会,而且热烈发言。有一次,他忽然问:“我不明白,什么叫文学史?”大家愣住了,因为他没有可能不知道文学史是什么。原来杂志刊登了一篇文学史理论的文章,他觉得很费解,所以本着“不知为不知”的科学精神来问个明白。其实,在今日,学术上人文和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已经高度发展,各有复杂背景和特殊词语、理论,所以隔行如隔山,互相难以沟通。因此,今日的学者为了专业而钻牛角

尖虽是势所必然，无可厚非，但行有余力，自然还应当尽量去扩充学问相通之处，使它成为人类的共同文化，让所有的人分享。

李怀宇：我常常劝大学者写小书给小孩子看，在自己专业的领域里埋首写巨著固然重要，写写小书，做点普及的工作，也是很需要的。

陈方正：的确如此。我目前这本书重甸甸的，除了搞科学史的朋友，恐怕难以希望有很多读者。所以写些简单的、轻松的、大家都愿意看的小书，也同样是我的心愿。这问题我在十年前讲过。1999年是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在河南安阳开了一个纪念大会。因为我跟饶宗颐、沈建华合作做过建立甲骨文电子数据库的工作，所以得以躬逢其盛。在大会上，我从门外汉的角度讲了下面几句话：埃及象形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和甲骨文一样，都是死文字，可是前两者的通俗入门书籍很多，其中最畅销的在亚马逊书商网络上排名比《战争与和平》和《海明威全集》这些文学作品还高，那么在座的甲骨文专家是否可以多花点时间去写通俗的甲骨文读本，向年轻人宣扬这门学问，引起他们的兴趣，激发他们的热情呢？事实上，在西方几乎所有专门学问都会有通俗作品来为大众作解说，在中国这方面还是比较落后，愿意花工夫做这种普及工作的学者很少，在科学领域如此，在人文领域也有同样问题，这是急需我们注意的。

中国科学的命题是发展原创力

李怀宇：1949年之后，有一大批学人从海外留学归来，对中国的

科学发展影响有多大？

陈方正：中国的科学，无论是 1949 年之前还是之后，靠着海外回来的学者发生作用为多。开头这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是靠着归国的人才，国内训练的人当然也有，但是数量上比较少，质量上也不高。大概从 195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自己训练的科学人才慢慢地发展起来了。这看一些科学家的名字，是很明显的。不过我想，这个势头可能一直到 1960 年代都还很好，在航天、原子能、生化这些方面都有很多著名的科学工作者，做出杰出的成绩。虽然领导的人很多是国外回来的，可是实际上的实干班子，甚至还有很多担负很重要责任的人都是国内训练出来的。这个势头发展很快，但是不幸的是，到了“文革”就打乱了，中断了。

李怀宇：在 1949 年后，科技发展有没有出现过大的断层的现象？

陈方正：我自己的感觉是还没有太大的断层。当然，在 1949 年前后有很多很有才华，而且训练也非常好的科学家到外国去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李政道、杨振宁、陈省身、吴大猷都是在这个时候出去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可是在 1950 年前后，也有不少科学家从国外回来了，所以这个断层比较难讲。1949 年前后，是一个非常的时代，要讲到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作用的话，除了人才的流动以外，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院校调整。院校调整把中国原有的整个高等教育制度完全打乱，用苏联的模式重构，对科学的进展也是一种断层。譬如说苏联专家来了，大家要熟悉新的指导思想跟方向。最近我在《科学文化评论》上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当时苏联在生物学方

面的思想。因为当时是斯大林时代，苏联有很奇特的一个时段，在生物学上的研究有跟世界整体生物学思想完全脱节的、不一样的想法，这个对中国的生物学研究也造成了一些干扰。

李怀宇：六十年里面能不能分出几个时期来回顾呢？

陈方正：很粗略地来讲，以“文革”作分界，从1949年到1969年是二十年，从1979年到现在是三十年，这两节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前面的一节，基本上的思想是希望自力更生，国外回来的专家也还得到一定的任用，可是，最主导的思想是要自力更生，跟外面的交流是很少的。当然当时的成绩也是非常惊人的。那个时段，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飞跃的发展。比如说原子弹、氢气弹、人造卫星都是那个时候出现的，还有大的生物分子的合成都是那个时候做出来的。所以我想，那个时候的气氛跟今天很不一样。那个时候大家都愿意无偿无私地为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才华，对个人的名利、前途、享受，一切都不计较。这在现在看来好像有点难以想象，不过在当时，也不能否认，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中国当时的科学，特别是在苏联撤走了所有的专家以后，到了1960年代能够做出那样的成绩来，也是一个非常惊人、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杨振宁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让中国人觉得他们没有任何地方不如人。我想这是杨振宁先生自己的一种看法了。可是中国人在1960年代能够做到的事情，也应该让中国人自己觉得很自豪。至少从头脑来讲，大家肯定都可以承认，假如有跟西方相同的背景和条件，中国人的头脑是不会输给任何一个民族的。看1960年代开头那九年的成绩就可以知道。

那么到了下一段，从1979年开始，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体现在

中国科学整体发展的面宽了很多,做出新成绩的事情也更多了,而且跟外界的交流也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是另一方面,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人员对个人的考虑、个人的追求也变得比较强。很多人不再会单纯地为了一种理想而留在中国,不再会单纯地为了一种理想而献身于科学研究,没有别的考虑。整个的思想环境也变调了。在这个变动里,从长远来讲也是世界的大势所趋,也不是一个坏的改变,可是如果要在这个改变中让中国仍然能够发挥在科学上的创造力,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李怀宇: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科学发展的新观念,对中国的启发会不会更大一点?

陈方正:在开头一段时间,大概中国全力做的主要是一些实用的事情,这容易见效,都是人家已经走过的路,再去走一遍。当然,虽然大体上知道人家怎么走,你自己去走同样的路,还是得自己去摸索,还得有自己的贡献,这也不是容易的,但是毕竟是人家走过的。现在中国科学的命题,我想应该是怎么样能够在追赶、模仿西方以外,发展自己科学的原创能力和原创科学的应用,就是除了科学以外还有技术上的应用。这比前面一段难多了,相比之下,效率好像不那么容易看见。这是一个新的命题,它的出现是因为科学发展在前面一节的进步,把中国带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在这个新的领域里要再往前,就比从前难多了。

李怀宇:从生活层面上来讲,六十年来科学的发展对老百姓的生活改变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

陈方正：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应该说在前面的一节，中国的科学基本上都是在为重工业、军事工业打基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益处是比较少的。现在的科学跟技术、跟商业、跟经济的关系就非常密切，当然对经济的推动起了很大作用。必须承认，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面，发展势头能够那么好，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甚至是更重要的原因，可是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在“文革”前中国科学的整体基础已经打下了，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地发展就会变得比较容易。从这一点来讲，中国比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印度、整个东南亚、整个南美洲，都是有优胜的。

李怀宇：就目前发展的势头来讲，有这六十年发展的基础，未来中国科学的发展有什么可以展望的新方向？

陈方正：目前还看不出非常明显的方向来。当然中国在有些方面是雄心勃勃的。大家都熟悉的当然就是对太空的探测，可是这基本上跟经济民生的关系不大，是一个国家行为。美国当初的发展也是跟经济民生没有太大关系。可是西方人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无论怎么遥远的事情，只要是一种科学的真理，你去发现它，去把它搞清楚，最后总是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现实的回馈。简单来讲，就是它总是有用处的。到现在，美国太空科学在效益上的扩散，像卫星定位这些东西，大家也比较清楚了。在中国来讲，当然这也不需要我们自己来想了，人家已经走过这条路。中国有很多地方是跟西方竞争很剧烈的。最尖端的东西，可以举出四个例子。第一个是高温超导，假如成功，对世界的改造会是有翻天覆地的，虽然这还是个很遥

远的东西,但是不能说不可能。现在美国、欧洲、日本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中国也在拼命地做。第二个是生物科技,这是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这方面的前途、潜能也是无可限量的。第三个是纳米,所谓超微观的世界,这里面的花样也是多得不得了。第四个是大家不太注意的人工控制的核聚变,因为那个是未来能量的一个可能的东西。现在全世界已经联合起来在法国建造一个很大很新的核聚变发展的仪器,中国也有很大的投资在法国。可是这个东西跟高温超导差不多是一样,看起来非常诱人,能不能做到,也不知道。这两个东西,我想中国跟世界其他的国家没什么分别。至于生物科技和纳米科技,这两个中国恐怕在很多方面还是落后于西方的顶尖的实验室。这个竞争非常剧烈,能不能追上去是很难讲的。

现在的科学发展跟以前很不一样。三十年或者六十年前,科学可以凭少数人,少数人是指几十个科学家,当然那时候也要钱,不过给了钱就可以了。他们自己可以做出一流的成绩来,有惊人的发现,而这个发现是会有无穷的发展潜力和影响。现在,无论是在生物科技或者是纳米科技,科技的发展本身已经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变成社会整体的一部分,需要的资源不单只是科学家、技术人员,还有各种不同的物质的整合,以及一个科学体制的贡献。这些东西是关乎到整个社会的,而中国在这方面当然也是更落后。这一点,是没办法的,因为现代科学在西方出现是三百多年以前的事情,现代科学真正在中国生根到现在大概还不到一百年,1910年左右才刚刚开始有第一批中国科学家从西方学了真正的现代科学回来教书。中国科学的起飞恐怕要从新中国1950年代算起。比如说从1910年到1950年这段时间,虽然有几所很好的学校,也有一些一流的人才,可是对社会

的影响太小了，不成比例。科学成为一个全国的体制，大肆发展起来，恐怕要从1950年代算起。可是1950年代以后又来了“文革”，又打断了一下，所以1950年代到现在虽然说是六十年，但是我想应该把“文革”干扰排除出去，或许最多四十年的时间吧。那么四十年时间的科学发展跟西方两千多年的一个大传统，跟他们从牛顿到现在三百年的蓬勃发展比起来，最少只是人家的十分之一。所以，要有一个全社会的体制跟人家在科学上竞争，是非常困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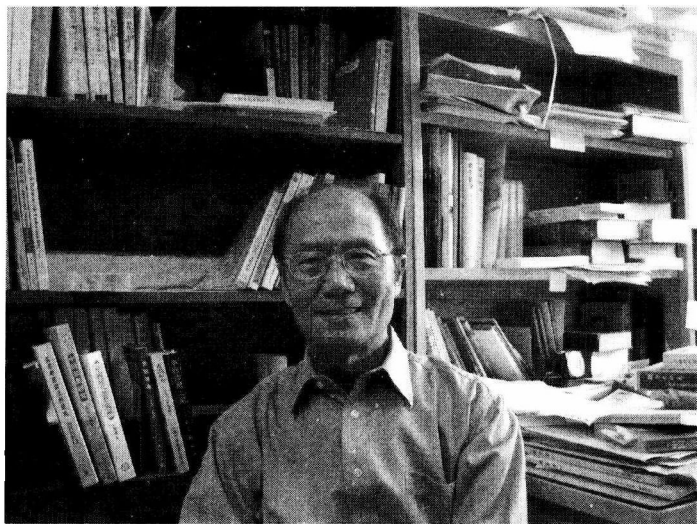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看日本现在科学发展非常好，非常快。当然它的起步也很晚，它学西方科学大概也应该从1870年算起，到今天大概也就是一百四十年。可是重要的是，在这一百四十年里面它没停过，一直是很稳定地前行，包括二战时期以及二战之后，它的体制没有像中国经过那么多的动乱，被打乱了。所以，日本今天在科学上比中国要发展得好，虽然它的人比中国少，力量可能差一点，可是它的水平很高。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对中国的科学家得诺贝尔奖的情结很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很自然”有两个意思，第一是大家有这个情结很自然，第二是中国的科学跟西方甚至跟日本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使得大家有这个情结，那也是很自然，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起步太晚。

李怀宇：讲到底，科学的发展还是要长久的太平时代，没有那么多动荡才能够发展得更持续，更好一点？

陈方正：这也是时代使然。比如说在西方十七世纪以前来讲，第一，科学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用处，第二，它绝对是极少数人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一个国家只要出了一两个天才，因为很偶然的因素他对科学发生兴趣了，他就可以立刻跃居当时世界的前列。可是现

在时代已经完全改变了,现在的科学绝对不是一两个天才的事情,它是跟社会体制、经济体制都有密切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时间就变成一个不能轻易跳过的东西了。因为别的一些东西,中国可以集中力量来跳过,可是现在尖端科学的发展,别的国家也是集举国之力来做的,所以要超越就不是那么容易。同时,中国现在整个国家的科学体制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也不是最好的状况,所以要赶上去,不但是要资源,要努力,要宣传,体制本身也还需要相当多的改革。

刘笑敢：从庄子研究到文明反思



刘笑敢:1947 年生于河南,在天津读中小学,1968 年到内蒙古插队落户,1973 年入读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 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张岱年读研究生,1985 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讲师,副教授。1988 年赴美国,先后于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宗教系,哈佛燕京学社任访问学者、讲师、研究员。1993 年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高级讲师、副教授,2001 年起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后出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代表作包括:《庄子哲学及其演变》、《老子——年代新考及思想新论》、《两极化与分寸感》、《庄子与沙特》、《老子古今》、《诠释与定向》, *Classifying the Zhuangzi Chapters*, *Oriental Issues in Textual Interpretation*, 以及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集刊。

2010年深秋,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研究室,刘笑敢先生笑谈自己治学的心得,时带独特的哲学思考。二十余年前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要再版,刘笑敢应出版社之约写学术自述,不免感慨:“知识的海洋无垠,思想的天空无涯,一叶漂浮,何可奢望?然天高海阔,又怎不神往?”

刘笑敢在天津读中小学,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落户,1973年,趁邓小平复出之机,入读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成了工农兵学员。1978年,刘笑敢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张岱年,这位恩师留给刘笑敢的印象是“厚道、严谨、善良、直率”。当时年逾七十的张岱年迎来了第二个学术春天,但已经没有精力再写比较详细的论证文章了,有人开玩笑,张岱年晚年的文章是“大纲体”。刘笑敢说:“张先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哲学这个学科几十年中走过的曲折道路,他二十八岁完成《中国哲学大纲》,中间出版计划多次都因战乱或社会动荡而功败垂成,一直到七十多岁,这本书才正式出版。因为社会、政治动荡,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安心地在书房里研究学问一二十年,这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悲剧缩影。”

从中文系考到哲学系,刘笑敢自称是一张白纸。他对文学性较强的东西感兴趣,觉得《庄子》的思想吸引人,写博士论文时决定研究庄子哲学。1985年,刘笑敢获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他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出版后,影响远及海外学术界。余英时先生曾说:“笑敢早年进入中

国古代哲学史的领域,曾受到十分严格的专业训练,在哲学思考之外,他掌握了有关古代文本的一切辅助知识,如训诂、断代、校勘之类,这是清代以来所谓‘考证’的传统。他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便充分表现了由‘考证’通向‘义理’的长处,但是笑敢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专治老庄,并不是仅仅为了还原古代思想家的客观原貌,而是由于深信道家哲学在现代世界仍有重大的指引功能。”(《老子古今·序》)

1988年,刘笑敢赴美国访学,期间认识了孟旦(Donald J. Munro)、余英时、杜维明、林毓生、张灏、傅伟勋、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唐德刚等学者。他说:“我受他们的启迪,但我很少直接引用他们的东西,我重视的是一种方法的启示,一种精神的启迪。”有一次,史华慈请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刘笑敢到他家吃饭,席间两位美国教授不断批评美国社会中不公平的问题,刘笑敢脱口而出:“你们这样批评资本主义,是否赞成社会主义呢?”两人立刻异口同声地喊:“No Way!”这使刘笑敢当场顿悟,意识到一不小心,头脑中的两极化的价值立场就会不假思考地冒出来,看不到真实世界的复杂和生动,这也促成他完成《两极化与分寸感》一书。后来,受傅伟勋之约,刘笑敢开始潜心研究《老子》。

1993年,刘笑敢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2001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后出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由于长期在高校任教,刘笑敢对当今大学追求量化目标的“病毒”深有反思,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思考这个问题,这样可以形成一种“刹车机制”,减低大学盲目追求量化目标的疯狂速度。他认为,这种思考正是老庄思想所体现的文明反思的传统。

在香港,刘笑敢的生活基本上是家里、办公室、教室“三点一线”。他笑道:“因为我在本地没有亲属,没有同乡,没有同学,没有老师,所以生活比较安静,好像比其他同事多了一点思考和写作的时间。”

二十年前的时代烙印

李怀宇：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张岱年先生对你有什么样的学术影响？

刘笑敢：张岱年先生对我的最大影响是做人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机会正式学习，一有了机会，大家都憋足了劲，想好好学，自觉性很高。我们年龄都比较大，自制力比较强，做什么题目，怎么做，张岱年先生很开放。我们写完一章或一篇文章，都会先给他看，他会批阅。我觉得张岱年先生指导的方法就像一个导演。导演是不教演员怎么演戏的，张艺谋是不会教巩俐怎么演秋菊，或者怎么演菊豆的，而是让巩俐自己演，根据剧本自己发挥，不好再来。当时有一些时髦的东西，像系统论、控制论，有一个老师就说：“笑敢，你用系统论、控制论来研究《庄子》试试。”我跟张先生谈，张先生一口否决，说那条路不能走。在具体结论方面，张先生反倒是比较开放的。比如，我对庄子年代的考证，跟他的观点有些不一样。他从来没有为难或质疑过我。张先生的文风非常简洁，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李怀宇：二十几年后重新看《庄子哲学及其演变》，有没有那个时代的烙印？

刘笑敢：当然有啦。比如说要讨论庄子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

观唯心主义,这是时代的烙印。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庄子是不可知主义,或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有人把他和嬉皮士、存在主义联系起来,所以我就去研究存在主义,去看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主义、怀疑主义、古希腊的怀疑派、存在主义的萨特,以及休谟、贝克莱等等。我不是从哲学系念上来的,那些基础的东西是我进了研究生阶段回过头去看的,就是急用先学。当时流行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概念和西方原本的意思是相反的。关锋说,你看《逍遥游》,游乎四海之外,无极之野,极大地夸张了主观精神的功能,这不是主观唯心主义吗?但主观唯心主义在西方的本意是怀疑人的认识能力,限制人的认识能力。我们人没有能力感觉和认识经验以外的世界,比如说我认识你是通过眼睛看,耳朵听,但是在眼睛能看,耳朵能听,鼻子能闻,用手能摸得到的以外还有什么?有两种回答,一种是不知道有没有,一种是知道有,但无法认识那个彼岸世界。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或者是不可知论。这和庄子思想显然不同。当时冯友兰也讲庄子是主观唯心主义,我感到很奇怪,我就去问冯先生,他说:“照你这样讲,庄子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王阳明也不是主观唯心主义,中国没有主观唯心主义。”我从主观唯心主义概念的来源出发,认识到当时讲的主观唯心主义,不是西方哲学的概念,也不是我们自创的术语,而是望文生义的误解的产物。

李怀宇:晚清以来,中国在引进西方观念时常常有望文生义的误会。

刘笑敢:望文生义、人云亦云的情况很多。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缺少专心、专门、专精的学术研究,都是拿来就用,不问就里。比如,

我们现在都说封建主义如何，要反秦始皇以来的封建。反封建的口号是陈独秀从日本搬回来的。日本是真的反封建，因为明治维新以前，权力分散在各地将军幕府那里，那真的是分封制或封建制，天皇要把权力收回来，所以要反封建。陈独秀照搬日本的反封建，到中国来反封建，但他所针对的所谓中国的封建跟欧洲、日本的封邦建国，都是相反的。欧洲中世纪是封建制，有很多诸侯城邦，而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主要是皇权，是集权制，不是封建制。我们在很多基本常识、基本概念上闹笑话，不求甚解。这一点我很不满意。你可以改造古代的、西方的概念，但不能不求甚解地大发议论。当年我研究《庄子》的时候，就发现用那些西方概念来讲庄子不合适，我就对这些概念辨源流，求本义，做澄清，对流行的方法提出反思或质疑。我并不完全否定借鉴西方哲学的方法和精神，关键是要反思，要有自觉意识。这次再版我的书时，我突然意识到，前几年提出的“反向格义”的说法在二十多年前就埋下了种子。

李怀宇：当年研究庄子的时候，有没有在里面投注你对现实世界的关怀？

刘笑敢：二十多年前我写博士论文，知道那是学术研究，不可能发表自己的现实感受。但我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国家、对民族含有一种关切，但是这种关切不能变成影射史学。对古代思想的理解没有一个客观的唯一的必然结论，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客观地研究它，这是做学术研究的基本路向。你要借庄子思想建立自己对二十一世纪华人社会，或者对人类社会的有意义的一种理论，当然可以，但是这和狭义的学术研究不是

一回事,不要混起来。我把这叫做诠释和研究的两种定向,《诠释与定向》讨论的就是这些问题。如果我想为二十一世纪的华人社会提出一个有价值的精神指向,为什么非得局限在《庄子》里面呢?我讲过一个“道家与现代人生”的课,一个学生就建议我写一本书讲道家的生态学理论,但如果我关心的是生态问题,为什么要把自己限制在道家里面?我关心生态就关心生态,儒、释、道,生态科学,或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都可以用,既然目的是为现代社会服务,为什么要把自己限制于某一本古代经典或某个学派里?我近几年就强调要提高学术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标准的自觉性,避免将现实关怀与纯学术研究混为一谈。

于丹与文化普及的功过

李怀宇:在北大的时候,你怎么看陈鼓应先生的老庄研究?

刘笑敢:他参加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也给我的书写了序言。我现在教《庄子》和《老子》还是推荐他的书。我的路数跟他接近,但不完全一样。前两年在北大开中印学者对话研讨会,杜维明组织的,我讲到老子的自然有总体的关怀,不是个体的自然,他就不赞成,他说王弼讲自然就是个体自然。王弼是这样讲的,但是在王弼之前没有人这样讲,而且老子那个时代并没有自然本性这种概念。就像有人通过朱熹的《四书集注》看《论语》,就认为朱熹讲的就是《论语》,讲得都好。其实他看到的是朱熹讲的《论语》,不是历史上的《论语》。我研究《老子》,就尽可能先不看王弼注,而是直接去看《老子》,所以看到的

《老子》就跟牟宗三等人通过王弼所看到的《老子》很不一样。

李怀宇：近年讲《庄子》，最有名的要算于丹了，你有没有看过她的东西？

刘笑敢：翻过。她说她讲的是她的心得，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用过“诠释”的说法。在我看来，“诠释”是比较严肃的字眼。她讲心得，那就没话说啦。她很聪明，说我只泡温泉，对我健康有好处就可以了，我读《庄子》，对我自己的生命有好处就可以了。对于《庄子》这温泉的水质含的是一种什么化学成分，她不做研究。是她自己的心得，别人就不必多说什么了。她从中得到启示，别人听了她的演讲也觉得很好，觉得《庄子》很好，那她就很成功了，有功劳了。她对于普及《庄子》是有贡献的。不过，这里面会有一种误导，因为她是北师大的教授，在中央台讲庄子，会让人误会这就是《庄子》专家所讲的《庄子》。这种误会不一定是于丹本人的过错。据说“百家讲坛”是给初中以上文化的人听的，这影响太大了，听众也许对学术研究和普及性演讲的区别没有概念。我觉得于丹的讲法就像传统社会大树底下老爷爷老奶奶给小孩子讲故事一样，那是一种文化传承，是必要的，对小孩有好处的。小孩在村里听的故事有几句是可靠的？他们说的三国有几句是符合《三国志》历史记载的？没有，随便讲，大家听得高兴：哦，有个《三国志》，哦，有个《红楼梦》，哦，有个《庄子》。小时候听过，长大就会有兴趣去接触了，这就是文化传承。文化传承是复杂的，不能要求社会里的文化传承都达到学术研究的境地。问题在于，我们华人社会现代学术制度尚未健全，什么是严肃的学术研究，什么是普通的学术推广，什么是通俗文化，似乎没有分工。媒体也缺少明确的分工，办社

会科学杂志,都想扩大发行量,都想有更多的读者,迁就读者数量,迁就现实需要,这样的学术水准就很难把握了。在美国,纯学术就是纯学术,全世界有五个内行认为你好,你就是好的了,不需要有很多人看,不需要发行量很大。我们往往把通俗读物的标准和纯学术的标准混在一起。好像这本书卖得多,就说明这人的学术水平高,这完全是两码事。

李怀宇:据说于丹讲《庄子》的书发行量已经达到几百万册以上了。

刘笑敢:这是个好现象,有更多人关心古代学术经典了。可是另一方面,如果把于丹的讲法误以为是庄子思想的研究成果,甚至把它当成最好的研究,那就很可怜了。当然这不一定是于丹本人的错误。我想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大概也是好意,就是做一点文化普及工作,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尴尬的地方:学术标准和普及效果如何兼顾?有一些就是用讲评书的形式讲学术课题,普及有贡献,代价是误导。

李怀宇:公众一般称之为“学术说书人”。

刘笑敢:对啊,人们的脑子里对学术活动和文化普及工作缺少分工意识。据说有人去问陈鼓应先生:对于丹怎么看?陈鼓应说有人做科学研究,有人做科普,于丹是科普,普及文化还是有贡献的。不同的是科普不能乱说。水在零度是什么密度,大气压多少下水的沸点是多少,这不能乱说的。可是人文的普及,就要加上自己的感悟、

自己的体会,有很多不准确的或者是即兴发挥的东西,似乎允许“乱说”,认真的和不认真的难以区分,所以跟科普还是不一样的。科普是比较确切的科学知识,人文的普及不是确切的知识,给你一点感悟,给你一点思考的空间吧,还是不一样的。

对西方的借鉴与盲从

李怀宇:到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访学,对你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新的影响?

刘笑敢:影响很多,一言难尽。其中之一是在美国的经历加深了我对中国哲学研究之困难的理解。我在哈佛主要是在哈佛燕京学社,和东亚系在一起,我去的时候,韩南是社长,后来杜维明当社长,跟我联系比较多。我跟哈佛的学者交流,向他们请教,一直在思考怎么研究中国哲学:要有新意,又不能胡说八道。有人故意标新立异,借一个其他的理论,往上一套,新的东西就出来了,或者根据现实感受重新解释古代经典,好像很简单,很实用,但不够严肃,根据不足,论证不足。受东亚系的影响,我更重视文本,重视历史,重视学术的严谨。杜维明跟宗教系比较密切,我受他的影响,也感到中国的“孔孟老庄”,又像哲学,又不像哲学,又像宗教,又不是宗教。所以我后来讲“反向格意”的困难之处:把孔孟老庄定义为宗教,很多人不赞成,把它定义为哲学,又有很多人不同意。可是在美国,哲学系讲孔孟老庄,宗教系也讲孔孟老庄,东亚系也会讲,历史系也可能讲,甚至政治系都有可能讲。可是只有一个孔孟老庄啊,当然我可以从不同的角

度来看,但是我更希望看到孔孟老庄真实的全貌。也许我做不到,但这个愿望是很正常的,不能放弃。这就要突破一些传统的权威注释的藩篱,就庄子看庄子,就老子看老子,就孟子看孟子。当然,从根本上来讲这是有困难的,因为我们的脑子在二十世纪已经被洗过了,跟孔孟老庄不一样了,已经是二十世纪人的经验、概念和方法了,所以不可能真的回到孔孟老庄那个地方。但是有这个意识和没这个意识还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觉得反正回不去了,就乱讲吧,怎么讲都可以,反正没有绝对的客观标准嘛,这样一来,就没有严肃的学术研究了,也不会有严肃的理论创造了。

李怀宇:现在西方学术界是怎么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

刘笑敢:西方很复杂,有东亚系的研究,有宗教系的研究,有历史系的研究,也有哲学系的研究。随便举例,密西根大学有一位 Donald J. Munro, 中文名叫孟旦,一方面是英文姓名的谐音,一方面取自孟子和周公旦。他提出一个观点是我们中国人都没有注意的。他说中国人有一种天生平等的观念。人生下来是平等的,人的自然本性是平等的,所以人人可以为尧舜,人人可以成佛,人人可以成仙,这就是假定每个人生来是平等的,可是后来为什么不平等呢?因为后来的道德行为、后来的努力不一样了,所以他说中国人有先天平等的观念,或者是描述意义上的平等,而不是价值意义上的平等,这是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但是仔细想一下,他是对的。他做得很扎实。可能现在有人觉得这种做法太老,实际上他的做法现在很难学了。现在是急于成名,急于发表文章,下不了这个功夫:要先把语言关、文献关过了,再来讨论哲学问题。很多人从西方哲学的眼光、命题出发,

在中国哲学找一些相关的材料，也有的是从中国哲学中拿出几个字，做一些很新的讨论，是我们中国人完全想不到的一些讨论。有一些很有新意，很有启发，对这些不同的研究，我会看它的积极意义何在，不会首先挑它的毛病。这个世界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太多了，方法往往不同，但是对这些不同的路子，不同的做法之间缺少比较，缺少研究，我觉得不同的做法都有它的价值，但是不代表都有同等的价值，有的可能有现实意义，没有学术价值，有的是有学术价值而没有现实意义，两者都有就非常难了。

我觉得中国哲学严格来说不是一个学科，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尚未成熟。就如“国学”还不像一个学科一样，像是一种领域。除了学术含义，中国哲学还代表民族文化和生命导师的功能。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大学开始有文科系了，开始有人主张不要哲学系，但是后来蔡元培说必须要有哲学，这个哲学是从西方哲学搬过来的，最有影响的就是胡适、冯友兰，都是借助西方的哲学眼光来看中国的孔孟老庄，借助西方的哲学概念、理论框架，来重新整理中国的儒释道，那就叫中国哲学了。可是这个做法是不是最好的做法？还有没有其他做法？不同做法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学科主流应该是怎么样的？是探究中国的古代为主，还是以建构二十一世纪新的哲学理论为主呢？如何处理传统的儒释道的价值引导的功能与学术研究的区别？各有什么方法、标准、目标？这没人讨论。什么观点都有人讲，但是缺少认真的直接的讨论。现在学术界是各讲各的话，反正发表论文，在年终统计的时候有多少篇论文统计出来就行了，至于这些论文有几个人看，看了之后有没有影响，就没有人管了。所以，我的比喻是：现在写学术论文就是在放气球，写一篇论文就是放一个气球上天了，有几个人看见？在哪破了？没有人关心。我们受西方影响很大，西方哲

学的确有很多值得引进、借鉴和学习的东西,但是不能事事以西方为标准,不注意中国哲学这个领域、这个学科的特殊性,就会陷入照搬西方概念或理论框架的盲目性。

现实关怀与文明反思

李怀宇:在二十一世纪,中国还有可能产生哲学家吗?

刘笑敢:不容易。不光是哲学家不容易,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什么家都不容易了。太浮躁了,太急功近利了。比如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太太在一个电脑科学研究所,刚成立的时候,要建成什么国际级的,投了很多钱,开始一年两次国际评审,为了迎接这个评审要提前一两个月做准备,评审团来了,大家应付这个评审团两个星期。评审团走了,大家讨论如何落实评审团的意见,又一两个月。没两个月,新的评审又来了。过了几年,政府觉得这好像对本地工业贡献不大,要重新合并、组建、改造,这么折腾十几年,改了几次名,重新整顿了好几次,楼房又改建几次,谁还能潜心研究啊?学术研究是要潜心、专心、安心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做下去,可能有些路子不出成果,可能有些路子出意外的成果,现在的评审和经费拨款的制度,等于说还没有做就要保证效果,而且要快速效果,那还有潜心严肃的研究吗?所以,出什么家都难了,教育家也没有了。大学校长都变成行政官员了,服从教育部的安排,他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吗?他的理念能坚持,能贯彻吗?

这种体制有中国的具体情况,也有整个大的国际背景,现在亚洲

似乎跟国际形势跟得很紧。比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都有自己深厚的传统,但我们学的不是他们的传统,我们学的是最时髦的管理方法,可是这些方法不是他们的主要优点。我把它叫做一种病毒,就是无止境地追求量化指标,经费数量、学生数量、博士数量、论文数量、得奖数量,越来越表面化、功利化。这种病毒是从西方来的,但是西方人自身抵抗力强,他们的很多大学有二三三百四百年历史,比国家的历史还久,政府不干涉,捐款人不干涉,能发展保留各自的特色和传统,所以它有抵抗力,生病较慢,较轻。我在新加坡、中国大陆待过,在中国香港也待过,也去过中国台湾,也在马来西亚访问、兼职,我看亚洲地区的大学发展都属于政府行为,都急于在十年二十年里赶上世界一流大学,提高名次,重视的是表面的数据,深层的东西看不到,不想学,学不了。现在学术腐败那么多,当然有那些学者个人的道德问题,可是,人是在大环境中生存的,大的环境可以培养越来越多有道德的人,大环境也可以腐蚀人的道德。造成这种环境的主要原因,我就姑且叫做资本主义的量化管理模式,他们叫科学的管理,其实是量化的管理,追求数字目标,“目中无人”,就看数字化的成果,就看效益,经济效益、名次和知名度(visibility)。现在大学也走上产业化的路子,重短期的、可见的、显著的效益,哪还能安心培养学生,培养学者?教授现在是教育流水线上的工人,学生进来,就好像一个空罐子进来了,这个教授往里面放苹果,那个教授往里面放梨,那个教授往里面放橘子,那个教授往里面加糖水,最后注色素,封口,注册,出厂,没有保修期。教育变成工业化、产业化,这不是教人,而是贩卖知识,追求有形和无形的收益。哈佛大学的哈佛学院的 Harry R. Lewis 当了八年院长,退下来以后写了一本书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就是“没有灵魂的杰出”,或者没有灵魂的优越、卓越。他说他

在哈佛三十年没有听到过教授一起讨论怎么帮助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成长为二十三四岁的成年人。大学变成了储藏、传播、创造知识的地方,不再是培养人的地方。他说重要的是大学忘了什么是教育,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edu”变成了“. com”,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但是亚洲地区感染病毒最快,最严重。

当然,我不是说量化管理一无是处。黄仁宇就特别强调“数目字管理”,说中国传统社会落后就是因为不懂资本主义的“数目字管理”。但是,凡事都有限度,有范围,过分就是灾难。江水、河水、湖水都很好,洪水泛滥就不好了。现在是把数字指标当成最高目标或唯一目标,忽略了更基本、更重要的东西,因此有益的指标变成了危害基本健康的病毒。

李怀宇:研究了几十年老庄,你认为老庄思想在今天还有启示意义吗?

刘笑敢:有。尤其是针对现在这种量化管理、急功近利的风气。随便举例,就像老子讲“辅万物之自然”,这个“辅”字大有学问,既不是强迫命令、干涉控制,也不是宠溺庇护、越俎代庖,更不是放任自流、不负责任,而是为万物提供自然发展的条件和环境。领导人这样辅万物、辅百姓、辅社区、辅企业、辅学校、辅学生、辅老师不是很好吗?“万物”的说法也颇有讲究。万物是群体中的个体,个体构成的群体,既非抽象的、抹杀个体灵性的集体,亦非原子式的、孤立的个体。现在西方针对自由主义的弊端而出现了社群主义。社群主义强调社区的共同利益。传统的西方自由主义片面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力和尊严,这当然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社会变成孤立的个体人的构

成，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冷漠。“万物”不是单纯的个体，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体，又不是集体主义、专制主义讲的抽象的集体，好像说大家都是朝廷的子民，没有独立的人格。“万物”的概念是不分对错亲疏的。当然这里有我的解释，有我的发挥，但这是从原文读出来的，是对原文基本精神的把握，在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发展、应用、引申。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我还有意地把万物重新解释成一切生存个体。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公司、一个社区、一个城市，都是生存个体，一切生存个体构成了万物。如果万物是一切生存个体，圣人辅万物之自然就是现代最理想的领导方式，即辅个人、辅家庭、辅学校、辅公司、辅社区，不强制、不包办、不任意。我特别强调老子的“圣人”不是统治者，他是理想统治者的楷模，他只是一个理想统治者的化身。所以，这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就是辅万物之自然。如果我是一个市长，那一切学校、报社、公司、工厂、家庭、社区，不管亲疏远近，我都应该以“辅”的态度、“辅”的方式来领导，既不是不负责任不管，也不是包办代替，更不是强迫命令，而且是不分偏私的辅，创造万物自然发展的空间。这似乎很难实现，但我们可以从小处做起，从一个家庭、一个班级、一个小学校做起，直到一个大公司、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如果多数人都理解和接受这种理想，那么在特定范围内实现老子的理想是可能的，至少是值得尝试的。我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怀也是继承了老庄思想的精髓，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忧虑、一种反思。

梁其姿：历史研究要关注弱势群体



(摄影：林津鹭)

梁其姿：1953 年生于香港，1975 年获香港大学历史系学士，后获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历史硕士、博士。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访问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现任香港大学讲座教授暨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其研究专长是明清社会史和近世社会文化史。著有《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中国麻风病史》等。

梁其姿教授是陈方正先生的外甥女。见梁教授之前，陈方正先生在电话里专门向我介绍：梁其姿喜欢运动、看鸟、喝红酒。见面一谈，顿觉梁其姿谈吐与众不同，研究的角度也与主流史学界大异其趣。当天中午，陈方正先生过来和我们共进午餐，话题随意，才知梁其姿在学术以外的阅读广阔，谈陈冠中的《盛世》视角独特，学界趣事更让人耳目一新。

梁其姿是地道的香港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对文史感兴趣，后入读香港大学历史系。虽然教学语言是英语，梁其姿的主要兴趣是中国近代史。梁其姿回忆：“当年的香港大学有点类似于培养高级公务员的机构，需要多重考试才能进去，但是学术或研究气氛不浓。进大学前，我期待有不同的思想刺激，但进去以后有点失望，我觉得基本上是中学教学的延续，历史教学也相当传统，所以学习的兴趣并不太浓，而我当时读到的法国史学著作很有意思，当中能看到活生生的‘人’。这也是我出国的原因之一。”梁其姿在高中时开始念法文，1975年大学毕业后，她考取了法国政府奖学金，赴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留学，1980年底获得博士学位。

梁其姿师从毕仰高(Lucien Bianco)，博士论文写战前解放区的合作运动。当时很多关于的解放区资料还没有出版，梁其姿通过朋友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找到一些未曾公开的资料。完成论文后，梁其姿又在巴黎待了两年，这时学术兴趣才转向中国明清史。

在巴黎,梁其姿度过了一生难忘的时光。“1968年,巴黎有学生运动,这是一个很浪漫的事件,多少有点法国大革命的调子。我去的时候,那种左派的气氛还在。譬如教育改革增加了几十块的注册费,或是课程改革,大学生都会按照学生运动的传统跑上街头抗议,看见警察就挑衅一下。我也会凑凑热闹,其实大家都有一种嘉年华的心情。”梁其姿到了巴黎没多久,就和几个法国学生合租公寓,社交圈非常丰富,跟搞绘画、音乐的人联谊,时常到卢浮宫等博物馆。虽然学生比较清苦,梁其姿也到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地游历。

在法国学成之后,梁其姿没有回到香港,而是到了台湾。当时梁其姿的父亲住在台湾,到巴黎游玩的朋友告诉她关于“中央研究院”的情况,可以只做研究不用教书。时值“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在台湾推动“国家科学委员会”五年计划,吸收国外读书的华人,于是梁其姿选择到了“中央研究院”工作。梁其姿研究明清时期的医疗资源、医学传承、方土与疾病观、女医等问题,在中英文权威医疗期刊与专书中发表重要论文,是当今研究中国医疗史必读之作。1987年,梁其姿推出两篇疾病医疗社会史方面的论文:《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和《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被誉为中国史学界涉足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先行者。2009年出版的《中国麻风病史》(*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一书,开创了英文著作从单一疾病研究中国医疗社会史的先河。

2008年,梁其姿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讲座教授,现任香港大学讲座教授暨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教学上,梁其姿为本科生讲授明清社会史,为研究生指导明清的卫生医疗研究。梁其姿说:“现在香港所有的大学都在和国际上的大学竞争,老师的研究和教学质量都受到重视的。相比之下,以前的大学教学没有受到太多挑战,如果没有竞争,一般的老师就不去研究新的事物,也就不太可能刺激新认识。所以,现在的老师必须战战兢兢地教学和做一些研究,这对学生是好事,至于学生能接受多少,那就得看个人。”对比三地学生的程度,梁其姿分析:“香港的本科学生和我在台湾的学生不太一样,台湾的学

生比较愿意主动来探讨问题。大陆和台湾的学生比较相似，人和人之间私底的交流要多些，而香港的学生比较务实，这可能是跟香港的生活节奏比较快有关吧。”

历史应该是各个社会科学的综合

李怀宇：你到法国留学时的主要学术兴趣是什么？

梁其姿：我留法时的主要兴趣是中国的近代史。因为此前在香港大学念历史系是属于比较传统的政治史、事件史，在我拿到奖学金要去留法的时候，读到了一位法国教授毕仰高写的《中国革命的起源 1915—1949》，主要是从社会史角度来写 1949 年前的革命。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学者从社会史角度来分析革命的产生，看完以后就认定要他做我的导师，所以我的研究的兴趣也就放在 1949 年之前的革命史。我也跟几位法国有影响的教授进行了交流，在和毕仰高老师写完论文之后才转到明清史的研究。年鉴学派的吕西安·费弗尔 (Lucien Febvre) 认为，历史应该是各个社会科学的综合，不是纯粹的政治史、事件史、战争史。基于年鉴学派对我的影响，我当时觉得从社会史角度来写 1949 年前后这段历史会比较困难，就回到中国明清史的研究。

李怀宇：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工作后，你怎么研究起医疗社会史？

梁其姿：在离开法国之前，我与菲利普·阿雷兹(Philippe Aries)老师一起研究心态历史，他的课主要是西方人面对死亡态度转变的问题。他给我最深刻的影响就是对人的生老病死的关注，我们在课堂上几乎都是围绕这个话题，当时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少有人注意。所以，我到台湾后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很多明清时期的方志资料，从明清的育婴堂到安葬死人的机构资料搜集，于是就试着去做这方面的历史研究。

我写完《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一书之后，就发现明清时的医疗机构的诸多问题，大概在十六世纪以后，中国南方的省份就出现收容麻风病人的机构。基于这样的兴趣，我就写了《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中间写了很多关于医疗、社会方面的论文。

李怀宇：当年的育婴堂算是中国的慈善机构吗？

梁其姿：当然。在古代中国，没有很有效的避孕方法，堕胎也是非常危险的手术，所以很多穷人对多生了的小孩要么选择遗弃要么选择溺死，算是控制人口的一种方式。但对传统道德很看重的官方来说，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所以就出现收容被遗弃婴儿的机构，这种机构多半是士人和地方官员捐钱来创办的。

在中国，以前处理社会问题的角色一个就是政府，另一个就是家族，没有别的。我在研究中，发现出钱出力最多的还不是官员，是靠地方力量来支持的，但我研究发现，中国社会问题往往是由民间处理的，并不完全是靠政府、家族上层精英来处理。譬如明末育婴堂更多是一些知识领袖来倡导，由小部分生员或有钱的商人捐钱来建立，过去很多人都忽略这方面的问题。

李怀宇：这种传统后来还有延续吗？

梁其姿：有，特别是太平天国之后。因为当时清政府没有太多力量，全靠地方或家族来进行善后处理也不太可能，而在大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武汉，很多社会的管理问题都是善堂进行处理的。我现在研究的兴趣就在这方面，特别是同治以后的广州善堂和医疗活动。香港有个东华医院，那是同治以后建立的，是在广州的爱育善堂建立之后才产生。当时英国殖民政府没有办法处理华人生病的诸多问题，所以鼓励在香港有钱的商人建立东华医院来处理这些问题，这其实就是爱育善堂的模式，这种善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自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广州社会出现了种种问题，基本大部分都是善堂来处理的，政府的力量相对较小的，几乎没有太多资源，之后的民国政府也没有能力整合全国力量来处理民生问题。1949年左右，广州最大的医院要算是方便医院，1949年之后就慢慢变成了现在的第一人民医院，所以这种基础还算是被吸收进入到了国家机器里面。

李怀宇：你在主持“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后，工作又有什么样的变化？

梁其姿：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来有很多不同的社会学科，有一段时间是在尝试不同学科的整合，但在后来整合非常困难，所以每一个学科就成立一个组。每一个组只进行专业的研究，学科之间的交流就显得比较少。“中央研究院”认为如果继续这样是不行的，

还是需要学科之间进行互动沟通，他们的办法不是以学科组别为单位，而是每个学科要吸纳各个学科来进行跨学科计划。其间我继续参与，还主持了一个卫生史的研究计划，这是跨学科，包括了历史、公共卫生、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等。但我后来主要是在史语所工作，虽然我现在到了香港，还是和卫生史的同事继续有合作的关系。

李怀宇：在 2008 年之后怎么会想到回香港？

梁其姿：这是香港的同事鼓励我回来的，这几年香港的大学发展得很快，就觉得人力不够。但是我 2008 年在台湾的工作才告一段落，才有时间抽身回香港。

李怀宇：到香港后，你的研究方向有没有大的改变？

梁其姿：趁在香港的时间，我就抽空到广州研究十九世纪的医疗文化。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广州是最早引进西洋医学的地方，大概是在 1834 年，几个英国人在广州建立医院行医，也训练当地人做学生，像种牛痘也是在广州开始的。后来本土善堂的进一步完善，也有了西方医学，但两者算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所以我很想进一步了解现代医学是如何在广州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也想具体了解何谓华南的现代医学，我想那不只是西医东渐那么简单。我只要有时间就会来广州，但现在因为要教书的关系，来得比较少了。

我们每一个人写历史都反映了我们每个人的际遇

李怀宇：张逸安在《黄河青山》的《译后记》中提到你的帮助，你和黄仁宇先生有交往吗？

梁其姿：其实交往并不多，因为黄仁宇先生有一段时间到台湾演讲，但后来回美国去了，加上身体不是很好，所以没有太多交往，倒是黄先生的好友林载爵先生和我比较熟。

李怀宇：林载爵先生认为，现在黄仁宇先生的史学观点受到了主流学界的批评，是很大的不公平。

梁其姿：黄先生那时候的观点是一种很自然的历史观，就像钱穆先生那样看历史也是很正常的。但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历史，我上课也是告诉学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理解的历史是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来理解的历史。黄先生是一位很好的史学家，但他的解释是受到了他的时代背景的影响。

李怀宇：你在研究明清的历史时，有没有受到黄仁宇先生的影响？

梁其姿：他对明清的历史是用他处在的时代背景理解的，有些对中国“恨铁不成钢”情绪在里面。他是要在明代的历史中找出中国不能现代化的根源，这是他与钱穆先生那一代人所关心的事情。

而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定义,我们就有很多疑问了。中国现在在国际社会举足轻重,而我们没有前辈学者那样的心理负担,所以我们看明清的历史又有一个不同的视野。我们的问题与他们不同。

李怀宇:读过《黄河青山》会发现,黄仁宇先生这辈是非常不如意的。

梁其姿:对,这就影响他的历史观,我们每一个人写历史都反映了我们每个人的际遇。每个人的际遇都多多少少决定了我们怎样看待历史,写历史。

李怀宇: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和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给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读后感。

梁其姿:他们的际遇不同,何炳棣先生是很早就受到国际学术界肯定的一个人,而且何先生出道也比较早,所以看这个人的著作就和他本人是一样的。何炳棣先生是我尊重的一位前辈,我和他的交往就比较密切,他是当时我所在的中山所的通讯研究员,每次院士会议都是我们来接待他,常听他讲故事,讲研究学问的态度。何先生在台湾时间比较长,对我的鼓励也比较多。

李怀宇:如果说历史研究和自己的际遇是相互关联的,那你为什么关注慈善医疗这方面的研究?

梁其姿:何炳棣先生从来不做二等的题目,都是研究中国社会

文化思想里的核心问题。和几个前辈关心国家大事、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这样巨大问题相比较,可能是性别上的差异因素,我更为关心的是社会中下层的人们的命运。这些人是很弱势的婴儿、老人、病人、妇女,还有城市边缘人,他们都没有权力,那他们会怎样看待这个社会,怎样对待命运,这才是我所关心的。他们常常是被主流冷落的,同时也是被历史忽略的,历史常常不写他们,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样思考,怎样生活,我就是需要给他们一个还原历史声音的发言机会。

我觉得在历史研究上,这也有技术性的困难。弱势群体通常是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想法书写下来的,他们往往没有掌握文字的能力,所以有关他们的看法很少,同时也需要太多资料的了解。相反,精英看历史方面的资料就比较多。研究一个伟大的东西往往比较容易得到资料,像我研究的这方面就有困难,但又非作不可,否则历史里少了这方面的声音。相对于主流精英的历史,用英文就是 master narrative,即英雄式的主流叙述,我就要提供一个卑微人的叙述,但这种叙述不能流于情绪,研究者需要一些修养在里面,我也尽量往这方面去做。

李怀宇:在历史里看见你所说的卑微人物是很不容易的。

梁其姿:其实我并不是想把小人物写成可怜巴巴的人,因为他们事实上也不是这样的人。我希望展现出来的是异于英雄式人物的小人物,写出他们的主体性、主动性、在历史里曾扮演的重要角色,这需要很多努力。

孙康宜：重写中国文学史



孙康宜 (Kang-i Sun Chang): 原籍天津, 1944 年生在北京, 后随父母迁台, 1968 年移民美国。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 现为耶鲁大学首任 Malcolm G. Chace '56 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著有英文学术专著多种, 其中包括与苏源熙 (Haun Saussy) 合编的《中国传统女作家选集》, 与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已出版的中文著作有《文学经典的挑战》、《耶鲁性别与文化》、《我看美国精神》、《亲历耶鲁》、《走出白色恐怖》、《曲人鸿爪》(张充和口述)、《古色今香: 张充和题字选集》(编注)等。

我一直以为，孙康宜教授的独特经历，让她用英文解读中国文学，肯定有一种新的诠释。

孙康宜的家庭在台湾遭受白色恐怖，使她在读书时代经常躲在英文的世界、西方的文学里。赴美留学读英国文学，到了普林斯顿以后，突然间有一股强烈的寻根欲望，才开始做中西文学的比较。孙康宜深刻地领悟到：“如果没有好好苦读中国古典文学的话，我比不了什么东西的。”她一向专攻美国文学和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但进普林斯顿大学后决心转到东亚语文系。在高友工教授的启发下，她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一种虔诚的态度。

孙康宜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后，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1982年进入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1991年至1997年为该系两任系主任。到1993年，她才开始努力用中文写作。她从学英文再到读中文，感觉就像发现金银岛一样。

中国文学史能不能用英文重写？孙康宜用热忱留给读者一个别致的答案。《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由孙康宜和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共同主编，汇集十几位专家学者分章撰写，历时五年，已于2010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包括书面版和各种电子版)。《剑桥中国文学史》属于剑桥世界文学史的系列之一。与该系列已经出版的《剑桥俄国文学史》、《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剑桥德国文学史》

相同,其主要对象是受过教育的普通英文读者。然而,剑桥文学史的“欧洲卷”皆各为一卷本,唯独《剑桥中国文学史》破例为两卷本,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悠久的缘故。

如今总算完功,孙康宜教授笑道:“当剑桥大学出版社请我来主编这部书时,在共同主编的人选方面,我很自然就想到宇文所安,因为他在美国的汉学界是顶尖人物,而且他是我的好朋友。你也知道,不是朋友很难合作。”

在合作的过程中,每个专家都分写一段历史,具体分工必须科学。在第一册里,宇文所安写的是唐代文学文化史,那是他的专长,但那章所涵盖的时期则是650年至1020年,与一般以朝代的分期法不同。普林斯顿大学的Martin Kern所写的是古代一直到西汉。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David Knechtges写的是东汉到西晋。哈佛大学的田晓菲写的是317年至649年。加州大学的Ronald Egan写的是1020年至1126年。加州大学的Michael Fuller和密西根大学的林顺夫合写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那章(包括那段时期的南北文学史),亚利桑那大学的Stephen West则写1230年至1375年。在第二册里,孙康宜写的那一段就是明代的前中期,大约从1375年至1572年。耶鲁大学的Tina Lu写的是从1572年至1644年。哈佛大学的Wai-yee Li写的是清初到1723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伟写的是1723年至1840年。哈佛的王德威写的是从1841年至1937年。加州大学的奚密(Michelle Yeh)写的是由1937年至2008年的文学(其中还有耶鲁的Jing Tsu和英国伦敦大学的Michelle Hockx个别撰写的篇章)。

这部文学史每一位撰写者都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文学史中有一些错误观念,因为时间久了,学者们一抄再抄,竟忘记了原来的样子。在每一个朝代里,他们都发现有类似的例子。

而对这部文学史的具体写作要求,孙康宜说:“我们是希望有利于读者从头到尾通读,甚至坐在飞机上也可以读。当然,这是我们的理想,为这理想,我们也捏一把冷汗,因为我请的这些作者都是很有名的学者,每一个都是某一领

域的专家，但他们并不一定都是作家。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宇文所安当主编，都谨慎万分，凡事尽力。如果哪一页哪一段写得不好，无论如何也必须改写的。我们甚至也请特别的写作专家帮忙，总是希望不要写得枯燥无味，一定要努力写得精彩。”

写文学史就像接力赛

李怀宇：《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启动，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

孙康宜：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主导的世界文学史系列中，已经出版的文学史有《剑桥俄国文学史》、《剑桥德国文学史》和《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在这些文学史中，每一章都介绍一个不同的时代，都是由一位被公认为杰出的学者来写的，就像接力赛一样。因为我们一个人不可能对所有时期的文学都专长，所以就用接力赛的方式，最为理想，但必须召集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可以写的。剑桥大学出版社这一套书主要以单册为主，其主要目的就是想让普通的英文读者拿起书就读，而且在看完之后，感觉跟读完一系列的故事一样。因此《剑桥中国文学史》希望以精彩的方式来写。但如果要用一册来写这样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后来就要求两册，这在剑桥文学史的系列中，是唯一的例外。我必须说明的是，我们这部两册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跟前几年已经出版的颇为庞大的“剑桥中国史”系列的方向不同。“剑桥中国史”主要是写给专家看的，基本上是一连串的参考书。但我们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却希望给普通的英文读者看，即使是不懂中国文学的西方人读了也会觉得精彩才行。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理想。我们自然也希望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也会喜欢,所以必须写得深入浅出。

这种文学史的写法和我的德国朋友顾彬(Wolfgang Kubin)所编的文学史系列很不一样。顾彬所编的十册中国文学史(前七册为文学史本身,第八、九、十册则分别为书目、索引等部分),都是用德文写成的大部头巨著,确实惊人,也让人佩服。他的文学史系列早自1988年就开始筹备了,但一直到1994年才开始进行写作。本来他早已集合了一些人,分别负责各册的写作,谁知后来有些作者却洗手不干了。所以他最终只好亲自写了三大册文学史——即第一册(中国诗史),第六册(中国戏剧史),第七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还负责主编第四册(中国散文史)。这样一来,他大多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况中,只能长年地埋头苦干。因此,他的写作过程就显得比较“寂寞”。但因为我们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是“接力赛”,所以作者和作者之间都必须不断地互相参照配合。最难的就是其中提到的每一部作品的英译题目都必须前后一致才行,例如《金瓶梅》必须译成“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西厢记》必须一致翻成“The Western Wing”,《名媛诗归》一律为“Poetic Retrospective of Famous Ladies”等。这样就需要两位主编卖力地不断查看核对。幸亏有E-mail,我常常会收到一个作者来信问:这个书名怎么翻译?我就同时要E-mail给另外三个作者,讨论该怎么翻译。而我和宇文所安也要同时以电子邮件互相讨论。我们两位做主编的确相当辛苦,但我们都认为这是为西方汉学界服务,这是我们的义务。

李怀宇:你写的关于明代那一章为什么从1375年开始?

孙康宜：这说来话长。其实，我们本来是说要从1400年开始，后来觉得这样分期比较难，我们也不能把朱元璋的时代抹杀了，因为虽然他是一个恐怖的统治者，但是在恐怖政治底下，也有一些地下文学。所以后来我们认为1375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明代于1368年立国，到了1375年左右，从元朝遗留下来的那些重要文人大都先后去世了，被朱元璋杀头的也都杀完了（包括高启），于是就开始了另外一段新的文学。

李怀宇：这一章中有没有仔细探讨中国传统的“四大奇书”？

孙康宜：当然有。有趣的是，所有“四大奇书”的小说都是一百回。但我只负责撰写其中的三部——即《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至于《金瓶梅》则由下一章的作者 Tina Lu 来写，因为那部小说较适合那一章的内容。现代的读者们总以为明朝是专以小说为主的，但是事实上，如果你认真去读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东西，你会发现当时小说的确不那么重要，至少还没变得那么重要，当时主要还是以诗文为主。小说之所以那么有名，是后来的读者认为那种书很棒，很耐读，故将之提携为经典作品。可以说，是后来人把小说想成那样重要的，当时人或许还没有那种普遍的想法。我曾和北师大大的郭英德教授讨论过此事，他也认为在明代前中期的时代，文人最注重的还是诗文的写作。

我对《三国志演义》的讨论重点主要是有关明朝人的新的“英雄论”，我以为“四大奇书”中的《三国志演义》的确和从前的版本大为不同，其中之一就是有关英雄面貌的复杂性（请注意：当时该书的正确书名是《三国志演义》，不是《三国演义》）。还有，其中的《西游记》和

《水浒传》，其“英雄论”也跟以前的看法不同。我以为，关于英雄方面的不同改写，这跟明朝的文人文化有关。从前我曾专攻过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也写过有关十九世纪作家 Thomas Carlyle 的 *Of Heroes and Hero-Worship* (《英雄论》) 的论文。总之，我选择用新的英雄主义为出发点来进行讨论“四大奇书”的小说。当然，每一种文学史都是主观的，不能说是完全客观，如果都是客观，写出来人家就不爱看了。其实，我们每一位作者都很主观。如果说我们十七个作者都必须写得一样，那就没意思了。就因为这些个别的学者都用自己的观点来看那个时代，这样配合在一起才更为有趣。

李怀宇：从 1937 年到 2008 年这段现代文学史是怎么写的？

孙康宜：有关最后这段文学史，最难的就是选择作者，因为这一章不只要写中国大陆的文学，还要包括台湾、香港，海外的中文写作，像马来西亚等，甚至包括网络文学。所以我们必须选一个对这些地区的文学都熟悉的人，最后我们邀请的是执教于加州大学的奚密教授，因为她对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都很熟悉，我们同时也选伦敦大学的 Michel Hockx 教授，请他在这一章专门写网络文学和出版文化。

我们不喜欢只是看人家的文学史

李怀宇：你们为这本书定下的基本格调是什么样的？

孙康宜：第一，我们要用深入浅出说故事的方式，不但是普通英文读者能看懂，专家看了也觉得精彩才行，用英文来说就是 readable，可读性高。第二，我们是以年代先后为顺序，而不是以文类为中心。因为现有的很多文学史大多以文类为中心，比如说中国诗史、中国词史、中国戏剧史、中国小说史等，连鲁迅都写《中国小说史略》。所以我们决定以年代为主，在年代底下再讨论不同的文类和文体。这样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学。同时，我们尽量不要用西方汉学界专业的术语（jargon），我们的目标是大部分的普通读者都能看懂。

李怀宇：为了保证这本书的可读性，让它像讲故事一样，有没有对所有的作者在文笔上的要求？

孙康宜：有，最好的学者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作家。有些学者本来就很会写成那种深入浅出的方式，所以就不需要太多的要求。但如果某一章过分学术化，我们就聘请特别编辑来润色。同时，我们也不能浪费文字，所以不准写一些没什么意思的句子。加上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很厉害，他每行都问：你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有这一句？每一句都在那里抠你，所以我们有很好的人在监督。

李怀宇：这本书在编撰思想上有什么明显的特色？

孙康宜：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通常都不是中国“文学文化史”（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而只是文学史（history of literature），同时，大多以文类为主。比如说，通常的文学史比较注重描述某某作家生平如何，是诗人还是小说家，一共出了多少书，但我们不

是以个别作家为重点,而是以某段文化潮流的深入描述为主。如果哪个作家真的在那段文化潮流里很突出,当然会出现在我们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我们也会花很多的篇幅来谈他,但还是要以文学的潮流为主。如果某位作家被当时潮流漠视,我们也会讨论“为何有这种现象”、“为何读者没普遍接受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等问题。总之,这是一部文学文化史。从这点来说,这种写作文学史的方式可谓特殊。此外,我们还讲到印刷文化、性别、选集的制作等主题。

这部书主要还包括文学的接受史。到目前为止的文学史,很少谈到接受史。比如说《太平广记》这本书就应当出现在三个朝代里:首先,《太平广记》书中所有的传奇故事都是唐朝时写的,但一直到宋朝才搜集成集子,最后真正印出来则是十六世纪明朝的时候。所以,在唐朝的那一章我们会讲传奇故事的形成文化,在宋朝的那一章也会提到传奇被搜集成为《太平广记》一事,在明朝的其中一章也应当谈到《太平广记》的印刷史。印刷史跟接受文化总是应当互相呼应,应当合在一起讨论的。

还有“经典形成”(canonization)的问题也很值得考虑。一个文学作品怎么会成为经典?为什么有些伟大的作品没能成为经典?其实,那些文学作品之所以会让人忘记,就是因为没能及时成为经典。当然,这个现象跟选集的出版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某一作品被选入选集出版了,将来就会流传下去。还有文学集团的支持也很重要,因为一个作家不可能自己变成有名,需要文学集团和读者们的帮助。还有性别问题,我们目前的文学史比较少谈性别方面的问题,但在我们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性别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当然,我们不会故意去谈它,但如果哪个女作家当时真的很有名,很杰出,我们就会谈到,如果当时并不重要,我们现在也不能随便给她提拔。

李怀宇：在史料的运用上，你们坚持什么原则？

孙康宜：我们不喜欢抄袭人家的文学史，我们希望能够借着对文本的深入研究，努力还原到本来的那个“当代”。我们坚持尽量用原来的史料文本，不喜欢用二手资料。可惜因为篇幅的限制，我们无法把浩如烟海的中文书籍列入《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书目中。但每一个作者都很努力地研读中文文本，都认识到明朝的东西就是明朝的东西，清朝的东西就是清朝的东西，这样子才能够有新的创见，也才能更正文学史中的一些错误。所以，我以为这是我们比较大的贡献：我们的东西是原本的资料，不是后来人云亦云的东西。例如，明朝真正发生了一件事，但清朝的时候经常就改变了说法。所以若能用原来的史料，就比较精确。这就证实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我们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最古的那一章其实是最“现代”的一章。上头已经说过，第一章（即最古的一章）的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 Martin Kern 教授。因为几乎每个月中国大陆都有新的出土资料，所以每一次出土的时候，他就会发现文学史上的问题。所以他的那一章，虽是最古代，其实最摩登，因为原始资料都是最近才发掘的。

李怀宇：在中国文学史上，每个时代常常对一些文学家的评价都会不一样，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孙康宜：这就牵涉到文学接受史的问题。比如说陶渊明在生前根本就不算是很著名的魏晋“诗人”，但是后来为什么被后人抬高了？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宋朝的文人（例如苏东坡等人）把他神化了。宋朝

人在陶渊明的身上看到他们自己,陶渊明的这种 afterlife (也就是他身后的不朽),可能是宋朝人创造的。

我们把文学的时代和政治朝代分成不同的方式

李怀宇:这本书的编撰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孙康宜:大约五年吧。但是英文书最累人的地方就是有 index——索引。通常很少中国人想到这个事,因为中文书基本上没有 index,书写完就结束了。所以我总觉得写中文书比较轻松,写英文书最痛苦的一关就是准备 index。我们一直在奋斗挣扎,就是为了努力在几个月的时间完成索引。而且,为了配合书面和各种电子版的需要,编撰索引的过程要比从前的难度高得多。现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所要求的是一种称为 XML 的 indexing,即使让一个人每日埋头苦干,最快也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工。所以,我们聘了一位职业编辑 Eleanor Goodman (她是诗人,也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二册的文字编辑)来为我们作这事。她愿意承担这个编索引的艰苦工作,完全是本着任劳任怨的精神,令我们既感激又感动。此外,剑桥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对于书中每一个标点,每一个字,每一行都给你发出提问。总之,这个十分繁琐的工作阶段至少需要一年,这就是为什么英文书出得比较慢的原因。你看,通常英文书很少有错字,就是因为他们这么严格地编书的。所以我每次写英文书最痛苦的时刻就是最后这个阶段,当然在这艰苦的过程中,也学了不少东西。

李怀宇：这部书将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孙康宜：对。中译本将同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发行。简体版将由北京三联出版，繁体版则由台北的联经出版。大约两年之内就可以出版中译本。

李怀宇：你认为《剑桥中国文学史》相对别的中国文学史而言，有什么新意？

孙康宜：我们把文学的时代和政治朝代分成不同的方式来说，而不把它们等同，这个已经是比较新的观念了。再者，很多人都把五四运动当做现代文学的开始，当然也有人把鸦片战争当做开始，但我们不是以这种政治分野，而是以文学本身内在运行的段落为标准。我们之所以把“现代”定为1841年开始，并不是因为鸦片战争的关系，而是以龚自珍（龚死于1841年）、魏源等人的文学作品所发出的一种“现代性”（modernity）作为根据。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把有些传统文学史的偏见改正过来。比如说很多历史书、文学史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宋朝结束以后才有金，然后才有元。其实，这种说法是错的。金、元跟南宋的初年是同样一个时期的，所以在写作的时候要特别标出这一点，而不是把它们机械性地分开。如果把它们勉强分开的话，读者就会误以为它们是不同时代了。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就是有关文学的改写。通常一般人会说，《汉宫秋》、《梧桐雨》等杂剧写得多么好呀，那是元朝人写的，但其实这些作品的最后定稿并不是元朝人写的。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看

到的这些戏剧版本大都是明朝人“改写”的,至于改写了多少,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们并没有看见原本(哈佛大学的伊维德教授[Wilt Idema]对这个题目很有研究。根据他的考证,元杂剧中有十六个剧本是明代曲家李开先改写的。)。当然,西方文学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莎士比亚之所以这么出名,就是因为他能把前人写的剧本都改写得很有生动,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新的发明,只是原来的文本写得枯燥无味,他一改写就变生动了。对于这种所谓创新的“改写”(rewriting)跟作者权的问题,我们自然就会想到:究竟谁是真正的作者?后来改写的作者贡献有多大?像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都很有启发性。而且每一个朝代都有类似的例子。

顾彬有个人色彩,马悦然令人佩服

李怀宇:在今天西方学界,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当中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孙康宜:现代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都非常敬佩。我从197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文学,那时候汉学界就好像比较专门,让人觉得是在研究博物馆里的东西一样,但现在中国文化很红了,是全球化很重要的一部分,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学中文的人多的是。2007年,北京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国际大专辩论比赛,耶鲁大学的美国学生就得了世界冠军,他们只学了三年的中文,居然那么会说中文,还会背诵《赤壁赋》等古典作品,真令人钦佩。所以,现在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当然很高了。

但关于国人总希望中国文学要在世界文学中得到认同这一点，我现在应当趁机就这种从“五四”以来的“比较偏执”稍作批判。其实这是从传教士介绍中学到欧洲以后，在欧洲早期汉学以来一直看待中国文化的一个“东方主义”的眼光：凡是他们赞赏中国的某作品或某特征，总是基于哪一点与西方相同。这就是说，西方的“比较观”只醉心于寻求同于己者，如找不到同于己者便不重视。许久以来，西方汉学家采取的是一种“克隆”眼光的比较观，而这一点在比较文学盛行后也传染了中国学者，使他们只在此圈圈中打转。我以为现在应该突破这样的“克隆观”，应当在比较中求异，大谈中国文化或文学的特质(uniqueness)了。

李怀宇：你认为《剑桥中国文学史》在西方会受到重视吗？

孙康宜：会的。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没有中国文学观念的普通英文读者拿起来就能读，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们建议要出两册，出版社很不情愿的原因，因为两册的确比较难卖。但是要写成一册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要写出粗枝大叶的东西，我们的目的既然是要向西方的读者介绍中国文学是怎样发展的，有关它的特殊性如何等等，我们就必须认真地写，不能偷工减料。我觉得《剑桥中国文学史》会在西方读者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的角度不一样。其实在某一程度上，我们是在给西方读者解围。我们请来的这些作者也都是同时接受东西方传统教育的人，所以很自然就会用不同的观点来写，跟中国传统的观点有些不同。

李怀宇：你有没有留意到，顾彬对中国文学的评论为什么会引起

很大的反响？

孙康宜：顾彬之所以会引起很大的反响，是因为他所用的角度不同。我以为顾彬是比较有个人色彩的人，那是他的长处，但也是他的局限。我和顾彬是朋友，两年前他曾来耶鲁大学演讲，谈鲁迅等。当时我们给他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就是他那本已翻成中文，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由范劲等译）。他那个庞大的中国文学史系列一共有十册，当然是跟我们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有不同的格局和定位，而且他的文学史是用德文写的，做法跟我们很不一样。听说他的那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中国得奖了。我记得在得奖的新闻中，有这么几句评论：“没有哪一部历史著作是全然客观的，文学史的写作更是如此，但像本书这样具有如此鲜明个人色彩的文学史著作，却也并不多见。”有趣的是，该新闻评论也说道，顾彬对莫言、王安忆等人的评价“也不怎么令人信服”。作为顾彬的朋友，我其实并不认同他的一些看法，我也经常和他辩论，但他从来也不生气，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朋友。一般说来，他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有一点我必须指出的是，媒体对顾彬的报道经常有歪曲事实之处，有些朋友因此对他有了误会。但他从来不介意这些，只是继续努力读书写作，每天忙碌万分，最多只睡五个小时。

李怀宇：马悦然呢？

孙康宜：马悦然（Goran Malmqvist）也是我多年来的好友。我经常去瑞典开会，所以经常看见他。他也在2000年初来过耶鲁大学，做了一场 Hume Lecture 讲座的专题演讲。一般人提到马悦然，总是想

到他是诺贝尔奖金的评委，当然那是很重要的，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令人佩服的传统汉学家。他是瑞典汉学派的代表，他的老师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当年就是西方汉学的巨擘，所以马悦然很注重音韵学、文字学等。那次在耶鲁演讲，马悦然讲的就是有关西方汉学的传承问题，那次演讲十分卖座。后来，从他所写的《高本汉传》中，我更加看到他的真正功力所在。此外，他对现代的中国作家也很关注，在高行健以前，他早已提拔了前辈的小说家沈从文。如果不是因为沈先生于1988年突然过世的话，我以为他一定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中国作家不一定要得诺贝尔文学奖才显得伟大，因为中国文学的丰富本来就是世界上少有的。

编完《剑桥中国文学史》之后，我和宇文所安两人都觉得对中国文学的传统更加尊敬了。现在我们不但更能掌握一套套古老的线装书，而且特别欣赏像马悦然那样的传统汉学学者，因为他完全是就中国文学的“特殊性”来看中国。

张信刚：文化素质是各种学科的灵魂



(摄影：林津鹭)

张信刚：1940年生，辽宁辽阳人。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工程硕士，美国西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博士。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创院院长、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曾任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长，香港特区文化委员会主席。英国皇家工程学院外籍院士，获法国政府颁授法国国家荣誉军团勋章及学术棕榈司令勋章，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金紫荆星章。发表超过一百篇学术论文，主编两册研究专论，拥有一项加拿大政府专利。中文著作有《大学之修养——张信刚人文随想》、《活字版与万维网》、《尼罗河畔随想》、《茶与咖啡》等。

从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退休后，张信刚先生不再参与学校的任何事务，但仍住在学校附近，他们夫妇都喜欢香港的生活。家里布置雅致，客厅所挂书法是友人写的陶渊明《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书房摆放古琴一架，那是张太太周敏民女士的兴趣所在。张信刚先生和蔼儒雅，闲谈中能讲流利的国语和粤语，也精通英语和法语。

张信刚的祖父是早期的西医，在济南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和平医院。抗战初期，张信刚的父亲在沈阳的南满医科大学教书，1940年，张信刚在沈阳出生。那时祖父身体不太好，觉得照顾不来医院，一个电报就把儿子一家从沈阳召到济南。国共内战时，解放军围城济南。一个胃下垂而濒危的病人被张信刚的父亲救活后，心存感激，有一天，他说：“明天有一架飞机来济南运送物资，回程时飞机上有少许座位，虽有不少人订了位子，我还是掌握一些位子，你家里有几口人？”张信刚的父亲说：“六口。”他说：“六口人正好，你救我一条命，我就把六个位子让给你家里人。只有明天，我不知道下个礼拜能不能飞了，也不知道我还管不管得了事，所以，你今天晚上要做决定。”张信刚当时七岁半，记得睡觉的时候，爸爸妈妈谈了一夜话，当然不太明白他们说什么。第二天仍旧上学，大概不到两堂课，家里人来接张信刚回家，接着上了一辆吉普车，直奔飞机场。张信刚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去了上海外祖父家。张信刚的父亲和一个在台北的同学联系上，知道台湾的医院需要懂日文的医生，便先行到台湾探

路,不久张信刚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也从上海去了台湾,那是1948年秋天。

张信刚1958年考入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系,1962年毕业后服一年兵役,通过了留学考试,也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办签证时,大使馆的华人雇员告诉张信刚:“你这个情况不用申请了,一旦不给你签证,说你有移民倾向的话,那你走到哪里都要填表,都会问你有没有被美国拒绝过签证。你父母在埃塞俄比亚,为什么不去那里想想办法呢?”原来,张信刚的父亲在台湾大学任教期间,曾到美国学习心脏外科手术三年,成为台湾第一个开心脏外科手术的医生,后来感觉顶头上司跟他争风吃醋,对他刻意压制,便申请去美国移民。当时美国移民法对华人移民名额限制极严,张信刚的父亲在等待的过程中,先应聘到世界卫生组织在埃塞俄比亚办的医学院担任外科主任。1963年,张信刚在暑假赴埃塞俄比亚探亲,到探亲地后才去办赴美签证。张信刚回忆:“一路上去了香港、曼谷、贝鲁特、埃塞俄比亚,又去了雅典、罗马、苏黎世、巴黎、纽约,再从纽约去加州斯坦福大学。别人是从台湾向东走,到美国西岸。我是从台湾向西走,转一圈越过大西洋到美国东岸,再跨过陆地,到美国西岸。我这是‘曲线留学’。”

在斯坦福大学,张信刚攻读结构工程硕士学位,是受任结构工程师的舅舅影响。那时美国移民局规定,拿到学位的留学生可以有十八个月的实习时间。在实习期间,张信刚发现自己不喜欢结构工程师的工作,它对自己个性而言太枯燥了。于是,张信刚申请西北大学的奖学金,到芝加哥念流体力学的博士。念了一年多以后,张信刚的导师拿到一笔经费研究生物医学工程里的“人工肺”,需要一些学生跟他转专业。张信刚恰巧因为父母都是医生,就参加了导师的新工作,成为西北大学最早的生物医学工程博士之一。张信刚笑道:“还是逃不过父母家庭的影响。”

1968年圣诞节时,张信刚完成博士论文,并通过了口试。1969年1月,张信刚到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当时吴大猷是纽约州立大学物理系的资深教授,全校的十几个华人教授每月一次聚会,谈天说地,使张信刚印象深刻,觉得那

是思想碰撞的好机会。

在北美，张信刚发表过科学论文逾百篇，编撰研究专论两部，并取得了一项专利注册。1988年，他获选为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学会主席，1990年成为美国医学及生物工程学学会的创会院士。英国皇家工程学院主要因为张信刚的急救发明——胸外高频压缩法，授予他外籍院士的荣誉。他在香港科技大学担任创院的工学院院长，后出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兼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1996年，张信刚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从此放弃了本行的科研工作。

1997年夏秋之交，张信刚应香港电台之邀，在普通话台主持每周一小时的节目，取名“张信刚随想曲”。对这个“百业待举”的大学校长而言，这份业余工作并不轻松，那时候睡觉是奢侈。张信刚曾邀请过十几位文化学者来对谈，多半则是自己独白，这个节目主持了一年后，集成《大学之修养——张信刚人文随想》一书。张信刚常常对子女说：“我好像转了好几次本行，但做什么事情还是要有点毅力和恒心。”

1998年10月，张信刚开始在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官邸举行每月一次的文化沙龙，连续做了将近十年，共计八十五次。城大校长官邸的客厅可以容纳几十人，每次都是高朋满座。文化沙龙的主持人是张信刚，负责后勤照顾客人的是张信刚的太太周敏民。“城市文化沙龙”的主讲者有郑培凯、张隆溪、白先勇、汤一介、张灏、叶嘉莹、李欧梵、杨澜、汪明荃等各行业的名流，还有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

张信刚回忆：“‘沙龙’这个词我是在台湾学到的，欧洲小说特别是法国小说里，有很多文化人搞沙龙，比如说，肖邦的情人，笔名叫乔治·桑的伯爵夫人，就喜欢找一批人在她家里谈文学，谈音乐。到了1998年，张隆溪、郑培凯两位来到，我们‘三剑客’一谈，他们很赞成，我就办起文化沙龙来了。‘沙龙’的原意是客厅，是一个从欧洲进口的时髦名词。你看，汉朝的党锢之争，知识分子喜欢成群聊天，这不是沙龙吗？到了魏晋南北朝，谈玄学就更不在话下

了。宋朝书院的形成,像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士人交流的地方。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借了‘沙龙’这个名词,因为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格式和欧洲人也差不多,都有个客厅。其实知识分子最大的快乐就是知识和思想的交流。”

1996年至2007年担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赢得了“文化校长”之誉。退休之后,张信刚应邀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讲授的并非他原来研究的生物医学工程,而是人文素质课程。

张信刚闲时也到一些感兴趣的地方旅行。在二十九年前,他忽然感觉自己知识的空白点是从中国的陕西省以西到巴尔干半岛以东的伊斯兰世界,以后便有意识地逐渐弥补这方面知识上的漏洞。2004年,张信刚第一次到土耳其访问他认为很有才华的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并邀得他访问香港城市大学。两年后,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9年秋,张信刚应邀到土耳其海峡大学任教一学期,进一步加深了对土耳其社会的理解,他说:“土耳其跟中国有相当的可比性,它的奥斯曼帝国晚年等于我们的晚清,阿塔图克(凯末尔)领导下的共和国时期等于我们的民国。”回顾游走过的世界各地文化,张信刚开始撰写《游走于文明之间》系列文章。

香港是中国最具有现代化精神的地方

李怀宇:1990年,你为什么从美国到香港来工作?

张信刚:我年轻时积极参加过保钓运动,并且认识了一些人。到了1989年,大家对中国的前途展开大辩论,香港出现大批的移民潮。港英政府做了一个政策:加速开办计划中的香港科技大学,请在海外已经有一定成就的华人知识分子作为建设队伍的基本来源。校长吴

家玮教授跟我认识，我在西北大学当博士生的时候，他在那里做博士后。他找了我和我太太，我是工学院的创院院长，我太太是图书馆的创馆馆长，换句话说，她一本书也没有，一间阅览室也没有，就当图书馆馆长，我则是一个教员也没有，一间实验室也没有，就当工学院院长。她本来在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当常务副馆长，我在南加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当系主任，同时是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的会长。连我父母都有些惊讶：“你们俩怎么就这样决定回去了？”这个问题不少人问过我。我相信跟我素来的中国情怀有关系，我相信中国人的命运是要看中国大陆的表现，所有华人的命运，甚至包括非华裔的。对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中国造成的祸害，我感受还是比较强的，我知道香港就曾经是这么一个地方。别的不说，我在台湾长大的时候，每周要背孙中山的遗嘱，其中两句话就是“余最近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所以，我对中国收回香港是十分支持的。别人往外走，我们这些人往香港走。各人有不同的具体原因和心路历程，可是总的一点，就是希望看到中国进步。香港在那个时候，包括现在和可见的未来，都是中国最具有现代化精神、时代精神、最有经济实力的一个地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在香港工作，间接上已经证明我们对内地也发挥了一些作用。

李怀宇：你在当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时，有“文化校长”之称，为什么在一个理工商科为主的大学里，提倡中国文化课程？

张信刚：人还是逃不过父母的影响，很多人自以为反叛父母，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受父母影响，这是人的命运。我高中毕业时候，父母

是希望我做医生的,除了我爷爷是医生以外,我母亲有两个妹妹也是医生,我姑姑叔叔里也有医生。所以等到我念博士的时候,我的导师有七八个博士生,他拿到了美国卫生总署的一笔研究金,要做关于人工心肺机的研究。我是头两个报名参加的,因为我一下就对它感兴趣了。那一定是我父母在我脑子里潜在的影响。我父亲还有个特点,我现在的表现跟他很像。他在台湾大学做外科教授,到我们家来聊天的很多教授都是学文的,我父亲对历史、地理、民族学、语言学都有兴趣,也读过许多中文和日文的材料。我从二十三岁开始,去过非洲、中东、欧洲,我对国际关系、历史文化一直有兴趣。到香港城市大学来,我就深深感觉到,一个真正在社会上能够有足够判断力的专业人士,包括理科、工科、商科、法科、行政人员等等,有了这种素质,就变成有灵魂的人去掌握某一种工具,对事情判断很不同。每次事务来的时候,我当然还是拿自己的感情观、价值观做基准,但是对事物的判断由于我有接触和经验,使我和别的朋友和亲人便有些不同。我觉得很得益于此。我很愿意我的学生也有机会得到这种教育:第一,对整个人文社会有所涉猎;第二,香港回归的那段时间,学生们最缺的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如果他们可以多一些对中国文化渊源的了解,能够说出几本书名,背出几句诗词,认得几个书法家的字体,对就业对事业发展对陶冶性情都是好事。所以,我提倡中国文化课程。

李怀宇: 回顾任校长期间,有哪些方面是你重点思考的问题?

张信刚: 我 1996 年 5 月上任,11 月里,我推出了一个五年计划,校董会批准了。1997 年回归后,先后按照这个计划开办了中国文化课程、英语中心、创意媒体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中心。

我做校长期间，几件事情是我脑子里想得比较多的。第一是学习环境。城市大学在城市里面，很拥挤。如何能在这个限制之下创造一个追求学问的氛围，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提出几件事，比如要尽力争取拿到地皮、拿到经费盖宿舍。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九座楼了，有三千多个床位，不久还要再盖两座新楼。另外要在教学大楼里创造出更多的空间，虽然整个建筑面积没有改变，但实用面积增加。我很注意改造城大的环境，让它更有学习的氛围，更适合学生，包括请一个画家在入门口作两幅壁画，把图书馆转一个方向等等。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改造了学习环境，学生的品质和求学心态就会有所不同。

第二是学科方面。我看到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重要性，1997年开始鼓吹创意媒体学院。创意媒体学院是要把香港那时正在走颓势的电影行业由一个新的媒体来取代，把警匪斗争、黑社会等武打为主的东西，用一部分能代表新思潮、新创意的表现方法取代，用更好的方法讲更有文化内涵的故事。手段和主题都要改变，所以叫创意媒体学院。另一个是要把郑培凯主持的中国文化中心的功能发挥得十分令人满意。他有这样的才具和学问，有了这样的机会，中国文化中心令他自己的抱负得以发挥。中国文化中心在别的地方不太多见，因为这是很独特的形式。你看到的都是名人来讲座，比较光彩照人的是白先勇讲昆曲，刘再复讲《红楼梦》与人生。但学生们接触的不全是名人，还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导师、小助教每天都在帮学生。

李怀宇：这十几年城市大学的排名一直在上升，要办好一个大学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经验？

张信刚：对排名，不要太自满，排名本身不是那么靠得住的。排名是一种参考，但不能全信了。城大的排名一直往上走，这和我了解到的客观实际是相符合的。客观说一句，不管谁，如果在城大升格为大学的第二年就来做校长，只要他不是搞得怨声载道，不是捅出大篓子，城市大学都应该是往上走的。对教学的热诚，对学科建设的兴趣，对不同大学理念的吸收，是我的机缘造成了我这样的机会。对我来说，正好把我一生所积累的经验和自己的一些思考可以在此发挥出来。那么，我愿意相信，我在当校长的十一年，对城市大学的发展肯定是起了作用的。这点我也不用假谦虚。至于起了多大的作用，或者是不是起了应有的作用，那应该是别人说的。

学术造假是天下第一宗罪

李怀宇：你对内地的大学了解多吗？你在香港做这么久的大学校长，怎么看中国大学的发展？

张信刚：我在清华、北大都待了相当一段时间，又经常跟其他大学不同层次的人来往，最多的还是跟实际上做教研工作的人来往，偶尔也有机会跟教育部的领导和大学的领导，还有学生接触。

据我所知，1949年，全中国只有六百个研究生。清华大学从1911年到1949年一共才毕业了一千五百个学生。据说1949年之前是每一万个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人之中才有一个大学生，也就是所谓的参与率是万分之一。1977年重新恢复高考，把老三届的人大都消化了。1979年开始是年纪轻的，就是十八岁左右的人上大学，那时候是

一百个人里有一个大学生或是大专生，能够读高等院校的还是天之骄子，百分之一，已经不是万分之一，进步一百倍了。2009年，据我知道的数字，是一百个人里就有二十三个大学（大专）生，就是差不多四个人就有一个。所以，今天大学生失业率比高中失业率高。大学毕业生的数目比想象中多得多，高中毕业的人可能职位有三个，有六个人来申请，两个就取一个，大学毕业的可能职位有三个但有三十六个人来申请。所以，这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而三十年前，论绝对数来讲都是排得很后的。这个飞跃是令人目瞪口呆的。中间产生的问题以及所忽略的质量问题必然存在。假如不承认问题的存在就不够科学。

中国泱泱大国，几千年的文化，到了清末或者民初，之所以整个力量发挥得如此微弱，就是因为人的素质不够。人的素质如果能够提高，首先要识字，要掌握现代的知识。从这个角度看，大学的高速膨胀，只要能够巩固，绝对是好事。但是如果无法巩固，大学统治变成官僚管理，因为大学大了，用官僚去统治是唯一的管理办法，那将来培养出来的人是适得其反，还是仍然有用，我就不敢说了。

我们在香港享有相当好的条件，校长治校的时候受到的干扰比较少，香港政府的大学资助委员会是负责拨款和统筹全局的，但具体的事情干扰得很少，尤其没有官僚主义的作风。我不是说绝对没有摩擦，但摩擦的话也不能用“官僚主义”去扣在人家头上。在内地，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官僚体系，而大学又是整个更宏大的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我在埃及待过，埃及也是这样的，埃及的开罗大学要比其他的大学高一层，因为开罗大学的校长是向总理直接报告的，其他大学是向教育部报告的。越南也是，越南有两个大学，胡志明大学和河内大学是直接向总理报告的，别的是向教育部报告的。甚至中国台湾，过

去“教育部”管得严的时候也受到这个害。所以中国大陆不应该再让大学的运作以官本位的思想折射出来：哪个大学是副厅级的，哪个大学是正局级的，哪个大学是副部级的，这种概念跟大学的传授知识、创造知识、启发思想的基本任务，以及用真理作为成败标准的基本取向是相违背的。我希望这种现象能够尽快地改过来。

李怀宇：你这几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有没有关于教育问题的提案？

张信刚：我参与讨论过，但我是港澳特邀组的，港澳特邀组的特点是，香港人和香港人坐在一起讨论，但也不是没有谏言。我不是科技组、教育组或者文化组，这几组我都有兴趣，其他组别我是没有资格也没有兴趣参加的。即使如此，有一年我提出硕士从三年改到两年就够了，用不着强制每个人要三年。当然哪个科目特别难，学生、老师觉得过不了关，念三年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用规定必须要念三年。有一次我被问到学术造假的问题，大学作为研究科学的机构，如果还造假的话，比商人造假酒更坏。造酒的商人是为了赚钱，当然害了别人的健康，但社会效果，更直接看得出来。学术造假明明没有这个数据，去造点假数据，或者明明没有做这个实验，编一个实验去博取别人的信任，这个道德的沉沦比商人造假酒让人家喝了生病更大。所以说，学术造假是天下第一宗罪。

我内心真正的价值观是“五四”的价值观

李怀宇：你对很多学科都感兴趣，既做学术研究，又做行政工作，你觉得在人生当中有没有一种贯通的东西？

张信刚：应该有一些。我常常在脑际一闪而过，觉得这个和那个是连着的。而在做科研的时候，我也感觉到知识广博一点容易举一反三。因为我研究生物医学工程，是生物医学跟工程合起来的。如果两个都懂，那就比较容易找到它们之间的关系，边缘科学的好处就在这里。很多人生的经历，不同的参与都有举一反三的感觉。到土耳其我就看到清朝，到缅甸我就看到国民党。再看我们中国，我现在越来越了解中国农村。在农村乡里面，真正起到作用的，是家族的名誉和利益。名誉和利益又是有关联的，有时候不是有纯名誉和纯利益的。现在很多致力复兴中华文化的人最为赞赏的是我们民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家庭观念。孩子很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爸爸的事我不管，他是成年人，我也是成年人，我要照顾我的小核心家庭。我们中国人、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伊拉克人，往往还是以宗亲的组织作为效忠的对象，作为依附的对象，作为安全感的来源等等。这个跟我在欧洲、加拿大、美国看到的截然不同。今天的法国、美国和加拿大，是个人主义的社会，社会的最小基本单元是一个家庭——父亲、母亲、小孩，小孩数目也不多，两个到三个，或者一个，甚至没有的。因此，就是在家庭，个人的地位也是非常突出的。子女不能去干预父母的事情，子女要念什么书，父母可以建议但子女不一定

会听的。不像我在内地的亲戚,把子女从五岁到就业的路线图都画出来了。当然后来可能有所改变,但一般情况下,父母是绝对愿意去托人情想办法让子女走他们想要的路:念哪个学校,就哪个职。子女因此也觉得是父母对他们的爱,对父母也有责任感。在欧美,法律就有一定的意义了,行政组织也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它的法律是有绝对标准的,照理说,不是以执法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假如说驾车应该在右边走,你在左边走,那就是错的。不管那个执法者是你的表弟、表哥、姐夫,他罚你的时候都应该罚。这是理论上,事实上也有偏差的时候。香港比较以法律为客观标准,可以公正地执法,法治的概念比较深入。而个人,没有其他的依附,没有宗亲概念,这样的话,法律的概念,原始的希腊罗马的概念都已经有了绝对权威观在里面。不像中国人老是说:法律不外人情。法律也是有其灰色地带的,订得不是那么准确。法律在这个时候就和亲情发生了矛盾,今天中国要现代化,一方面非常提倡中国文化的复兴,还希望人家学习我们的文化。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如何,或者很尴尬地对待“五四”的精神。今天很多人提倡,三岁小孩要读经。从知识层面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建设法治社会的概念来讲,我觉得这跟“五四”的精神好像是相反的。

李怀宇:中国要走向无数人所期望的科学、民主、自由的道路,大学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才培养和思想发散的地方,从你多年的亲身体会来观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如何协调?

张信刚:很多人因为我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认识,有一种感情,也有很多人因为我大力推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成立,就把我归为弘扬儒家的一类。其实,行为上我不可能没有受到儒家的

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台湾，我们念四书，都是一段一段要背的。我现在讲话写东西，脑子里第一个闪出的往往还是孔子的话。可是，我内心真正的价值观是“五四”的价值观。北大的校庆就定在“五四”，科学民主就挂在口头的。中国两百年积弱的过程，要想在五六十一年内一雪前耻，大概是做不到的。我只希望将来是好的东西留下来，坏的东西清刷掉，而不是相反。人类历史，是有周期现象的。像中国道家所说的，物极必反。振兴中华应该是可为的，这是我的信念，不是科学证据。整个世界看来，欧美的这五百年，是整个五千年人类文明史中的异变，照理说没理由让欧美这个世界上一角的地方，忽然变成全世界都被它控制。在某个特定条件下，先是船坚炮利，后是积聚了财富，后来在财富之下建立了思想、科学、社会制度，他们的生活形式、意识形态、社会组织都改变了，因此才会有欧美的人都觉得夜里开车也不能闯红灯。可是在其他国家就不是这样的，不只是中国，其他那些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都是随便闯红灯的。

李怀宇：你游走世界各地的文明，认为未来中国文化如何在全球化的过程寻找自己的价值？

张信刚：欧美人独霸世界，控制全球的这么多资源，造成今天世界很多环保的问题，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不管他们承不承受责任，人们再难想象十九世纪那样欧洲人独霸全球的状况，一个英国的米字旗可以全世界插，这是不复存在的。在这个情况下，我倒觉得中国说不靠占人家的便宜发展，应该是唯一的道路。能不能走得好，不知道。可这发展的动力要靠什么样的东西？我认为应该是一种精神的价值驱动。当初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也是有精神

价值观的,不是所有帝国主义者国家的人都是为了抢钱的,有部分人是真心为了拯救别人灵魂的。中国现在提出靠自己能力、靠和平、靠互通有无来发展,我认为这是唯一的道路。这就是一种价值观。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有特别洞察力的知识分子,但是我觉得假如这个世界都要发展,只能靠互利双赢的方式。为了这个模式的普遍推广,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要承认两件事情。第一,种族主义,我们中国人是不是真的不以肤色看待黑种人?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民间老百姓,媒体人,甚至官员,在心底都要自问:我是不是真的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胸怀?至少是不是有一种现在许多欧美知识分子都能达到的不以人的肤色和国籍定优劣,而以个人表现定优劣的价值标准?这个我觉得中国人需要自省。第二,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企业家也应该逐渐以热心慈善事业的心态和姿态走出去。中国作为经济体是越来越大了,但是如果真要做到富而强,强而盛的话,还需要社会上的很多力量,包括政府、公司、个人都参与到世界,为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而投入自己的才智与财力,这样才能真正创造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中国人的新文化,用流行的话说,就是赢得中国的软实力。这可不是只靠几部宣传片,只靠官员们在台上几通演讲就能得到的。至少,我们应该警惕,自己的心态要摆正。以前欧洲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我们很恼火。假如我们觉得受不了洋人颐指气使,就千万不要跑到非洲、中南美洲也去颐指气使。

郑培凯：艺术拓展人类的心灵想象



郑培凯：1948年生，山东人，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副修历史。1970年负笈美国，主修中国与欧洲思想史，获夏威夷大学历史学硕士、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自1978年起，先后任教于卫斯理安大学、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及纽约佩斯大学，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主要著作包括：《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茶饮天地宽》、《陶瓷下西洋》、《高尚的快乐》、《出土的愉悦》、《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在纽约看电影》、《树倒猢猻散之后》、《游于艺——跨文化美食》、《吹笛到天明》。主编学术刊物《九州学林》。另以笔名程步奎著有诗集：《程步奎诗抄》、《新英格兰诗草》、《也许要落雨》、《从何说起》，及译诗集三种、翻译小说两种。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门口挂着朱熹的对联：“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这是书画家王己千先生九十二岁时的手笔，在会客室访谈时，郑培凯先生恰好就坐在这幅书法原迹之前。

郑培凯读台湾大学外文系时，颇受白先勇等人的影响。他笑道：“我有时候回想起来觉得蛮好笑，我现在做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可是我从中学到大学追求的都是西方前卫性的东西。”在读书时代，郑培凯热衷于实验剧场与现代诗，因为渐渐不喜欢外文系太机械化的教学，而转系又来不及了，就辅修了历史。

1970年，郑培凯到美国攻读历史，仿佛进入了自由天地。在台湾压抑的空气中，郑培凯具有青年的叛逆心理，觉得台湾当局不让看的书，就特别想看。在夏威夷大学读书时，他主要读的是“五四”以来的文学，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张天翼……他之前通通没有读过。“我没事就在图书馆完全漫无目的地看书，就像海绵一样吸收。”

在美国，因为编辑《九州学刊》的缘故，郑培凯和余英时、张光直、费景汉、孙康宜等师友交往甚深。到了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后，由于上海的王元化、朱维铮两位的建议，合并了暂时停刊的《九州学刊》与《学术集林》，由郑培凯主编《九州学林》，编委汇聚了华文世界著名的学者。

写诗时，郑培凯用的笔名是“程步奎”。起初是因为在香港刊登批评台湾

政府的文章,用笔名逃过文网,后来觉得好玩,写诗用名“程步奎”,写学术文章则用“郑培凯”。对诗,郑培凯情有独钟,中学读书时代就认识郑愁予、余光中、周梦蝶等人,有一段时间颇受欧美诗歌影响,甚至用英文写诗。近年越写越少,倒是常常在旅行途中感觉时空转换,诗意盎然,而过年时必写一首妙趣横生的诗向朋友贺年。

提起现在的工作,郑培凯用“累得一塌糊涂”来形容。对昆曲的研究和推动,部分成果已形成了他主编的《口传心授与文化遗产》一书,现在则进行一项庞大的“昆曲传承计划”,邀请老一辈昆曲表演艺术家,记载近半个世纪昆曲四功五法的传承。他领导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项目是“陶瓷下西洋”,十年来一直得到香港政府大学研究的资助,通过外销瓷来探讨中西文化交流。而由于对茶道的兴趣,郑培凯花了六年时间研究中国历代茶书。

1991年,郑培凯到台湾做客座教授,发现有一批人对茶感兴趣,布置了很好的茶室,于是时常带学生去茶室里上课。有一次品茶讲道时,学生问道:“可不可以把饮茶的历史讲一讲?”郑培凯心头一动,便开始收集一些茶文化的资料,发现中国古代有很多茶书,但比较乱。到香港城市大学任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后,他和茶史专家朱自振合作了一个大计划,从2000年到2006年把中国历代的所有茶书都做了校注,最后完成《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汇集了自唐代陆羽《茶经》至清代王复礼《茶说》共一百一十四种茶书,同时也辑录了各种散佚著作,是现存所见茶书总汇中收录最丰富的编著。

郑培凯研究陆羽的《茶经》时,发现陆羽将喝茶放到审美的领域里,结合了许多文化艺术的思考,流风所及,后世大多数写茶的人都在讲品味的问题。而品味是一个审美的价值判断,是研究思想史重要的题目。郑培凯觉得陆羽把茶的性质与饮茶的感受合在一起,把物质性的茶叶提升到精神性的茶饮之道,使饮茶带有强烈的文化意涵,与清高、文雅、俭朴、敬谨等意识范畴连在一起,进入“清风明月”境界。因此,他对陆羽的《茶经》进行导读,形成《茶道的开始》一书。

《茶道的开始》之后，郑培凯准备写宋代的茶文化。喝茶在宋代上层社会非常讲究，出现了几个喝茶的大家，像书法四大家之一的蔡襄写过《茶录》，宋徽宗也写了《大观茶论》。“蔡襄是福建人。唐朝的时候，福建茶不太重要，宋朝以后，福建茶是最重要的。”郑培凯说，“宋徽宗是爱艺术的，他是天下至尊，对审美的追求真是没有止境的，讲究到了极点。”

历史是活生生的人类经验

李怀宇：你在美国耶鲁大学读博士时，论文是谁指导的？

郑培凯：我的博士论文最主要的指导老师是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他特别请了余英时做我的论文 committee member。因为史景迁对我蛮好的，我在耶鲁研究所得了四年奖学金之后，他又提名我担任 Yale Prize Fellow，多给我两年奖学金，所以我一直在那里读书。史景迁和余英时对我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特别是余英时。

李怀宇：你和余英时先生的学术交流是怎么样的？

郑培凯：当学生的时候，他指导我博士论文的写作。我教书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教书是在纽约，可是同时也是哈佛的研究员，所以我每个礼拜经常要来回跑，纽约与波士顿当中就是纽黑文，我要停下来休息，就到余先生家里。我开车五个钟头的路程，两个半钟头刚好到他家，那就跟他聊天、吃饭，吃完饭再上路。他对我非常

好,天南地北地聊,这样反而是一般人少有的学习机会,所以在我毕业以后,还一直跟他学各种各样的东西,特别是他对整个文化理念的探索,我觉得学了很多。因为我跟他成长的时代不同,性格上一开始有很多不一样,政治理念有很多不一样,我那时年轻,思想比较激烈,而他则见多识广,经验丰富。那么,我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左派,余先生是比较保守的右派,所以我们两个人谈话是蛮有意思的,经常是政治理念的争论。而且我也发现,很少会有学生整天跟他辩论,我可能是极少数,甚至是唯一整天跟他辩论的学生。在讨论与争辩之中,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有些是人生的道理,有些是为人处世的态度,跟学习具体的历史研究无直接关系,可是对了解当代文化发展,对了解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历史文化,对我有很大的刺激,受益匪浅。我因为是理想主义左派的缘故,在耶鲁研究院曾专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所谓的“西方新马”,余先生对这方面接触与思考得较少,所以我就时常拿这些理论跟他辩。因为我讲的多,他也就去看,看了回来就说,你那个很多不行的,只有理念,跟实际的历史现实无关。我觉得余先生对我刺激最大的是,让我认识到学术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不止是概念游戏,认识到历史理解,不止是探讨客观趋势。我们的生活是真实的,过去历史上的人也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我们都是历史当中的人,理念的运作变成主义来实行,当中有很多真实的人会受苦,会民不聊生。这种相信客观历史趋势与理念实践的偏执,会造成民族的苦难,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看到,不能不关心。我当时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对很多事情想得比较天真,有时偏执于理念,偏执于“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可是,我其实是熟知近现代史的,为什么会咬着一个理念在那里讨论呢?那是因为没有把历史的

意义想清楚，所以从纯粹思想史，特别是观念式的概念理论探讨。我开始醒悟，早先学思想史有很强的观念史探讨倾向，可是，和余先生经常辩论的结果，让我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是我们要研究探讨的历史，是真正活生生的人怎么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生活，怎么经历他们的悲欢离合，怎么过日子。我后来真的很不喜欢讨论纯粹的观念史，也从传统思想史的研究转向思维意识史，后来更倾向社会生活史与物质文明史，研究起文化审美问题，如茶文化、陶瓷外销等等。

李怀宇：史景迁在美国历史学界相当有影响，他是什么样的人？

郑培凯：他对我很特别，在我读博士期间，完全不管我，随我自己去发展。他大概觉得，我有很强的主见，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吧。史景迁在西方史学界很有影响，因为他比较特别，文笔很好，讲故事的能力很强，把历史人物与事件叙述得栩栩如生。就是从我做学生的时候起，美国的历史界正流行量化的历史，什么东西都要尽量找社会经济的资料，把它量化，套上很粗糙的统计学方法来讨论，然后让它科学化。可是史景迁从来就不把重点放在历史的科学性上，因为他觉得历史是活生生的人类经验，不适合以量化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的真实经历。我记得当时有一些研究美国史的同学，研究美国政治史与地方政治结构的变化，用选举的票源来探讨美国历史上的变革，当然也从统计数据说出一些情况，可是也没有办法呈现政治结构的主要问题。到了198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界慢慢又有一个回潮，特别是年鉴学派的一些主将，都开始研究细部历史，研究地方史料所呈现的具体民众生活。年鉴学派早期也都是一大堆

社会经济史，一大堆经济数据，后来这些主将都开始讲生活史，讲历史环境中思维想象的变迁，像法国生活情趣的改变啊，咖啡馆的出现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啊，研究一个村落从中古后期进入十六十七世纪的变化，等等，虽然利用一些社会经济史的数据，却不是以量化研究作为主轴了。史景迁本来就在做这类的研究，并以生动的叙述，呈现历史片段的精心裁剪。你看《王氏之死》，很会讲故事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而可以说，他带领了这个重返历史叙述的新潮流。他叙述的历史很有趣，人物都活生生的，引发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也使得西方人对中国产生了亲切感。其实史景迁的历史基础很好，欧洲史、美国史的基础都蛮好，有一个深厚的西方文化底蕴作为参照系。我后来回耶鲁教书，那时候的系主任是美国史的专家，他跟我说，史景迁很厉害的，我们以前上美国史的课，班上他功课最好。史景迁对整个世界史掌握很好，有宏观的历史视野，可是他的研究却专注中国明清以来的历史，很有独特性。我觉得，他有一种天生的禀赋，特别会运用文字，以优美传神的叙述，讲出动听的历史故事。

中国文化要有新的教学模式

李怀宇：1998年你从美国来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最大的缘故是张信刚校长找你来？

郑培凯：对。我想，最大的外因就是他找我来。当然有我自己内在的原因。

李怀宇：我觉得你来香港不是一个偶然，和你一直以来的兴趣和学术思考密不可分。

郑培凯：你说的对，我也觉得不是偶然。来香港之前，我自己以为在纽约生活得非常愉快，生活得挺好，可是隐隐约约感到还有些东西没有做。我可能还背负了传统士大夫的愿望，虽然不是“经世济民”，但总觉得应该回馈社会，而美国的文化环境不多我这么一个人。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当城市大学校长说，你可不可以来看看，我们想要在香港重新定位中国文化时，我说，好吧，我来看看。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想到我在香港有那么多老朋友，有的是我在保钓运动中认识的，有的是我编辑《抖擞学刊》与《九州学刊》的同志，后来都见到了，而且都还关怀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我来到香港，看了以后，觉得香港不管研究环境怎么样，从教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了。很多东西不做的话，好像也对不起这个地方的年轻人。既然中国文化成为全校的通识课程，那我就一定要把它设计得很有趣，而且符合我们现在理解中国文化的方法。我觉得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另外，我还要带学生出去一起做考察，这个观念可能是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我在聘任同事的时候，是希望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长，最后是要做一定的整合与相互激荡，让专业化、分科化、甚至开始职场化的文史研究，重新找到跨领域的灵魂与精神，而不只是空泛地为跨科系而跨领域。后来我把美国的工作都辞掉了，我越做越有意思，我也发现，学生一开始不喜欢学习中国文化，理由都是很急功近利的，说文化与艺术既不能帮他们找到工作，又不能当饭吃，其实都是完全无知的理由。所以我从教学经验

中坚定许多的想法,提的口号就是:你可以有不喜欢中国文化的自由,可是你没有无知的自由。你不可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我也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讨厌中国文化,或者我崇拜中国文化,这统统都不行。你作为一个中国的青年人,要有批判的脑子,那我给你提供文化知识,以及各种各样的方式与角度,让你来思考。我从来不用传教的方式来传布中国文化,从不盲目尊崇传统的四书五经,也不提倡僵化的传统固有道德。我心想,我小的时候也很有叛逆性,反抗这个传统固有道德的教法,蒋介石就推行这种教法。我发展的这个教学模式,强调多元理解,教学相长,相互刺激,联系现代思维,批判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发展观。所以,在设计课程上,也很有挑战性。比如说,我每个学期要设计五六十个讲座,那我要请很多的人来,所以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开始构思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新的教学架构。我觉得这十多年来,做得最多的,可能在教中国文化以及人文通识教育上面,设计了一个新的教学模式。这个模式并不是到处可以硬套的,许多大学都派过参访团来访问、考察,我每次跟他们讲的第一点就是,每一个模式都是从自己的环境发展出来的,我们发展的这个模式绝对可以参考,可是你不要照抄,照抄不会成功的,你要看自己具体的状况。

这个新的教学模式,并不是只让学生觉得教学方法比较有趣,而是让青年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自己的生命,有个新的批判认识的方法。大学人文科系的建立,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其实是不适合大多数人来理解中国文化的。因为在当前的学术架构里,历史就是历史,文学就是文学,哲学就是哲学,甚至有些学者老死不相往来。现在我们看到有许多这样专业训练出来的人,学文学的完全不看历史,学历史的完全不看文学,哲学的东西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觉得这里头问题非常大,因为就你自己作为一个学者钻研学问,问题不大,只是一个什么专家,这都没有问题。可是,假如整个学术的发展跟大学人文教育是这样的话,那就有问题。还有,我发现在人文学术研究领域里头,有一些学者完全没有人文的关怀,他对于世界也没兴趣,这就很严重了。我也不是说,每个专家都要有人文关怀,可是有大批的人都没有这个兴趣,著书只为稻粱谋,问题就大了。我一直花很多精神在思考,很多是跟人文教育有关,不完全说只是思考一个学术研究专题。我觉得,这跟长远的人文学术环境,跟中国长远的人文探索、学术探索是有关系的。近代中国学术体系学习西方模式,把人文学按照理工的分科分系,建立了所谓科学理性的“人文科学”。研究中国文化传统的途径,主要是重新“整理国故”,把中国文化当成尸体来解剖,造成今天中国人文化心理的偏差。这又联系到我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其实余英时先生也经常讲,就是中国情怀,你心里头还是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东西,这个情怀就使你觉得大学人文教育出现了基本偏差,而许多人文科系的教师却还懵然不觉。想要纠偏,就有许多东西要做,而只有许多人来做,才有希望发展出一些新的东西,创造新的中国文化。

李怀宇: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课程中有昆曲、书法、艺术等,把中国文化很多精彩的东西都拿来教学,而且请的都是第一线的人物,这种安排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郑培凯:我们尽量这样做,尽量延请最有成就的学者与艺术家,到学校提供讲座。我觉得,这是一个教学理念的问题。为什么请来的都是第一线的人,都是最出色的学者或艺术家?我们学校的学

生,大多数是理工、商、法等专业性的学生,可能这是他一生唯一的学习中国文化的机会,假如不给他最好的,他一定没有好的印象,绝对是以为中国文化不过尔尔,一生都对中国文化没兴趣,甚至鄙视自己的文化。那么,我们就要给他最好的,让他有深刻的印象。他不一定都能学到什么,可是没有关系,说不定过了二十年以后,他回想起来:我当年亲身接触过一个大师,听过他的课。这对他后半生是有帮助的。我们讲,现在都是终身学习,就要从他求学时种下因,将来才会有果。我们开办中国文化课程时,有很多同事就说,何必老远请大学者、大艺术家来呢?你费那么大的劲来策划,他们的学问又那么深奥,这些小孩反正是听不懂的。我们自己随便找几个人,自己的同事也不少,给学生讲讲就是了,不是一样学点东西吗?我说不一样,我不是要学生完全懂,我要的是让他接触,最好是开窍,其次就是种下一个种子。我不知道这个颗种子哪一年会发芽,种子种下去了,我们耕耘也做了,有没有收获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尽量要播最好的种子,我不给一个坏种。大多数学生可能是进入社会之前,最后一次接触文化与艺术讲座,给个坏种子绝对不会发出好芽,不会收获任何好成果。

有一些体制正在扼杀文化

李怀宇:你在纽约时看了很多电影,还对许多表演艺术发生兴趣?

郑培凯:对。我在纽约还看了很多西方传统的歌剧,还有一些

比较新的实验戏，我本来也就喜欢戏。因为在纽约生活的环境，使我有条件看了各种各样表演艺术的呈现形式。我本来是研究十六、十七世纪的文化史，因为对戏剧表演的兴趣与思考，转而专注汤显祖及明末清初戏剧与文化艺术思维了。对于中国戏曲，因为有了西方传统戏剧与实验的深入接触，有了明确的参照，兴趣就变成学术思考的方向。中国戏曲表演艺术所呈现的文化特质，跟中国美学的其他探索很接近，因为脉络相同，就是中国文化审美的展现。我发现自己有个特长，就是我看到影像的东西，不管是视觉艺术也好，表演艺术也好，比较能够用文字把那个感觉记录下来。这是我慢慢发现的，不是一开始就发现，其实一开始我的训练是思想史，传统的哲学思辨的脉络，后来才发现我对艺术有一种直觉的感悟，最擅长的是把影像的感觉，不管是电影也好，绘画也好，书法也好，把这些感悟落笔变成文字，而且我写艺术感悟与评论的时候有很大的乐趣与满足。

李怀宇：看过张充和他们的昆曲表演吗？

郑培凯：我也听听看看，但是我没有参加曲社，没有变成票友。我的主要兴趣还是学术性的，探索戏曲的文化价值，探讨表演艺术到底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文化意义。这也联系到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的实验剧场，以及我对文艺创新的兴趣。从艺术表现而言，昆曲这么传统的东西，跟最新的探索性实验剧场，在我脑子里是可以联系起来的。所以，我现在时常批评国内的一些大制作的新式昆曲演出，走百老汇歌舞剧的路子，违反了戏曲舞台的基本展演精神。我反而希望各剧团不要走通俗的表演方向，不要变成文娱宣传的歌舞

团文工团,而能花一点时间做一些艺术探索,因为传统戏曲舞台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探索性。

李怀宇:我看你在纽约写的文章,像《在纽约看电影》,文笔不像是一个搞历史研究的人,而是一个搞文学的人,有点诗人的色彩,跟李欧梵有点像?

郑培凯:我跟李欧梵背景很接近,都是大学本科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学历史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对于文字的想象始终无法忘情,对于戏剧想象的空间有兴趣。我觉得,想象的领域在历史认识上也非常重要。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想象的空间领域非常重要,文学艺术拓展我们的心灵想象。在历史上的人们也一样,除了物质生活与经济活动之外,也有极为重要的精神生活,生活在心灵想象之中。怎么探讨历史上的想象空间,这就是我最大的兴趣。历史有想象的这个领域,是文化意识史或称为心灵史(history of mentality)主要的探索面向,也可以说,历史文化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绝不止是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结构,还有文学、艺术、思想,更有涉及视感与音感的生活体会与感悟。想象的领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很大不同,这是想象空间的“历史性”(hitoricity)的问题。我目前做的最大的一个计划,是昆曲的口传心授计划,希望尽量记录二十世纪的昆曲传承情况,把四功五法的艺术传承与变化具体记录下来。因为“戏以人传”,而且记载四功五法传递的文献资料不足,传字辈的老师又都过去了,我们只能通过他们的学生来勾画二十世纪。我每个学期都请一位昆曲表演艺术家,差不多都是七十岁左右的名家,是1950年代第一批受到传字辈老师口传心授的昆曲人。这些昆曲

名家差不多人人都有口述历史或者是回忆录,但是记录昆曲表演传承的细节不多。我请他们仔细讲清楚的,是表演艺术的展现与体会,要讲清楚是如何口传心授的,四功五法是如何内化而得以传承的。他们要讲一招一式的传承,每一个细节是如何从老师学艺的时候学到的,当时是怎么体会的。因为每个人天生资质都不一样,演戏要配合个人的材质与性向,戏以人传,因此每个表演艺术家都会有不同的艺术体会与阐释。从传承的角度来说,虽然老师教口传心授得原汁原味,学生一定要按照老师的一招一式来演示,可是每一个出色的演员,到最后在舞台上展现艺术的时候,表达的是内心的艺术体会。因为有了自身的艺术体会,有了个人独特展现艺术体会的方式,展现的虽然是昆曲的原汁原味,但却是独特展现“原汁原味”的个人心得。这些戏曲表演的第一手资料,在中国戏曲研究领域是十分欠缺的。总要先把戏曲表演的四功五法是如何传承,是如何通过具体的剧目演出,做清楚了以后,才有第一手的资料来深入探索什么叫做口传心授。要是我们的具体实证资料不够,谈论“口传心授”,谈论“保护”,谈论“发展”,谈论“创新”,都说得很模糊,甚至不着边际。讨论“口传心授”的目的,记录其相关的唱腔及身段资料与体会,其实是也要了解到艺术在历史的想象空间里,是有一些细微的历史变化的,而这种细微的变化到最后就是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这个昆曲传承计划的探索,也多少可以解决我一直在思考的想象空间的历史性问题。

李怀宇:近几年你和白先勇合作推动昆曲的发展,当中有什么心得体会?

郑培凯:我有很多体会与意见,主要不是属于学术研究领域,而是关于实际的投入,以及昆曲表演艺术的展现。我基本上都支持白先勇,可是时常提醒他,就是在大规模、大场面、大舞台的演出之外,小规模、小舞台的折子戏演出,跟提高演员的基本功是密切相关的,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在昆曲传承上,演出折子戏也非常重要。不能够说只搞一两出大戏,昆曲就会复兴。我反对现在大多数昆剧团搞的那种大戏,花了很多精神在舞台设计、灯光舞美上面,可是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虽然也算是大戏,方向却不同,舞台基本空灵,做得非常好。所以,他这几年得到大家的支持,也有许多资助,同时使得昆曲年轻演员学了比较多的戏。白先勇给我的任务,是思考与探讨昆曲的文化意义,以及涉及开创或复兴中国文化前景的问题。我在讨论昆曲的文化意义的同时,也提出戏曲艺术展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目前有许多严重的问题大家探讨不够,没办法解决。一个问题是利用麦克风,不解决的话,声乐的问题没办法解决。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现在国内表演艺术的体制,鼓励大场面的演出,而丝毫不顾及艺术形式的内在要求,违反了昆曲是精致的小众艺术,而非大众文娱的属性。文化部门颁奖,都是颁给大场面而且是新排的剧目,因此也造成了传承的问题。我对于国内戏曲研究的体制,也不是顶乐观的,因为高等教育的学术架构有问题。我们现在研究昆曲的人,差不多都是中文系出身的,并且在中文系里工作,从个人学术发展及升迁的角度来讲,研究文献是中国文学领域的主流,鼓励戏曲研究从文献到文献,多发表戏曲文献的著作。从学术研究的成果业绩与评级而言,对表演发生兴趣,探讨舞台表演艺术,就涉及了学术传统之外的新事物,对所谓的学术事业没什么直接的好处,在当前学术评审的制度中是会吃亏的。那么,就造成一个现

象，一定要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了，在学术架构里基本封顶了，不在乎职称评比，也没有什么升迁了，才能超乎学术职场的限制。从昆曲研究的学术方向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中国有一些体制实在太坏了，对整个文化的发展，尤其对某个特殊领域的艺术的发展，完全就是在扼杀。

喝茶是净化心灵的过程

李怀宇：你是学历史出身的，在研究中国历代茶书时，有什么有趣的发现？

郑培凯：我们发现，中国上层的文化精英对喝茶的讲究是对于审美、品味、趣味的一种追求，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个精神的提升。我们同时也发现，这些茶书里讲的比较少的反而是一般老百姓喝的茶，就是比较普通、比较次的茶。可是，像我们学历史的人就会发现，一般老百姓喝的茶虽然不怎么高明，但他们的量是比较大的。我们讲到“柴米油盐酱醋茶”，后来茶变成日常生活的开门七件事之一，是日常生活比较重要的东西。从研究经济、社会文化来讲，茶也要好好讨论，特别是研究经济史方面，要知道唐朝有多少出产，是哪里的产地，是蛮有意思的。唐朝喝茶的功夫跟宋朝有一点差别，中国唐朝和宋朝是先做成饼，要喝的时候再把它磨成末，唐朝用煮的方式，而宋朝用研末成膏，再浇水点茶的方式。饮茶的最大变化，是出在元明之际，茶叶冲泡成为主流。到了明朝以后，我们今天中国人喝茶的方式才定下来。我们现在就是茶叶冲泡，即使是功夫茶也

是茶叶冲泡,福建的铁观音也好,乌龙也好,基本上是茶叶,不做成茶饼,现在只有普洱茶还是茶饼。

李怀宇:中国有一段时间把普洱茶炒得很热,为什么会这样呢?

郑培凯:普洱茶跟其他茶的喝法不一样。普洱茶是后发酵茶。我们讲茶的性质,其实是从制作的角度来讲,不从口味的角度来讲。从制作的程序来讲的话,绿茶是不发酵的。有半发酵的茶,像乌龙、铁观音,稍微发一点酵,有轻有重。像现在台湾流行高山乌龙,就是很轻的发酵。完全发酵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一开始把它全部发酵了,就是红茶,洋人喜欢喝全发酵的红茶;另外一种就是普洱式,叫做后发酵茶。普洱茶的茶种是大叶子茶,叶子含的丹宁酸特别重。因为茶叶跟酒一样,都有丹宁酸的。假如喝普洱茶刚做出来的生茶,其实是绿茶,没有发酵的,苦的,很涩,这个涩的东西就是丹宁酸。丹宁酸在长久的自然发酵下,会变味道,会柔化,这个道理跟红酒几乎是一模一样。好的红酒越放越陈越香,坏的红酒放久了就发酸。普洱茶有这个本质,后发酵的过程让它越陈越有味道。所以,就开始有人炒普洱茶了,其实这个东西不应该卖那么贵的。中国现在所有东西都可以炒,炒作本身就是哄抬市价的方法,最近普洱茶的价格又落回来了。

李怀宇:古人谈茶道,会谈到品味,那么,现代人饮茶的品味跟古代人还一样吗?

郑培凯:不太一样。从元朝到明朝初年,最大的变化是制茶的

技术改变了，对绿茶的处理有一个很新的方法就是炒青，我们叫炒青茶，而且特别讲究嫩的茶，绿茶特别讲究新茶上市。这个变化就使得品味不同了，因为唐朝、宋朝的茶，做茶的技术不太好，最好、最嫩的茶做出来，把它压成茶饼，然后糊上米膏，或者糊上蜡。这是当时的保存的方式，目的是希望不要霉了。唐朝、宋朝能够保持茶叶不发霉，已经是一个本领了，要喝的时候就用碾子或磨把它磨成粉末。唐朝的喝法是，水煮在一个锅里面，把茶末倒进去，然后舀着喝，这是陆羽的喝法。宋朝的喝法，放一点水把它弄成茶膏，再一点一点放水进去，然后打出泡沫来。这个就跟日本传统茶道很像了。以前的文人雅士很有情调，拿茶当游戏，比如说同样的茶，放在茶碗里面，打了起泡的沫饽，比谁起的沫饽好。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就讲到这一点，这是古代上层社会喜欢玩的游戏，当代没有这种游戏。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喝卡布奇诺，喜欢玩牛奶泡沫做花，在咖啡上做出各种各样的花式，倒是很像宋朝人“点茶”干的事。

李怀宇：陆羽《茶经》里面讲到瓷器的重要性，今天喝茶，瓷器还是很重要吗？

郑培凯：现在还是很重要。陆羽讲品味的统一，所以茶具很重要，让人赏心悦目。日本茶道跟中国学了以后，今天还是这样，一个日本传统茶道，主人假如尊敬你，会拿出他珍藏的古董茶碗给你，用宋朝的方法打一些沫沫出来，你端了这个茶碗要看看去，还要讲一些称赞的话，你要懂得，至少要讲这个茶碗是很漂亮，很了不起。要不然的话就变成他对牛弹琴了，他给你的可能是珍藏很久的茶碗。这个道理日本人学了，所以茶碗本身很重要。可是，中国到了

明朝的时候,已经不喝宋朝人的茶了,开始喝绿茶了。所以,明朝人讲究用白瓷碗,有的时候还是有暗花的白瓷碗和青花瓷。今天喝茶,用什么茶具,要看你喝什么茶。若是喝细嫩的绿茶,如龙井、碧螺春,最好用玻璃杯。

李怀宇:传说中被陆羽评过的水,可信吗?在茶道里,水是很重要的?

郑培凯:水当然很重要。据说陆羽是评过水,可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所谓陆羽评过的水,是张又新讲的,那是有问题的,因为欧阳修早已经写过文章,驳斥张又新讲的,根本不符合陆羽的标准。不过,中国讲名泉,是有道理的,喝茶是要好的泉水。我们现在有一些自然环境受到污染,有一些水已经不行了。比如,据晚唐张又新假借陆羽之名所讲的天下二十好水,其中有吴淞江的水,就是现在的苏州河,那个水能喝吗?可是,上海这个地方在唐朝的时候,根本没什么人的,从苏州到松江流入黄浦江出去的水,以前应该没有污染。今天,我相信在世界各地都有好的山泉。山泉就是水经过山石的过滤,含有一定的适合发茶的矿物质,所以特别香。经常有人说:没办法的话,就用蒸馏水泡茶。可是蒸馏水有一个缺点,太纯了,不能帮助茶发出它的香味,但至少不会把茶搞坏。

李怀宇:中国的茶文化对日本的茶文化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郑培凯:日本茶道基本上从中国禅宗寺院茶道学来的,是一脉相传。可是中国却因为是多脉传承,茶道的讲究有不同历史阶段的

变化。有一脉后来自己不传了，就是宋朝文人士大夫的那一脉，在日本却通过寺院茶道留下来了。日本人学的基本上是宋朝的茶道，特别是寺院茶道。日本现在主要有两种茶道，一种是传统的（也是正统的），叫做抹茶道，还有一种煎茶道。煎茶道其实就是明朝以来的喝茶法。

李怀宇：现在台湾流行的茶文化，是从哪里学来的？

郑培凯：台湾主要是从福建学去的。台湾种茶人，早先多是从产乌龙和铁观音的福建安溪整个家族搬过去的。乌龙、铁观音是浓香的茶。江南的茶，像龙井、碧螺春是清香。台湾的茶基本上是按照福建的系统，后来因为比较富裕，制作上精益求精。我就发现台湾的茶做得比福建讲究精细，口感好，不过，现在台湾茶商又回到福建去做茶了，所以现在福建也学台湾的精工细作方法，迎头赶上。这学起来并不是那么困难，主要是花精神，好的茶都是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经过许多的程序，也要非常精密。

李怀宇：传统讲“柴米油盐酱醋茶”，你觉得茶在现代人的生活里是什么位置？

郑培凯：现代人总不喜欢喝白开水，要喝饮料。饮料里面茶是最健康的。不管是绿茶、红茶、普洱茶，都是比较健康的。茶里有很多维生素，以及氨基酸，现在叫做茶多酚，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喝茶坏处不大，除了有的人精神上比较紧张，晚上睡不着，那晚上不要喝就是了。而且，中国喝茶的习惯还有一个好处，要煮开水，

不能喝生水,对健康是很好的,喝生水是容易生病的。茶大概是最健康的饮料,没有副作用。比如喝可乐,以及各种汽水,里面的糖都非常高,有专家研究,像一小罐可乐含有六汤匙的糖,很可怕的。中国人喝茶法不像美国人,根本不放糖,不放奶的,作为饮料来讲,是最健康的。

李怀宇:茶文化在今天还能发挥精神作用吗?

郑培凯:茶文化从陆羽提倡以来,经过唐朝、宋朝、明朝、清朝,到现在,都有一些不同的喝茶方法,在中国有多元的发展。可是有一点很重要,大家喝茶的时候,一般都能够安静下来,古人时常讨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喝茶,能对自己的精神有提升。真的懂得茶道的人,茶道的过程就是精神的提升,是一个净化自己心灵的过程。喝茶的方法,是让人进入一个自我的状态,或者跟少数朋友在一起比较安静的环境。自己品茶,会离开很喧嚣、紧张、忙碌的生活,这对现代人有帮助。敦煌有很多文献讨论过茶与酒的不同,酒是跟朋友一起很热闹,喝了以后,第二天头昏昏的,喝茶是醒神的,这一点是蛮好的。